

K250.6
31
2:16

革命史資料

1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革命史資料》编辑组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一九八六·北京



B

364758

责任编辑：郭丽卿

革命史资料

76

《革命史资料》编辑部编

(限国内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8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页：松林厂装订

1986年8月第一版 1986年8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5 字数：152千字

印数：1—4,500册 定价：1.85元

统一书号：11224·191

目 录

- 胡允恭 陈仪在浙江准备反蒋纪实…………… 1
——代传略
- 陈文瑛 父亲在大陆最后的日子…………… 43
- 陈 仪 被捕后的四封信…………… 62
附件：国民党政府对陈仪的判决书… 67
- 姜茂生 张鼎丞同志在闽西南和豫皖苏边区… 70
- 吕光光 抗英英雄于渊烈士生平…………… 88
- 朱 哲 佛门擎天一柱…………… 95
——巨赞法师生平事略
- 戒 圆 巨赞法师在湖南的抗日活动……………109
- 沈 醉 我与巨赞法师的相识……………114
- 王瑞堂 北平解放前夕“北平市各界人士代
表团”出城与解放军谈判经过……………117
- 段苏权 回忆赤峰、承德军调执行小组的
斗争……………125

李梅甫	广州兄弟图书公司始末·····	135
许为通 严金明	浙江第一儿童保育院概述·····	149
孔昭锐	浙江第一、二儿童保育院点滴回忆···	162
张友渔	我所经历的营救工作·····	167
韩铁声	旅苏二十四年·····	173
范征夫	争取大刀会 打击敌伪军·····	196
唐建贵	重庆谈判时担任毛主席警卫的经过···	2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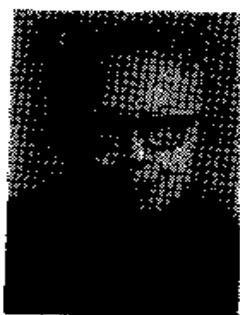
人 物

费侃如	李德其人·····	212
简阳县政协 文史资料研究组	海军起义将领毛却非烈士小传·····	227

陈仪在浙江准备 反蒋纪实

——代传略

胡允恭



胡允恭同志

胡允恭，安徽寿县人，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主编、北伐军第三十五军代理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驻烟台军事特派员、中共济南市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等重要职务。一九三二年，胡允恭同志被王明路线排挤出党，一九四六年经福建省委批准恢复党籍。解放后任福建师范学院院长，一九五一年被停止党籍。打倒四人帮后，中央书记处重新调查研究了胡允恭同志的历史，对他作出了公正的结论，恢复了他自一九二三年以来的全部党籍。

胡允恭同志一生经历非常坎坷，为党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特别可贵的是他被王明路线排挤出党的十几年中一直坚持信仰，不懈地为党工作，对陈仪等国民党上层人物的思想转变起了促进作用。本文即是他这段工作的纪录。

作为一个混迹于国民党官僚体制上层的官员，陈仪

从政几十年，不可避免地会做许多反共反人民的事。比如十九路军发动反蒋运动时，他是站在对立面的；又比如主闽时期，他在全国各省中首先提出并实施征粮的政策，搞得福建人民苦不堪言……这些都有公论。本文主要叙述陈仪的思想变化过程，对他的劣迹未加详述。欲详细了解陈仪，请参阅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回忆陈仪先生》。

——编者

新春将至，陈仪先生牺牲在蒋介石的枪口下转眼已届三十五周年。抚今思昔，不胜感慨。在我与他交往的十数年中，他经历了艰难的求索，经受了惨痛的教训，终于认清了国民党政权的本质，从尽心竭力为之服务转而决定反蒋，投向人民阵营，最后不惜以生命换取真理。我一直想为陈仪先生写一本传记，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今已八十有三，余年无多，而且力不从心，因此找出六十年代旧作加以整理，作为代传略，以为纪念。

早年略历 结识汤恩伯

陈仪（字公洽，一八八三——一九五〇）是浙江绍兴人，中等地主家庭出身，有同母兄一人——公孟，异母弟二人——都受过高等教育的公权、公亮。陈仪幼年读过私塾，中学毕业后，于一九〇〇年赴日留学，先在士官学校毕业，再进日本陆军大学，一九〇七年毕业回国。时清政府已届崩溃边缘，在军界获一官半职相当困难，不得已商之公孟和朋友等，集资在苏北开办一所农

场，规模较大。当时陈仪已有实业救国的思想，对农场曾经着意经营。他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但对农场经营无法实行资本主义方式，只能靠雇佣农夫实行手力耕。

因此，他和雇农间的矛盾，一开始便

存在着，农场的产量还不及个体农民。加以陈仪等人对旧式农业完全是外行，所以他们的农场仅仅两、三年便自行结束了。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陈仪参加浙江独立运动。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诞生，陈仪被推为浙江都督府陆军部长（相当于厅长）兼任陆军小学校长。

据陈仪平时自诩：他担任好几年浙江陆军部长、陆军小学校长，都不能说有什么成绩，唯有于无意中收了一个学生汤恩伯，总算对国家有了“贡献”。由于汤恩伯和陈仪的历史关系相当深厚，最后又恩将仇报，在这里必得先叙述一下他们之间的因缘巧合。

一九一二年春初，陆小已经开学上课，陈仪忽然接到由小饭店寄来一信，是青田人小学毕业生汤恩伯写的。自称原来家道可称温饱（地主），不料迭经丧败，家道中落，不能升学。既知陆军小学招生，因筹借旅费困难，赶到杭州，却已开学，困在饭店，毫无生路，想求见大人（指陈仪），伸手求救，不敢贸然前



一九二八年赴德国考察团合影。

后立者为陈仪，前排左起：李贻、胡庶华（同济大学校长）、项经方（陈仪之婿）。

来，故函求大人赐见（大意如此）。

陈仪派人把汤恩伯找来，汤一进办公室，便跪下叩头，继而泪随声下。陈仪令他站起说话，汤不肯。教人把他扶起，汤恩伯总是要求援救。陈仪赠五元大洋，给他作回家路费，汤不肯收，一再要求入学。陈仪看他身体结实，年才十八岁，收为旁听生，如考试及格，可升正式生。

同年五月，袁世凯政府电令浙江陆军小学挑选四名学生送北京，准备派赴日本学陆军。陈仪选派的四人中有汤恩伯。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了，陈仪不久也被解除了浙江的两种职务，闲住在上海。后来进了某私营银行，担任襄理。这年汤恩伯回国也在某银行做小职员。

一九二二年陈仪在上海偶然遇见孙传芳。他们原是日本士官军校同学。据陈说，孙对他十分亲切，坚决邀他担任师长，陈仪于是又任了军职。汤恩伯便跟着他做连长，后升营长。

一九二六年，广东北伐军抵定武汉，蒋介石部队到了南昌，革命军势力正在扩展。孙传芳在长江下游的部队和国民革命军形成直接对垒的态势。孙部师长陈肇英被蒋介石收买，当了虎门要塞司令，孙传芳大为震动。

陈肇英也是浙江绍兴籍，日本士官军校毕业，是陈仪的同乡。因此，孙部的军长、师长大哗，要求将陈仪拘留交军法处严审，于是陈凭空被逮捕审问。过半年，查明陈肇英和陈仪不是同宗，也不是同期同学，而且向有矛盾（日后陈仪在福建省政府任主席，陈肇英任福建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矛盾更尖锐），于是陈仪又被无罪释放。孙传芳当面向他道歉，挽留他再担任师长，他坚决辞去，回到绍兴原籍闲居。时汤恩伯当营长不久，连带去职，无家可归，

也随陈仪到了绍兴，住在陈家，等于陈仪的儿子。据陈仪的女儿陈文瑛于解放后告诉我：她初次见汤恩伯称他为叔叔，汤偏促不安，坚嘱文瑛称他为大哥，他称文瑛为妹妹。可见关系之深。

汤恩伯比陈仪小十四岁，方在壮年，陈仪认为他可以深造，私人资助他再到日本求学，汤恩伯由此进了日本陆大。

陈仪有时到上海在陈文瑛家中闲住，有时乡居，经常研究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喜欢谈“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自谓对董仲舒学说有体会，所以做官没有贪污的坏名。这是他的优点。

进入蒋家政权体系 入主福建

陈仪原来不是国民党党员，更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他和李根源（艾思奇同志的叔父）、杨永泰、张群等都是老同学、老朋友、盟兄弟。有人说他是政学系，也是政学系创始人。陈仪做国民党官员时期，虽未公开承认过，但已众所周知。

一九三〇年陈仪由老同学何应钦推荐，担任蒋政权的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但蒋介石对他并不重视，他本着“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原则，努力工作。经过一段时间，被何应钦所赏识，蒋介石也略略知道有陈仪这人在替他努力。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东三省，蒋介石开始搜罗对日本国情有研究的人员，陈仪才和蒋有接触的机会。一九三三年冬，十九路军在福建创立人民政府，发动反蒋抗日运动。失败后，蒋介石任命陈仪为福建省府主席。

福建早被日本帝国主义视为禁脔，远在一九一五年向袁世凯

实国集团提出“二十一条”时，即蛮横要求：“东南沿海岛屿，不得租让他国。”厦门、福州邻近台湾，日本更加重视。十九路军退出福建后，日寇派遣大批特务、浪人立即混入福州、厦门，公开地在大街、通衢设立烟馆、妓寮、赌场，广招游民，收买汉奸，扩充特务组织，杀人越货，无日无之。有些热血青年自发起来反抗，黑夜打杀助日寇为虐的汉奸、流氓。而日寇的特务、浪人又借此生事，抗议示威。两市秩序都被搅得大乱。

在此种情况下，蒋介石必须选定一个日本通做福建省主席，同日寇周旋。陈仪遂被选中。由何应钦出面，要陈仪出任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为人相当精细，他懂得这是要他“扛木梢”，代人受过，不免踌躇不决。何应钦不得不直接告诉他，这是蒋介石的计策，要他无条件对日寇退让，甚至无条件屈服，不管日本浪人怎样横行都不要干涉，只要不同日寇闹翻脸，保住福建就算立了大功。陈仪就这样上任了，这是一九三三年底。

对日寇的横行践踏，陈仪内心非常不满，但苦于蒋介石的治闽密令，对日寇不得不退让屈服。不过陈仪到任后也不是一件好事未做。对过于猖獗的汉奸、流氓，他令宪兵秘密逮捕格杀，而不声张。虽然如此，厦门、福州两市仍然民怨沸腾，直把陈仪当做大汉奸对待，几乎无人不骂他。大街小巷，遇事都在咒骂国民党，咒骂陈仪不如木偶！老百姓把省政府称为“裴真人庙”（省府内原来即有狐仙裴真人庙，两层的一间小楼），每逢旧历初一、十五，市民成群结队敲锣打鼓进入省府内，祈求裴真人赐福人民，为人民驱除日寇和汉奸！陈仪只做充耳不闻。

陈仪的苦闷虽可以想见，但依然“好官自我为之”，尽力去做事。他和著名华侨胡文虎有较亲密的关系。得胡文虎大力资

助，陈仪在福建各县设立了地方医院，鼠疫、疟疾两大患逐渐减少。同时开办闽省干部训练团，陆续培养了好几千县区级各科科长、区长、科员等，保障他们的工作，不随县长调动而调动。又严办了一批贪污的地方行政人员，盗匪也随之减少。这原是巩固国民党统治的措施，但人民也可少受一些欺压。这当然是改良主义的措施。

特别是陈仪随时打击 CC 分子，更得民心。应该说，陈仪之反对 CC，最初是出于派系之争，因为一九三三年政学系领导人之一杨永泰被陈立夫派特务刺杀于汉口海关码头，及至后来才发展为对蒋介石的特务统治十分反感。对于军统，陈仪也恨其跋扈，时时有意无意干扰他的行政，因此他时常抓住证据，予以打击。这在沈醉所写的《我所认识的戴笠》一文中，有详细记载。

福建人民对陈仪屈服于日寇，恨之入骨，对他留意地方疾病和官吏贪污等事，以及压制打击中统、军统，又感觉到他还有好的一面。而且由于干部训练团的设立，连年招收了好几千青年，并安排了他们的工作等等因素，所以陈仪在咒骂声中还没有激起大的变故。

一九三六年冬，我因沈仲九先生介绍到了福建，认识了陈仪先生。沈仲九先生是五四时期有名的作家，初期相信无政府主义，曾是上海无政府主义的小领袖。他留学过日本和德国，在学术上有一定造诣，担任过上海立达学院院长、上海劳动大学代理校长等职，颇有声望。沈和陈又是亲戚，故陈仪请其当顾问，对他十分尊敬，要事一般都和他商量。

沈先生在陈仪面前说我刚从日本留学回来。其实，我在日本虽住了一个时期，不过是闲住，并没有认真读书。陈仪听说我刚

从日本回来，急欲同我交谈，因他久离日本，迫切希望了解日本的近况。初次见面，我们就交谈了很久。主要内容是谈日本少壮派军人和重臣团（从西园寺任首相起形成）的关系。此后，又进一步深谈了日本少壮军人是否会很快向中国全面进攻的问题。我认为日本重臣团基本上已无实力，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则十分猖獗，他们根本不把中国放在眼里。看来在较短时间内就可能向我国发动全面进攻。陈听了将信将疑。

陈仪问我怎么会结识沈仲九？我告诉他：“一九二三年我在上海大学读书，二四年沈先生就到该校中文系讲授中国哲学史，我选修他的课。”沈先生曾在湖南第一师范教了一年书，后思想有了很大转变，不再相信无政府主义，并逐渐同情马列主义。他在讲授胡适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时，批判得很有力。在这以前，我也读过一些哲学著作，有些看法和沈先生并不相同，常私下找他商讨，沈先生极其耐心。我把他的课全部学完，与他建立了较好的私人感情。

陈仪知我和沈仲九先生相处不错，便同意把我留在福建省干部训练团任教。陈兼干部训练团的主任，但他无暇兼顾，由仲九先生任代主任。陈每月至少要到训练团做一次报告，他常讲要廉洁奉公，诸如“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之类的话。一般人都说陈主席廉洁奉公。我和他接触后，也有同感。他家中确实没有多少私产。

当时，干部训练团的学生有一千余人，福州人特别多。学生中常有人骂陈仪，说他屈服于日本人，甚至有人骂他是汉奸、走狗。陈是察察为明的人，对人民的愤恨完全知道。但他总以“忍辱负重”来自我解嘲。他又是有志报国的人，有时扪心自问，也

感觉到对不起人民，愤闷之余，时向左右表白：“我总不会出卖国家和人民，作千古罪人。”

一九三七年初，西安事件后，全国各界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准备抗日。不料日帝的台湾总督嘉藤吉利突然致电陈仪，大致说：全台各界定于本年五月一日召开大会，庆祝皇家建设台湾四十周年，特邀先生率领代表团来台观礼，等等。

陈仪接电后，感到是对他的莫大的侮辱，准备断然拒绝！不料蒋介石的密电接连而来，严令陈仪组成大规模的代表团，并要陈亲自率领，按期赴台，不得延误。

陈仪感到十分难堪：福建人民已把他称为大汉奸，向来不予齿数，如果再亲身赴台观礼，不是又表演一次汉奸跳舞吗？这是何等耻辱！退一步说，拼着老面孔走一趟，福建人民会不会群起反对、辱骂，甚至发生不能预料的事变，都很难说。后来他说：当时愁得寝食俱废，想不出退路。最后他和顾问沈仲九、秘书长陈景烈、民政厅长高登艇、财政厅长严家淦等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讨论此事。首先是高登艇、严家淦相继发言：主张必须亲去，不然交不了差，甚至引起外交问题；人民反对、咒骂，只好忍受，等等。沈、陈没有发言。陈仪接受了高、严的意见。

届期，陈仪的代表团共三十多名，清晨齐集省府，直赴江边乘兵舰赴台。不料人民早已探知消息，大街上，凡是重要路口墙上已贴出白纸大字标语：例如“欢送陈主席率亲日代表团赴台！”

“欢送陈主席率亲日代表团赴台祝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台湾四十周年！”等等。陈仪感到触目惊心！然而还是登上了兵舰，乘风破浪而去。

福建国民党报纸奉令发表新闻一律称：陈主席率领代表团赴

台湾参观。

陈仪等在台湾参加了庆祝大会，也公然登台致了贺词，说台湾轻工业发展迅速云云，日本报纸连日刊登中国亲善代表团团长陈仪等到台参加庆祝大会的消息，尤其是对陈仪的祝词，擅加伪造，说陈仪讲：台湾人民不仅丰衣足食，而且安居乐业，这种幸福生活，都是天皇赐予的，等等。陈看了这样消息，不仅啼笑皆非，简直是无地自容！

台湾人民对陈仪及其代表团的^活动也特别关切，给亲善代表团团长的信件每天都有数十封，措词则大同小异。例如，质问陈仪：台湾是哪个国家的领土？日本为什么举行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你们参加大会有什么感想？又问陈仪：你受的是日本教育，知不知道中国有刘豫、张邦昌其人？你愿不愿意做刘豫、张邦昌？再问：你们回国对同胞们有没有骄傲的感觉？你们吃的饭，穿的衣，从哪里来的？等等。

后来，陈仪对我说：每一封信，每一个字，都似一根钢针直刺心窝！在台湾过了数日，好象做了十年囚徒！一九四八年，他曾将这些信件和当时的日记悉数交我保存，要我在他死后为他写一传记，将这些全部公开发表。可惜，这些极为珍贵的文物毁于十年动乱之中。从日记上看，陈仪是不甘心被骂作汉奸的，他内心很痛苦。

陈仪回到福州，好多天无脸会客，报界问他消息，一字不谈。蒋介石要他发表观礼谈话，他以沉默拒绝了这项命令。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发表宣言和谈话，振奋了全国人心，抗日战争展开。福建怎样办？陈仪开始想到，这样下去，背着大汉奸的恶名，不但不见容于广大人民，即自己的

亲戚朋友，也不能见谅。但怎样抗日呢？手中无兵，唯有坐在省政府里办公文，会客而已。

同年秋天日寇侵占了厦门，从守土有责来说，陈仪应该有所表示，可是蒋介石仍令他待机观变。接着，十一月上中旬，日寇的军舰时常在厦门、金门海面游弋。一日逼近金门，金门县长邝汉惊惶失措，带着眷属和科长等乘准备好的小轮船离开金门，径回福州。邝汉逃走后好几日，日军才进驻金门。陈仪查明这件事，将邝汉枪决，说他不能守土，日寇未到，事先逃走，致使金门人民遭到极大损失，罪不容诛，等等。不料，舆论并不支持陈仪，报纸上先后刊登了好几篇文章，都指出：福建当局向来亲日媚日，特务、浪人横行无阻，福建早已沦为殖民地，所以才有邝汉这等汉奸式的官吏。试问枪决了邝汉，冀图解释或掩盖什么？请明白答复，以释群疑。还有文章为邝汉“呼冤”，说陈仪并无抗日的明白表示，他本人也守土有责，为什么只办邝汉？！

陈仪是有理智、有良心的，他对人民和报纸的指责、质问，只能哑口无言，背地里深自懊恼、忏悔，然而舆论总是沸沸扬扬，指桑骂槐，依然把他视为汉奸。

这次风波闹得很大，蒋介石当然知道，他没有责备陈仪，反把福建绥靖公署（设在南平）主任蒋鼎文及其部队调离福建，委任陈仪兼绥靖主任。陈仪意外地获得这一兼职，认为借这个头衔，可以调动全省驻军，抗日多少有些资本，打击特务也更有力量。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汪精卫突然逃出重庆，二十九日发表通电（艳电）公然背叛祖国和出卖人民，认为只有同日本言和（投降），才是救国救民的方针。接着由河内飞到南京，拜倒在日寇脚下。全国声讨汪精卫。陈仪认为他洗刷耻辱的机会来了。他没

有和幕僚商量，突然在绥靖公署向记者发表谈话，痛斥汪精卫背叛“党国”，投降日寇，败坏大半生名节，成为“党国”罪人，到头来必然身败名裂！试看历史上有哪个卖国贼能够一生身名俱泰的？！接着声明：福建早已把我当做卖国贼汉奸看待，这是应该的。我任职已经五年，对日寇一贯退让屈服，福州、厦门成了日寇的殖民地，种种罪恶都由日本特务、浪人乃至中国的流氓做尽。我知道广大人民万分痛恨。过去我为国家大计，不敢随便发表谈话，今天我直告大家：福建是日寇久已垂涎的地方，中央（未敢提出蒋介石）非常重视闽海的安危，令我忍辱负重。我体察中央的用心，不得不在福建对日寇屈服，争取日寇推迟侵占福建，解除中央东顾之忧，所以不惜负着种种罪名与日寇相周旋。现在日寇已侵入闽海，占领了厦门和金门，再无和日寇虚与委蛇的必要，只有领导福建两千万军民，赤诚拥护领袖蒋委员长，决心抗日，直到恢复失地，全面胜利为止。同时宣布，沿海地方政府和海防部队捉获日本特务、浪人以及为虎作伥的中国流氓、汉奸，一律枪杀勿论。严禁任何人假借名义（按：军、中统特务往往假借搜集情报，派船到厦门、金门和三都澳等岛屿走私）派出船只到日寇占领的岛屿走私，违者以通敌论罪。

紧接着陈仪将日本人在福建设立的烟馆、妓院统统封闭，未及逃走的日本浪人也全数逮捕；并派出大批军事人员分赴沿海，协同地方政府的自卫队在沿海布防，以省保安团和留下的少数国军分驻沿海重要城市，监督地方防军。次年又在泉州市设立前方抗敌指挥部，任命福建省保安处副处长柯远芬为指挥官，拨三个保安团归柯调动。在漳州市驻国军一个师，师长为胡璉。

从此，福建才有些抗日的气氛。

尽管陈仪发表抗日声明时表示理解蒋介石的方针，也说了要拥蒋抗日，但压力还是随之而来。因陈仪的声明事先未报告蒋介石，而且使福建百姓对陈仪的指斥转向蒋介石。声明发表后，蒋大为震怒，数月不和陈仪通电报。陈仪知道不妙。后据蒋的侍从副官向陈仪透露，原来蒋介石认为抗日夜长梦多，徒令共产党逐渐壮大。因此，他早已企图和日寇私下言和，勾勾搭搭已非一日。汪精卫侦知这个密谋，抢先一步投降日寇。这一着固然严重地打击了蒋介石，但他并不灰心，自认威望、实力、政治地位都高于汪精卫，依然是日寇争取的对象。所以他一直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始终不愿和日寇截然断绝关系。陈仪的声明不免泄露了天机，因此使蒋震怒。

陈仪深知蒋介石对部下有功者，片刻不忘；有过者，终身不忘。他考虑蒋介石会把他免职，遂暗作准备。

陈仪这次虽然没有被免去军政职务，可是蒋介石头脑中给他记下一笔账。

福建人民对陈仪则是另一种看法：不再骂他卖国贼、大汉奸。同时对蒋介石更加痛恨。

在行政院和陆大坐冷椅子 认清蒋家政权本质

一九四一年秋，陈仪终于被蒋介石免职下台。陈仪到了重庆，蒋介石对他的态度相当冷淡，陈却一切坦然。这时他似有些忏悔式的觉悟，自己检查在闽数年，一部分精力用在向日屈服方面，一部分精力用在征兵征粮（征粮首先是在福建实行的）方面，

都是替蒋服务。可以说，完全没有替人民做一件事，反之，对人民却有许许多多危害、骚扰。然而下台之后，人民不记旧恨，且宽容谅解。蒋介石则不然，只因自己不愿死心塌地做汉奸，替他扛木梢，就被一脚踢下台来。因此，陈感觉到对福建人民负了一笔债，对蒋不免暗暗生恨。当然，这时陈仪之恨蒋，仅属于他们的内部矛盾。

陈仪选择了僻静的山区住下，自以六十老翁无所求，反觉无官一身轻。住了不久，到一九四一年蒋介石突然召见，提出要他到行政院充秘书长，陈不敢提什么意见。事后知道，由于何应钦、张群等一再提及，故有此任命。

当时行政院院长由蒋介石兼，实际上是副院长孔祥熙负责。陈就职前，蒋吩咐了许多话，大致说，他自己很少工夫到院处理政务，孔副院长不免胡涂，院中闹得很不成体统，故请陈任秘书长，希望陈认真替他整肃一下。如有做不通或棘手的地方，可去找他，他会支持陈，等等。

陈仪拜访了孔祥熙，则另有一种气氛，孔十分谦虚，但不涉及行政院事。无可多谈，陈半小时即告退。告退时，陈仪说他准备某天到差。孔答：随便吧，多休息几天也无碍。

到差那天早晨八时左右，孔不到，院各厅、处长也无一人来，只有科长、科员大约九时后才陆续来签到。直至十时以后，厅、处长等才零零落落来上班。整个行政院冷冷清清，不但没有抗战气氛，连办公时间也不遵守。厅长、处长上班后曾来见过陈仪，只稍谈一下便辞去。陈仪和这些人约定明天上午八时在行政院开一次座谈会，了解一下情况。次晨，陈仪先到，直至九时半，厅、处长才姗姗来到。座谈开始，陈问有没有本年的工作计划？

谁也答不出。要求厅、处长拟定一个临时工作计划，没有人承担。陈仪不得已要求大家按时上下班，大家勉强同意了，可是表示得有气无力。谈了一个多小时，什么结果也没有，只有散会。

这以后，陈仪以身作则，每晨八时就到行政院，坐着无聊，到处走走，发现连值班人员都到九时才上班。科长等人办一下例行公文，没有事便坐着聊天。陈仪开始很天真，认为秘书长应有一定的职权，但谁人眼中似乎都没有什么秘书长，于是陷在苦闷中。

隔了几天，孔祥熙偶然来一次，厅、处长不约而同相继到齐，围着孔祥熙谈一阵，孔一走，大家便一齐走开。按规定：每星期一举行总理纪念周会，每月举行行政会议。纪念周会，不但孔祥熙不到，厅、处长也大半不来。陈仪总是做主席，向下一看，疏疏落落，仅有上百名参加者，他也顿时泄了气，讲什么呢？敷衍几句话了事。行政会议，孔祥熙虽然照例到会担任主席，总是谈些例行公事，有关国家大计的事，很少谈到。

不到两个月，陈仪完全失望，他料不到堂堂皇皇的国家最高行政机构——行政院，实际是一官僚养老院。陈仪笃信孔孟哲学：“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他想辞职，但又怕蒋介石给他难堪，于是忍气吞声，天天上班下班。

陈仪看破红尘，学会敷衍了事。有时出门访问亲故，哪知不待探询，许多人已向他道出行政院内幕：孔祥熙和特务头子戴笠打得火热，戴笠和孔二小姐也不是绝对干净。他们不但贿赂公行，而且明目张胆地结伙走私贩毒，利用职权投机倒把，历次黄金风潮大都是行政院制造的。同时陈也因参与了一些机要，约略了解一点蒋与美帝的勾结、向日本妥协投降的秘密，暗中感到，

整个行政院，就是祸国殃民的总枢纽，从哪里整肃起？！但是蒋既要他整肃，总得找几件事或几个人来整一下，表示他接受了命令。这不过是敷衍了事，原不敢也不可能放手大整的。

一次，陈很委婉地向孔祥熙提出整理行政院的意见，例如要执行工作纪律，按时办公，分层负责等，还提出几名罪恶昭著的坏分子名单，仅仅是些中下级官员，以为不致引起孔的反感。孔听后，冷冷地表示可以接受，但是却永远没有下文。某次行政院会议后，只有一些高级官员在座，陈仪不免沉不住气，声明整理意见是根据“领袖的指示”，向孔祥熙重提前事。不料，孔竟沉下脸来，给陈以难堪。陈愤不可遏，报以恶声，两下竟至拍桌子大吵。另外一次，为了关于行政三联制（即设计、执行、考核）的议案，陈仪认为是行政改革的重要措施，孔祥熙则说是例行公事，又发生冲突。这些不愉快的事，陆续传遍了重庆国民党上层机关。

事后，陈仪自以为理直气壮，马上做好准备，必得要求“领袖”判断是非，把行政院藏污纳垢的局面整肃一下。他以为这原是蒋的吩咐，一定会得到蒋的支持。

不久，孔祥熙亲自到陈的办公室，态度十分自然，面带笑容，邀陈到他的官邸进晚餐。完全出乎陈的意料，彼此在极其和洽的气氛中吃完了晚饭，谈到深夜，“尽欢”而散。前几天的争吵，不着丝毫痕迹，完全在笑语中消逝了。

散后，陈暗暗惭愧，觉得“宰相肚里好撑船”，感到自己未免气量太小。其实孔早已向蒋介石打了小报告。陈很快被免除了行政院秘书长职务，和当时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张厉生对调了职务。考核委员会当时是属于冷衙门一类的机关，除每年两

度派员考核外，平时无所事事。

蒋介石也似不忘陈仪劳绩，又下手令任命陈仪兼中央训练团教育长。陈陷在迷雾中，不知是祸是福，几度考虑不去任职，但又转念：这样做，蒋介石能容吗？不禁惶然！

在陈仪和孔祥熙矛盾激化时，陈仪晋见了蒋介石，企图陈述一下在行政院工作的情况，并说明和孔祥熙吵架的原因。蒋表情冷漠，口中又不断地“喳”、“喳”，打断陈的谈话。因此，陈有话不能谈，只好中止。陈以为蒋还有什么要交代，可是蒋面孔变得铁青，一言不发，陈不得已，悚然退出。

后来，蒋介石又转过来亲设家宴招待陈仪和孔祥熙，极力为他们和解。宋美龄也亲自出面打圆场。这时，陈仪已清楚地意识到：蒋介石对他和孔祥熙的争吵原因，与其说全部了解，毋宁说是全部听信孔的一面之词；对行政院的一切违法乱纪之事，与其说是全部都不知道，毋宁说是全部明了，甚至认为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陈这时猛然醒悟：如果说行政院是祸国殃民的总枢纽，蒋介石就是这个总枢纽的总后台。

由于蒋介石对新任工作不作任何交代，陈仪勉强到了考核委员会，一件事也不敢做，成年累月只是坐冷板凳。在这段时间内，他更有馀暇观察、考虑问题。他以亲身观察研究，肯定蒋介石心目中无国家更无人民，只有他个人的利害、独裁地位以及他的集团——孔祥熙、宋子文、陈果夫兄弟等大家族的利害关系而已，而这批东西，个个是“但求河阔，不怕天崩”的祸国殃民的元凶，大好国家，迟早要断送在这些人的手中。陈仪后来说，他在这时，已对蒋家天下的前途看得相当清楚。然而他什么也不敢说。反之，是规行矩步，表现得十分安闲。

一九四五年夏，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了。蒋介石于波茨坦会议后突然召见陈仪。陈仪不能不大动脑筋。他考虑：可能蒋介石又要用他，但往事不堪设想！福建的耻辱虽经洗涤，行政院、考核委员会的教训，怎能忽然忘却呢？他打定主意不再替蒋介石做一件事，以免再遭耻辱。可是陈仪终在蒋介石的手掌中，不敢不去谒见。

某日陈仪硬着头皮晋见了蒋介石。蒋开始还是一如往日，架子大，谈话不多，陈仪准备讲几句闲话便告辞。不料蒋介石似乎渐渐放下架子，突然谈起抗日形势，逐渐和颜悦色，问陈仪有没有注意研究世界形势？陈答：“很少注意，年来颇感精力衰退。”他意在向后转，辞退考核委员会和中央训练团的职务，乐得“无官一身轻”，回到绍兴终老一生，不再看人颜色。蒋介石又谈德日意轴心垮了大半，日本投降是迟早问题，居然以胜利者自居。陈仪不得已附和几句。蒋介石此时没有念“喳喳、嗯嗯”的送客经，陈仪走不开。

蒋介石停了一下，并不注意陈仪表情，忽然转变了谈锋：他要陈仪兼代陆军大学校长，自称事忙，无力顾及陆大。陈仪心中相当吃惊，立即表示感谢，但还是推诿说：“精力不够，恐怕有负委托。”蒋淡淡地说：“勉力做，有困难再来找我。”接着又是“嗯嗯”、“喳喳”！

陈仪事后想到，什么陆大代校长，明明是空心汤圆。当时陆大的重要学员如军、师、旅、团长等，早遣回部队预作准备，待日帝投降，便大规模进攻八路军。陆大只剩下高级参谋和老废人员，几乎变成空校，有什么事可做？况且数年来个人名誉扫地，还有什么脸见人！因此他又在代校长办公室里坐冷板凳。

密友告诉陈仪说：“委座”（指蒋）的棋不下闲着，对你必然还有下文。”陈仪淡然置之。

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投降。蒋介石的大小官员和特务人等都欢喜得忘乎所以，各个奔向发财致富的岗位，竟发胜利财，国家被这些败类闹得乌烟瘴气！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扶植下，积极准备内战。同时，蒋介石素有恐日病，他既怕日本复起，不敢开罪日寇，又想利用日本残军帮助他进攻八路军。所以公然命令军事法庭宣判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无罪，留在行营中为他指挥军队。在这样情况下，蒋介石想到陈仪，再加利用。

出任台湾行政长官

根据一九四二年的开罗会议、一九四五年波茨坦会议，台湾必须归还中国。同年九月，行政院通过设立“台湾行政公署”，任命陈仪为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后来回忆当时的心情说：思想相当矛盾，冷板凳坐得太久，勇气消磨尽了，不愿再作冯妇，但为得向台胞们表示我不是刘豫、张邦昌那一类人物，又愿到台湾走一遭，最多干两、三年，然后辞职。

陈仪组织一个台湾工作组，召集了一批旧人，筹备接收台湾。到十月上旬，一切工作草草就绪，陈仪找机会晋见了蒋介石。这次蒋的态度谦和，令他以大国胜利者的风度，优待日本投降军人和遣返的工商一切人员等等。但对台湾行政等则不谈一句。陈仪乘机大胆提出以下要求，请予批准。

一、台湾接收后，日人发行的台币，在一年左右不予改制，俾稳定物价；

二、在一年左右，不要准许美国银行在台湾设立分行；

三、在一年左右，不要准许美国商品运进台湾；

四、在一年左右，不要准许美军进驻台湾；

五、中统、军统中小干部在一年左右，不要赴台工作。

蒋介石口头上慨然允诺，陈仪为慎重起见，补送一份书面请求，也立即得到批准。陈感到满意，同时又发生疑虑，他懂得蒋介石的诺言不值一文钱，答应得越痛快，实现的可能性……

十月二十五日，陈仪以长官身份在台湾公署接受台湾总督嘉藤吉利投降，仪式庄严，各国新闻记者参加了受降仪式。台北全市张灯结彩，敲锣打鼓，三十万市民不分老幼男女全都沉浸在狂欢中，三天三夜，不断地举行火炬大游行。台湾同胞对祖国是何等依恋、何等热爱！台湾同胞多是或先或后从祖国大陆移入的。这时台湾已有八百多万人口，福建移去的占六百万左右，广东省和其它省的占二百万弱，高山族、即原住人民至多二十万。

陈仪就职那天发表讲话说：台湾是祖国的一个省，五十年前甲午战争，腐朽的清政府战败，经卖国贼李鸿章、李经畧父子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从此台湾同胞陷入日帝铁蹄之下。现在台湾收复了，台湾同胞从日帝铁蹄下解放出来了！大家都要热爱祖国，努力建设新台湾！接着陈把蒋介石和国民党吹嘘一番。

最后说到他将怎样建设台湾和实行民主政治，严惩贪污等。话说得堂堂皇皇，台湾人民没有议论，拭目以待。

谁知蒋介石的诺言是从来不兑现的，美货既迅速地涌进台湾，美国银行也继之在台湾设立，商场、金融界被扰乱得不堪整理。中、军统机构普遍设立，特务匪徒满坑满谷，走私贩毒、强奸妇女，无所不为，甚至公然抢劫。当时戴笠、陈立夫两个特务头子

正红得发紫，他们对陈仪又怀有敌意，完全不与合作，所有机构和特务人数，一律对陈仪保密。特别是中央财政部驻台税收机构，几乎全被持省党部介绍信的C C特务所把持。这部分特务经常和商民接触，他们敲诈、勒索以及枪杀商民等事，在台湾随处发生，全台人民对之愤恨难忍。

陈仪所用之人，大都出自徐学禹的手下，严家淦、包可永、陆桂祥等都是贪污的老手，陈仪不免受这些人包围。到台湾不久，陆桂祥做台北县长（按：台湾的县是日本式的规模，大于市），在接收过程中，将一切现款财物都据为己有，据说有五亿元台币之多，不但台湾各大报尽情揭露，陆桂祥本人也在上海各大报强作辩解，闹得全国皆知。长官公署看到不成样子，组织了调查组，正要彻查的时候，台北县政府一夜起了怪火，把会计室一切账簿单据烧得一干二净。各报纸群起质问，全市街谈巷议。长官公署无法答复，推之为“天灾”。次之是严家淦的荷包中人物任维钧任省专卖局长，于百溪任贸易局长。任维钧贪污有据，台湾《民报》首先登出，任维钧登报质问，要求举出确证，否则起诉追究。《民报》举出任贪污约有五百万元台币的证据，要求任维钧起诉，任哑口无言了。陈仪大怒，把任维钧叫到公署，迫令他自杀，以谢台人。但是任维钧只请假两星期，由严家淦出面转圜了事。

这两件贪污大案子，陈仪都没有严办，那些小的贪污案件更是举不胜举，引起全台民众公愤。陈仪成为咒骂的对象。

一九四七年二月，台湾向来不曾发生过的黄金风潮也发生了，黄金的价格无止境地上升。这是达官贵人操纵的。徐学禹坐镇上海，勾结东南财阀，搜集了大量台币运到台湾，通过严家

淦、包可永等，在台湾抢购黄金，金价随即大涨，闹得台湾风声鹤唳，大家陷在黄金恶浪中。这种种因素，使得台湾人民的生活比战时还要痛苦十倍，台湾成了一座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

就在这时，花莲一部客车开往台北，中途遇着一排“国军”拦截，强迫乘客下车，并把司机打得头破血流。司机忍无可忍，开着满载“国军”的汽车，冲下悬崖堕入大海，同归于尽。这个消息传出，全台司机选派代表于二月二十六日齐集台北向公路局请愿，要求公路局向台湾警备总司令办交涉。尚无结果，二十七日上午台北市又发生特务打死小贩案件。

上面谈过，省专卖局、贸易局、糖业公司、纸业公司等机构所用的稽查员等，绝大多数是CC特务，专做敲榨勒索的勾当。这日特务借口一女贩走私，将她打成重伤，并将货物全数劫去。市民大愤，群起包围特务，特务竟开枪乱射，当场打死市民陈文溪，特务乘乱逃走。市民千余人拥至警察局要求逮捕凶手，交涉无结果，深夜才散去。

次晨，二月二十八日，被打伤的女贩已死去，她的家属和陈文溪的家属围着尸体痛哭。市民自动集合数千人，把尸体放在板车上推向专卖局请愿，不得要领，又推向行政长官公署。素与人民为敌的军统特务胡福相（台湾省警务处处长）慌了手脚，下令向市民开枪，当场死伤十余人。全台人民立即起来占领各市县政府。这就是有名的二·二八起义。

至三月二日台北社会秩序已趋安定。全台各县、市均组成处理委员会，接管了各县、市政权，国民党的县、市长一律靠边站。

台湾处理委员会向陈仪提出三十二条要求。主要是：集会结

社自由；全台县、市长由人民选举，呈报长官公署备案，事平后政府不追查起义负责人；县、市长选出后，“处理委员会”即自撤销，呈报长官公署等等。

陈仪集合少数人如沈仲九（顾问）、夏涛声（行政公署宣传委员会主任）等高量，陈承认自己过于疏忽，对官吏监督不周。此次事变是官逼民反，特别是CC特务散布全省，任意杀人，任意抢劫，特务是逼迫民反的祸首。但他自己也不能完全推卸责任。因此陈仪签字同意了三十二条要求。事变逐渐平息。

不久，蒋介石派国防部部长白崇禧到台湾各处走了一趟，不声不响地转回大陆。大概是三月八日夜，约八时左右，台北市枪声大作，全市戒严，市民不知为什么，大都坐以待旦。

次晨，枪声停止了一下，一位蒋军师长向全市广播说：“国军奉令来台驻防，不料在基隆登陆，遭到暴民袭击，到台北遇到同样的袭击，为镇压暴民，宣布戒严。本师要在台北继续肃清暴民，恢复社会秩序。”同日台北报纸也发表消息说，昨夜有“国军”两个步兵师在基隆、高雄等处登岸，都遭到暴民袭击，本市昨夜枪声，因“国军”平乱而起。

接着有六、七天的时间，蒋军在各大城市展开大屠杀，全台人民死于屠刀下者约三万多人。这种大屠杀，据沈仲九说，陈事先完全不知道。屠杀时，陈仪十分愤慨，他几度考虑向屠杀人民的“国军”提出抗议，但是不敢，他知道这是蒋介石的预谋，抗议是徒然的。

陈仪对这次大屠杀，暗中叫苦。他痛苦地感觉到对台湾人民所作的诺言，例如事平后不请“国军”来台驻防，不追查起义的领导人等等，成了骗局。他深悔来台任职，对蒋介石更加痛恨，

决心等事件告一段落，便辞职走人。

四月中旬，在国民党四中全会上，陈果夫、陈立夫提出把陈仪撤职议处，全体通过。接着蒋明令把陈仪撤职，交付惩处。这样一来，把全部责任都推到了陈仪的身上。

联合汤恩伯反蒋

一九四七年陈仪由台湾回到上海，又由上海转到南京，要求受审判，但没有下文，不了了之。他就回到故乡绍兴探亲访友。他一到久别的故乡绍兴乡间，就发现那里一片萧条，面目全非。他看到官吏、地主、恶霸、特务们横行不法，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大概失势的人，容易接受真理吧。他见了许多亲戚后辈青年们，这些人英气勃勃，对国家大事都有一定的认识和革命的要求。在同他们的谈话中，陈仪觉得中国有前途，有希望，真理自在人心，蒋介石集团终将走上灭亡的道路。

陈仪乡居虽短，回忆十年来辛辛苦苦替蒋介石卖力，自以为即令不能富国利民，也可以幸告无罪，哪知所作所为，全是罪恶。他此时在日记上写的一首《山居》诗，隐约反映了当时的觉悟程度和思想感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已由反对蒋家政权进步到对革命略有认识和要求的地步。诗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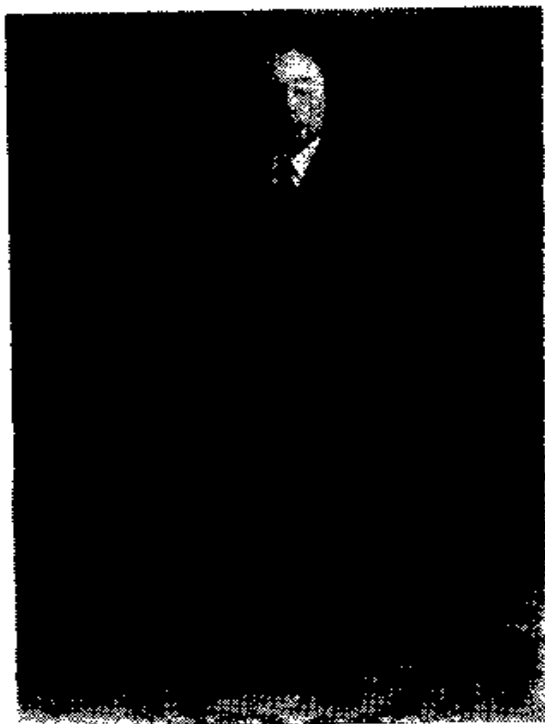
杜门却扫且山居，壮志消沉耳顺余，
如此江山如此世，几番功过几番摠。
膏肓痼疾谁知晓，腐朽神奇愿已虚，
天外仙人应识我，此身何惜付乘除。

陈仪从绍兴乡间又回到上海多伦路志安坊三十五号居住下

来，这里只有一个老门房、一个汽车司机、一个副官和一个卫士。这时真可谓门庭冷落车马稀。

我这时住在上海，遇特务纠缠，不敢出门，也不便和福建党组织联系（当时我的组织关系在福建）。陈仪帮我解了围。为了避免再度惹起麻烦，我便在志安坊东南租了石库门的房子住下，没事时便去走访陈仪。

开始，我和陈仪主要是谈论董仲舒的学术思想，尽管看法很不一致，但因是旧友，仍不伤感情。先是偶尔谈谈，到后来每星期天上午我都到陈公馆聊天。某日，陈问：“上海出的《文萃》上登了一篇《台湾真相》，你看过没有？”我答：“未注意。”其实，这篇文章是主办《文萃》的黎澍同志要我写的，用笔名张琴。文章根据我亲身的经历分析了台湾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经过。文



陈仪像

中说陈仪昏庸，用人不当，知道吏治不规，又顾全面子，不敢声张，致使台湾人民深受其苦，所以说陈仪负有一定责任。但造成事变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特务系统视台湾人民为匪，一味欺压、盘剥，逼至人民起义。事变后，蒋介石派军队到台湾各大城市挨门逐户屠杀台湾同胞，这个罪责应由蒋介石自己承担。文章说是非应分明，罪恶各有攸归，不能让陈仪代蒋受过。陈读到这些深

受感动，他不知文章是我写的，但知道《文萃》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刊物，不胜感慨地说：“共产党有是有非，责任分明。国民党和老蒋无是无非，自己犯下滔天的罪恶，反把一双血手向别人脸上涂擦。”我说：“不仅如此，后来二陈提出要撤你的职来平息台湾事变，把责任完全推给你。而蒋介石居然接受二陈提案，把你当成替罪羊，这是最可恨的。”陈觉得我的话一针见血道出了实质。

以后，我不但星期天到陈公馆去，平时也有空就去，陈时常派副官来找我去。有时我们在客厅里谈，有时也直接到他楼上卧室里谈。陈的卧室很朴素，除了一张普通的床，两张沙发和写字台外，再无别的陈设。写字台上堆放了很多书。看来，他在认真地闭户读书。一次，我送了他两本书：《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没多久，他便读完了。他说：“对四大家族揭露得不错。不过，据我所知，四大家族的财富比作者揭露的要多得多。至于蒋介石，在我看来，比袁世凯更坏。袁世凯想做皇帝，和日本暗订二十一条。蒋介石虽然没有做皇帝，但他的权势比袁世凯更大，杀人比袁世凯更多。”他越谈越愤慨。陈自到上海后，就再也没有称过“蒋委员长”，口口声声称“蒋介石”。

一九四七年夏，刘邓大军过了黄河，直插大别山区。我问陈仪：“白崇禧说，刘邓军队不过三万人，不足惧。有时报上又说有十万人，很难扑灭。你看呢？”他爽直地说：“三万人、十万人的看法，都是从皮相上看问题，即令渡过黄河的共军只有一百人，老蒋恐怕也消灭不了他们。从前北伐军不过十万人，竟打垮了北方数十万军队，全在人心向背，即古人所说的顺逆。怎样叫做顺呢？即得民心；怎样叫做逆呢？即失民心。蒋介石已是失尽

民心了。有一件事引起蒋介石和左右的忧虑。外面人不会知道。今年大专毕业生仅四千多人，要是往年，都吵闹要工作，甚至家长也出面活动。今年没有什么人争吵要工作，听说快跑光了，剩下没有几多了。这些学生不是穷人子弟，绝大多数是官僚、富家的儿女。不但他们不怕共产党，都投共军去了，连他们家长的反共的勇气也大大地消逝。蒋介石有什么办法，光靠无纪律的军队，能够消灭刘邓吗？”

陈似有较大的觉悟，他表示：“不出洋，不再做官，即令共军到了上海，也决不逃走，深信共产党不会行一不义，杀一无辜。假使我有祸国殃民的事实，也不希望共产党宽恕。我已垂垂七十之年，难道还想向共产党投机吗？”陈坦直而重复地向我说过这些话。

一九四八年春，蒋介石的文官长吴鼎昌来电，请陈仪赴南京，他坦然前去。到宁有人迎接和招待。出乎意外，他次日便见到蒋介石。蒋很谦和，开门见山提出要他出任浙江省府主席。当时宋美龄也在座，还竭力劝陈帮助。

陈仪没有多加考虑，即刻答复说：“我在台湾渎职，受到撤职查办，罪责没有消除，羞见故乡父老。同时年近古稀，身心交瘁，没有余力报效党国，恳请收回成命！”蒋介石“嗯嗯、喳喳”，最后说可以回沪休息，再考虑考虑吧。

陈仪回到上海，汤恩伯和他作了竟夕谈话。汤主张必须出任一次浙江省主席，恢复名誉；而且老师此次东山再起，可另作打算，有机会必须反蒋。陈仪还在犹豫中。对反蒋，他表示同意，不过赤手空拳，用什么力量反蒋呢？终于不能再谈下去。陈仪后来告诉我，联共反蒋是汤恩伯首先向他提出的，原因如次。

汤恩伯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炮科，和蒋介石先后同学，又是浙江人，故深得蒋赏识。后来汤的野心大了，竟自封为“中原王”，使同僚嫉妒，也使蒋介石暗生戒心。

一九四四年，日寇进攻中原地区，汤恩伯集团共有五十万兵力，但一败涂地。蒋介石派陈诚前来收拾残局，陈当众指责汤恩伯。汤在路过西安时，胡宗南又以检讨战役失败教训为名，使汤大丢其脸。同时蒋介石给汤另安排了一个虚有其名的陆军总司令，削了他的兵权。这一切，均由蒋介石一手策划，汤恩伯心中明白，从此埋下对蒋不满的种子。

一九四七年的孟良崮战役中，蒋介石整编七十四师张灵甫的人马被解放军全歼。蒋召汤去南京。汤到徐州即下车，借口沿途视察驻军，延稽时日，托要人向蒋说情，约半月余才到南京。汤到南京去见蒋时，正值蒋客厅里有许多高级官员在座。汤一进门便向蒋敬礼，而蒋咆哮如雷，大喝：“跪下！”，汤在众人面前即刻跪下。蒋还不甘休，拳打脚踢，致使汤遍体鳞伤。最后，还是顾祝同出来解围说：“蒋委员长，你太累了，以后再办他吧！”蒋介石这才下令叫汤“滚出去”。据当时上海小报记载：汤恩伯虽不是滚出去的，但确是爬出客厅才上车。事后，蒋介石下令撤销了汤恩伯的一切职务。

陈仪告诉我：汤扑在他的膝盖上痛哭流涕，诉说：他多少年来为蒋介石做牛做马，竟遭皮鞭踢面的奇耻大辱，无颜再去见人，决心自杀。陈百般安慰，劝汤无论如何不要消极。汤说一切作战部署都由蒋亲自决定，失败自应由蒋负责，但蒋从不肯认错，总把责任归之部下。汤说：做独裁者的走狗，不唯可耻，亦且不易。决心反蒋。此次蒋要陈到浙江，汤认为是反蒋的极好条件，要陈决

不可错过。继之浙江士绅代表来看陈仪，劝他要为桑梓做一次工作，必要时可以保境安民。民主人士许闻天等也来相劝，地下党也极力主张他去浙江任主席。不久，蒋经国来到上海，对陈仪说：“我父亲还是希望你去浙江，你的资望高，最合适。如不去，会引起朋友们议论。”这是指议论陈和蒋的关系，无疑是一种威胁，陈终于答应去。

陈仪回上海不到一星期，吴鼎昌又来电催促，于是再度到南京，见到何应钦、张群、吴忠信等，有意无意中谈到汤恩伯仍在赋闲，可否令汤出任军职，立功赎罪？何、张、吴是陈的老友，均知汤与陈的关系，答应试探一下，陈仪见蒋介石时，答应到浙江任职，并向蒋提出省政府人选名单，要求汤恩伯为衢州绥靖公署主任，蒋介石一一允准。

陈仪回到上海，不日汤恩伯被何应钦唤到南京，告诉他已决定要他出任沪杭警备总司令，并约定晋见蒋介石的日期。汤恩伯后来对陈仪说：这次老蒋见到他，坐着不动，面皮绷得十分紧，依然带着怒容，除“嗯嗯、喳喳”外，就是严厉的训斥，如对奴才！汤认为又是一次侮辱。陈、汤进行了密谈，认为浙江士绅希望保境安民，不同中共联系，保境安民纯是空谈；反蒋必须联合中共，反蒋不仅为个人恩怨，也是救民救国。汤向陈表示：如果中共能够原谅他过去为老蒋效力，他必然找机会为共党出力，虽死不辞。

在浙江准备起义

一九四八年六月三十日，陈仪准备去浙江赴任。临行前，我

去看陈，他不在，我留下便条，大意说：你明日赴浙江履新，可能送行的人很多，我不便来，以后专门去浙江拜访你。

陈仪到浙江后，叫民政厅厅长杜伟（杜伟是民革成员，陈铭枢的部下）写信邀我去杭州。我赴杭前，向中共中央军委派驻上海的吴克坚同志汇报对陈仪的工作。我们作了详细商量，认为可明确向陈指出蒋家王朝各方面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特别是蒋介石所依恃的美式装备的军队损失惨重，无法再战。此外，要告诉陈，根据我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科学预见，几年内将完全肃清蒋家王朝在全国的一切残余势力，解放全中国。

我于八月一日到了杭州，住在杜伟先生家中。八月三日上午去见陈仪。陈问：“你家眷带来没有？”我答：“没有。我们几个人正帮神州国光社整理几篇稿子，现在还不能来。”陈问：“神州国光社是陈真如（即陈铭枢）办的吧？”我答：“是的。”陈说：“我和真如同在国民政府共过事，他任交通部长，我任军政部次长。我们本来关系很密，但自从他在福建反蒋后，就不再和我来往了。我很想见见他，你回上海后，约他到这里来玩玩。”我又同陈谈了两次，就回上海了。

某日杜伟到上海告诉我：“陈公洽有一天晚上大发慨叹，认为国民党失败是肯定的了，但是将来没有人有资格同共产党讲和，连张文白（张治中）恐怕共产党也不欢迎。”我当时问杜：“你怎样说呢？”杜说：“我同意他的看法。”我说：“以我个人的看法，要是陈公洽出面去同共产党讲和，共产党可能就会欢迎他。”杜反问：“有什么根据？”我说：“陈是爱国的，他自己又不贪污，真正想做事，共产党为什么拒绝他？”

杜伟回去转告了我的话。陈仪直接写信邀我去浙江。他开始

问我想做什么事，我说：“等把神州国光社的工作做完，干什么都行。”慢慢就谈到时事了。他说：“老蒋毫无办法，你看出来了吧？我早就说他没办法。”我说：“是的，老蒋实在闹得天怒人怨了，不但老百姓人人恨他，就是他部下将来也要分化。凡是有良心的，到时也会起来反对他。真正跟他反动到底的人，恐怕不会很多。”他一面点头表示同意，一面接着说：“恩伯就要出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这是托何应钦、张群等人疏通的结果。现在保境安民有了条件，浙江有五个保安团，我准备扩充整理，恩伯还有两个军，这样就不空虚了。我想请你做嘉兴专员，选几个好科长，事情由他们做，你住杭州，有事可随时商量。”我同意住杭州，但不做专员。

我回到上海，劝陈铭枢去杭州和陈仪见面。中秋节时，陈同爱人汤质彬及我夫妻四人同去杭州。陈仪殷勤地招待陈铭枢，专请陈铭枢一人共进晚餐，由陈女文瑛作陪筛酒。后来陈铭枢告诉我，吃饭时，他们开门见山地谈到反蒋。陈仪说：“你们反蒋早，这条路走对了。”陈铭枢说：“你现在反蒋也不迟嘛！”两人边吃边谈，毫不掩饰。最后，陈仪决定反蒋。陈铭枢还告诉我，陈仪再三问他：“胡先生是不是共产党？能不能代表共产党？”陈铭枢只能回答说：“我想他应该是吧！”

这以前，陈仪曾几次问我是不是共产党，我未得组织允许，予以否认。他又问：“为什么在福建、台湾，特务皆告你是共产党？你为什么被捕？”我说：“因为我相信马克思主义，同情共产党。”有时谈话，沈仲九也在场，他更是极力主张打通与共产党的关系。

我感到陈和沈都是真心想起义，而且在很焦急地找党，应该

由党出面正式同他们谈判了，便向吴克坚同志汇报，建议由他来领导谈判，因我的组织关系在福建。克坚同志说，正因为组织关系不在上海，未通过福建党组织，他不便直接领导我的工作。正在这时福建省委派了社会部长陈矩孙到上海来找我。某天晚上民革负责人吴艺五请陈矩孙吃饭，我也到吴家，吴把我们相互作了介绍。后来我和陈矩孙到吴艺五家楼上单独谈。陈说：他是中共福建地下省委书记曾镜冰派来找我的。上海党和福建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决定我参加上海党对陈仪的工作。陈仪方面由陈、沈仲九、丁名楠三人参与谈判，我方由吴克坚同志领导，我直接进行谈判，谢筱邇同志负责联络。情况很急，上海党报告了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电复赞成，我们便正式开始谈判。

这时，郑文蔚突由香港回来，送来李济深的一封信，也是说服陈仪起义的。郑文蔚原随陈仪工作，台湾二·二八起义后流落到上海。他找我要求参加革命，我为他写了三封介绍信，一封给李济深，一封给朱蕴山，一封给华克之。郑到香港后先见了朱蕴山先生，又见到李济深，但未找到华克之。郑告诉李济深，说胡先生正在浙江做陈仪的工作，李随写一信，要郑速回杭州，加一把力。

谈判的事，陈仪一方只有陈、沈仲九、丁名楠（陈的外甥）三人参与。我方由吴克坚同志领导，我直接谈判，谢筱邇同志来往于沪杭间传递信息。双方谈判，只有口头协定，并无成文记录，因当时环境不允许如此。谈判协定非常简单，大致如下：

一、双方协定后，陈、汤方面不再逮捕我地下党员、民主人士、进步学者、学生和社会青年等；

二、优待一切在狱的政治犯，可能时予以释放；

三、江、浙不再做戡乱准备，但口头上可以说“戡乱救国”；

四、协议实施后，陈、汤两先生从前替蒋方效力，我方全部不予计较；

五、全国解放后，陈、汤两先生及其军政人员，同样享受政治上民主待遇，且可担任军政要职；

六、陈、汤两方面部队，按民主原则改编。

我们要求陈仪的几点，他都一一付诸行动。有一次，我着实为他捏了一把汗。记得是十一月，杭州《东南日报》的一个记者访问他。那时蒋介石处于无法抵挡解放军进攻的局面，要下面“戡乱救国”。陈仪置之不理，他准备在可能范围内提出一项建设浙江的计划。这个新闻记者提问：“全国正在戡乱救国，浙江有什么准备？”陈答：“我这次来浙江，准备在建设方面多少替父老尽点力。”又问：“浙江不做防御工事，怎样戡乱呢？”陈答：

“浙江无兵可调，仅有五个保安团，枪械陈旧，子弹缺乏，怎样戡？船到桥头自然直，戡什么！”记者再问：“为何不声讨共匪呢？”陈答：“两浙青年都是故乡优秀子弟，哪个是奸党，我不知道。我一生从来没有为故乡做一件好事，现在用余年为故乡服务，不能随便诬蔑可爱的青年。”我在报上看到这项谈话，向陈建议，不要把“帽子”弄红了，妨碍工作，口头上还是可以谈“戡乱救国”的。陈说：“浙江是我的故乡，谁也不是匪，谁也没有作乱，戡什么？”并且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一生很少说过良心话，现在应该说点良心话。死生祸福，早置之度外。”陈为人耿直，他认为要说的话，必吐为快。

和我党达成协议后，陈仪准备改编保安团队，拟定扩编为两个乙种师。我党竭力赞助，且劝陈积极进行，必要时可以用两师

地方部队打游击，不致束手无策，俯仰随人。但财政厅提出财政困难，陈也没料到浙江每年财政收入远不及福建。而且汤恩伯说他有两个可靠的军，足以援引解放军渡江，不必急于扩编保安团队。陈对汤极其信任，所以扩编保安团队的事终未能实行。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淮海战役开始后，浙江特务头子毛森亲自指挥他的戡乱大队到处为非作歹。一次在富阳，数日内逮捕了一百多名共产党员或嫌疑犯。陈获知后，立即电令毛森回杭。毛森见到陈，除报告他安定后方的“功绩”外，把所逮捕的人犯分为三类，证据确凿的要犯十余人，要求批准立即枪决；数十名重要犯人送监狱羁押，分别定罪；数十名嫌疑犯，交保等候传讯。毛森另外拟好一份电报，想以陈仪名义替自己报功。不想陈对毛没有任何奖励，只是冷冷地说：“前方战事吃紧，后方以安定为主，不宜生事，扰乱社会秩序。”毛深为不满，但不敢申辩。毛走后，陈把所谓十余名证据确凿的要犯交保安司令部军法处慎重审讯；数十名重要犯交富阳父老（赴杭向陈面叙毛森罪恶的人民代表）具结领回；数十名嫌疑犯无罪释放。那封电报陈仪也扣下了，未予拍发。

毛森闻讯，与陈仪力争。陈当面申斥说：“谁教你到富阳生事？”毛答：“逮捕共匪，安定后方，不是生事。”陈进一步斥责说：“富阳父老来省控告你偏听戡乱大队的谎报，任意捕人，且罪及家属，抢劫人民的财产，怎么不是生事？”毛无话可答。

陈仪不但释放了绝大多数无辜的青年，且斥责了毛森。接着下令把毛森所率领的五个戡乱大队全部解散。毛森再见陈，威胁说：“戡乱大队是中央直属，怎能解散呢？请收回成命。”陈答：“我懂得！中央直属，经费就应由中央负责。浙江财政收入困难，

不能负担这项开支。收回成命，可以考虑，从今天起，经费我不负责。”毛知无效，立即退出，旋即递上一“请假一月养病”的呈文，陈批：“辞职照准。”公开驱逐了这个特务头子。

毛森到了南京，向特务头子郑介民、毛人凤哭诉一番。特务机构立即派毛为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第二处少将处长，显然是向陈仪示威。从此毛森专门盯住陈仪，成了陈的正面敌人。而且陈仪与汤恩伯的联系也从此少了许多。

淮海战役以后，蒋军中的美装精锐部队几乎全部丧失。一九四九年元旦，蒋介石发出求和的声明，并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李曾通令国统区首先释放政治犯。其实这全是欺骗，通令后又密令不准放人，因此也无人实行。唯陈仪接到这项通令后，立即实行。这次释放的有浙江大学许多同学，由进步教授苏步青领导一部分师生把释放的同学欢迎回去。接着便举行一次示威大游行，抗议政府的逮捕。

与此同时，教育部派督学刘某持代总统李宗仁的命令到浙江见陈仪，要求逮捕浙大师生三十余人。陈暗中和浙大校长竺可桢商量后答复说：“这些人平日大都无任何政治活动，毫无嫌疑。只有三人嫌疑较大，可以考虑逮捕。”但暗中通知最重要者一人事先避开，一人早已请假他去，结果只逮捕一人。经过“审讯”，认定没有证据，又释放了。

由于陈的言行，不独特务恨他，注意监视他，李宗仁、白崇禧对他也很不满。他的地位岌岌可危。但是他既认定这次来浙江是归正首丘，所以一切置之度外，非常坚定。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以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发表了三个重要文件：《将革命进行到底》、《评战犯求和》、《关于

时局的声明》，揭穿蒋介石的整个阴谋诡计和无耻的吹嘘，提出惩办战争罪犯等八项方针。这样一来，蒋的诡计完全落空，他手下的官兵感到走投无路，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谁都懂得，蒋家的天下就要彻底崩溃了，整个江南陷于无政府状态中。素无纪律的蒋军更加无法无天，散兵游勇到处抢劫，乃至杀人放火。沿沪宁、沪杭铁路一带地区的人民，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陈仪在杭州亲眼看到这一切。由于他主浙以后在政治上比较开明，这时各县代表纷纷来杭向他诉苦，要求制止散兵游勇的为害。他一面予以安慰，一面急筹对策，最后，决定催促汤恩伯在长江南岸选定一处揭竿反蒋，欢迎解放军迅速渡江，替江南广大人民解除倒悬。陈邀汤来杭，汤口头答应，但迟迟不至。陈十分焦急，决定派他的亲戚丁名楠至汤处作联络员，并介绍我去见汤，面谈一切。由丁带给汤的信，内容很简单：

恩伯弟台如晤：兹丁名楠来沪，面陈一切，请予洽谈。再旧属胡邦宪拟来晋谒，请予延见。至胡君经历，嘱由名楠奉告，并希面洽为荷！顺颂刻安！

仪手启一月二十八日夜

再为办事顺利计，请由弟处予丁名楠以秘书名义，以便来往。

信中说的胡邦宪，是我当时的名字。汤接信后，大喜过望，立请丁名楠督促我去见面。我向吴克坚同志汇报了这一情况。不想克坚同志说：“此事已有变化，必须等待一下，探听确实后，再考虑见汤。”又过了一天，克坚同志说：“已探听确实，汤恩伯受蒋经国收买，背叛了陈仪。不但不能见汤，你必须连夜回杭州，向陈仪先生详细说明事变经过，请他作速从笕桥机场乘飞机

（陈一向赴南京都乘飞机）起飞。只要一过江，他的安全我方完全负责。”情况大致是这样的：蒋介石因特务头子郑介民、毛人凤的报告（根据毛森的报告），怀疑陈仪和汤恩伯有异图，派蒋经国到沪，慷慨答应将上海库存的黄金拨二十万两给汤，并将上海的物资交汤全权处理。汤觉来者不善，惊慌万状，表示感恩涕零。蒋经国当面加以奖励，并要汤当着蒋经国的面在蒋介石像前宣誓效忠。接着蒋经国要汤把他自己及手下高级军官的家属、财产等即日送往台湾，完全断了汤的后路。正在此时，陈派丁持信到沪。汤接信后，立即送与蒋经国。（另一说是：汤的某副官为毛森手下人，从汤处盗得陈仪致汤信件。某日蒋经国悄悄地到了上海，即刻往见汤恩伯，向汤送了一份厚礼——说是根据蒋介石的决定，把上海全部剩下的黄金和一切物资交汤全权处理，这笔财产相当可观，大约值三十亿法币。汤即时表示感恩戴德，永远服从“委座”。紧接着蒋经国提出希望汤把眷属送到台湾居住，汤唯唯听命。最后蒋经国要汤即时向蒋介石像宣誓效忠到底，汤照做后，蒋经国才把陈仪给汤的信说出。汤毛骨悚然，即刻向蒋经国自首。）

党的消息，详细确实，我立即回到杭州，把上项消息忠实地转告给陈仪。陈经过沉默考虑后，严肃地说：“党的消息，一定有来源。但这不会是可靠的消息。恩伯和我的关系，你是知道的，他简直就是我的儿子，志安坊的房子就是他送我的。他恨蒋，恨陈诚，特别讨厌小蒋。这次我来浙江，出于他的劝告。反蒋是他提出来的，我们不止谈过一次。你想，我和恩伯关系这样深，他如果不赞成，可以直接向我建议停止这一活动，何必出卖我？”停一下接着又说：“当然，共产党的关怀，我非常感谢。

我想小蒋不能毫无根据威胁恩伯，即令老蒋怀疑，恩伯有两个军，现在也不怕他了。这项消息可能出于毛森他们的造谣。至于恩伯把家属送到台湾，他事先已电话告诉了我，不是什么新闻，他还可以接回来嘛！党不了解我和恩伯的关系，听到了不能不信。请你转告党，决无此事。”

我见陈不相信这一消息，十分着急，便去见沈仲九先生。沈是参与这一活动的，为人谨慎细密。他考虑了一下，也不置信，因他是深知陈和汤的历史关系的。他又加以解释说：“汤和蒋的关系完全是公洽介绍的。他们关系至密，反蒋是他们共同的主张，试问汤何故中途要卖友呢？”

无奈，我又回到上海向克坚同志汇报，他说：“我们侦察的消息绝对可靠，没有丝毫可疑。你迅速回杭州，向陈仪说通这件事。请他必须认清：现在的汤恩伯得到一大笔财富，心满意足；同时他只顾自己的身家性命，哪里还会顾及旧恩！请陈先生放弃他的旧观念，迅速设法避难。你再告诉他一遍，只要他飞过江，我们即可保证他的安全。如不听劝，很可能会遭毒手，后悔也无法挽救了。”最后克坚同志谆谆嘱我：“你如果不能说服陈仪，要即刻回上海，免遭汤恩伯毒手。”

我星夜赶到杭州，陈无论如何不相信这一消息。

二月十四日，《杭州日报》发表陈仪免职，调周岩主浙的消息。我立即见陈，意图证明汤恩伯出卖他是实，陈依然不相信。他说：“我刚才同恩伯通电话，他说这件事（陈免职事），事前他完全不知道，请我迅速移交到上海详谈。”陈还宽慰我说：“老蒋日暮途穷，各省主席都要换有实力的军人，江西胡主席、福建李主席，都是这几天免职的，何足为奇呢！”

我只好怀着沉重的心情向陈告辞。陈嘱我：等他回到上海后，可选一个风雨较大的早晨，约陈真如一同到他家谈话。

同月二十一日，陈交卸了职务，浙江各界举行“欢送陈主席大会”。会场在杭州太平洋电影院，公推浙江大学教授郑晓沧先生为主席。郑致词说：“杭州各界人士对政界人员去留，向来不关心，今天欢送陈主席，是第一次。陈主席的作风是民主的，他爱护人民，特别爱护学生。全国各省没有一省肯释放政治犯，而陈主席首先实行了。我们浙大爱国学生被捕，陈主席予以释放，我们一致表示感谢。……”继之各界代表讲话，大都表示惜别。最后陈讲话，大致说：“我这次到浙江，原是决心替父老和人民做一点事，可是事与愿违，一件好事也没有做，实在对不起故乡父老。承各界欢送，既感激，又惭愧！严格地讲，我的一生，对人民多罪而无功，但是我愿乘余年来努力补过，以答谢各界的盛意。”讲完后，群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当日陈仪乘汽车由沪杭公路返沪，直到晚上八时才到上海，仍住多伦路志安坊三十五号。当时就有人告诉陈仪：警备司令部有人在北火车站迎接，这实际上是在监视。陈仪告诉亲人，他在离开杭州之前，蒋介石从奉化打电话给他，要他去奉化，他不肯去，回答说要先回上海。

二十三日，陈住所前后都布满了特务。毛森来见陈时，面告蒋介石要陈移居外地，没有说明任何理由。陈此时已不能自由行动了。二十四日晨，陈仪的五弟陈公亮急匆匆找陈仪的女儿陈文璞，说她父亲要见她。陈文璞问有什么紧急事，陈公亮不肯置答。事后才知道，特务原要扣留陈公亮，后经交涉，才把陈公亮带到汤恩伯处，虽然免于扣留，但汤恩伯威胁他不得将此事告知

外人，否则对陈仪的生命安全概不负责。

父女相见后，陈仪告诉女儿：汤恩伯要他去衢州居住，当天下午就要乘飞机前往。陈文瑛问他为什么要到衢州去？汤恩伯是否能担保他的生命安全？他说：这个大概没有问题。因为有特务监视，不便多谈。

当天下午陈文瑛又去多伦路，准备为陈仪送行。趁特务监视稍为疏忽的机会，陈仪暗示陈文瑛通知有关同志免受牵连，并安慰文瑛说：“革命总要流血的。”

因为天气不好，去衢州的飞机延至二十七日才起飞。到江湾机场送行的只有陈文瑛。同行人员有炊事员陶承喜、勤务兵陈树声，另外有三个特务押送。

陈仪从二十一日到沪直到二十七日离沪，汤恩伯一次都没有来看陈仪，有什么话都是通过毛森传的，只是在陈仪到衢州后，才接到汤的一封信，说他很痛苦，有难言之隐，俟以后到衢州去看望陈时再面陈一切。但是直到陈仪从衢州又押往台湾，汤恩伯始终没有去见过一次陈仪。

陈文瑛对其父亲的安全至为关怀，到处设法求救。三月上旬陈公亮来通知陈文瑛：何应钦已来上海。他们一起去见何。一见面何应钦就说：“你父亲真是个老实人，怎么会和汤恩伯搞在一起，他把你父亲给他的字条，报告了蒋介石，还到处拿给别人看。”接着何应钦给了陈文瑛一份《东南日报》，那上面登载着陈仪被捕的消息，说陈仪是国民党的叛徒！还点到胡邦宪、丁名楠等人的名字。何还说：此事因为通了天（指由蒋介石亲自处理），所以无能为力。

这时，陈文瑛想去衢州探望陈仪的心情更加迫切，因而直接

写信到衢州，请陈仪允许她前去。三月中旬接到陈仪的回信，同意陈文瑛去衢州。

陈文瑛和陈仪一见面时，陈仪就说：“他们为什么要软禁我，他们没有这个权力。”当陈文瑛把带去的《东南日报》给了他，并把何应钦讲的话都告诉他后，陈仪淡淡地说：“啊，真的如此！以后我们不要再谈汤恩伯了。”接着又对陈文瑛说：“我自身不慎，信人太过，遭了暗算，唯一顾虑，不要再害了朋友。”陈文瑛说：“报上没有见到什么事，想来他们是安全的。”这时陈仪才稍稍得以宽慰。

陈文瑛在衢州陪陈仪半个月，陈仪读书看报，一如既往，谈吐议论非常镇定，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充满了信心，并劝慰陈文瑛全家安心留在上海，等待解放。因文瑛有儿女在上海，陈仪屡催她返沪，文瑛不得已才告别她父亲离开衢州。

五月初，浙江快解放了，陈仪被特务押解到台湾基隆要塞拘禁。

一九五〇年春天，张群、何应钦、陈诚等人要求蒋介石对陈仪从宽处理。蒋提出要陈写一封公开信致张治中、傅作义两将军，表示自己已深知罪过，当痛自改悔，并谴责张、傅两将军“背叛党国”。陈仪立即表示：“张文伯、傅作义两将军敢于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做得十分勇敢，没有什么可责备的。我生平只有这一件事（指准备反蒋）还算对得起自己，更没有什么可改悔。”完全拒绝了蒋介石的命令，蒋十分震怒。

同年六月九日上午，国民党国防部军事法庭匆匆审讯陈仪。许多中、高级军官参加了旁听。据当时目睹者说，陈仪穿着整洁的西服，昂然进入法庭，面容严肃。接着证人汤恩伯穿着上将服

悄悄地走进法庭，面对陈仪，不自觉地向陈仪敬礼，陈仪视而不见，引起听众肃然起敬！

法庭问陈仪：“为什么要勾结共产党？”陈答：“我们联合共军，意在保护沪杭江浙人民不致遭受兵灾，蒋家军纪败坏，什么祸国殃民的坏事做不出来？汤恩伯中途叛变，他保护了沪杭江浙人民没有？我为人民办事，何罪之有！”

庭长无话可问，要汤恩伯指供。汤立在证人席上，反而面如灰土，嗫嚅着说：“我对犯人陈仪，确实是一生受恩深重，难以言喻，正图报不暇，何肯检举他？只因我忠党爱国情深，不得不忍痛检举，不能再顾到陈仪对我的深恩大德。”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八日早晨，台湾国防部军事法庭通知陈仪到庭，问陈还有什么交代。陈答：“死后火葬。”再问，陈傲然不答，态度镇静，神色自然，身腰笔直，着米色西服、呢帽、黑皮鞋，领带结得十分整齐，从容就义。

本日香港《星岛日报》（胡文虎办）把陈仪的判决书全部刊出，次日又把陈仪从容就义的情形，也如实披露。其它报纸，都是有节略的刊布。

（编者注：本文胡允恭同志最初写于一九六三年。一九七九年又充实为第二稿。一九八四年周加才同志曾帮助整理过一稿。一九八五年郝雨同志以第二稿为主要依据，撰成此稿。）

父親在大陸最後的日子

陈文瑛

陈仪原是我的二伯父。我的生父陈威（字公孟）是他的长兄。因二伯父无子女，我从小就被过继给他，改称生父为“大伯父”，称二伯父为“父亲”。从过继时起，我就和陈仪生活在一起，直到我结婚后仍与他住在一起。他的慈爱、关注、教导始终萦怀在我心头，他的为人正直、处事谨慎也给我极好的身教。父亲一生的经历错综曲折，历来褒贬不一，毁誉参半。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他生活在中国历史上动荡最剧烈的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时代潮流滚滚向前，大浪淘沙，一个人的思想行动随着时代潮流大起大伏是理所当然的。父亲爱国爱民，追求正义，清廉方正，欲有所作为，但囿于阶级的局限，思想的局限，一生奔波，四处碰壁，也自觉或被迫地做了许多反人民的错事。只有到了后期，他逐渐接触到包括马列主义在内的各种新思想，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向前推进，新中国的光明前景出现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时，他终于明辨了是非，幡然醒悟，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得救。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说过：“国民党已经不可救药了，好比一只烂桃子，只好让它烂下去，留下的桃核自会萌发出一株新桃树来。”后来，他又积极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一些对革命有利的工作，最后为人民解

放事业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就给他的一生做了最好的总结。

在父亲就义前的一段时期里，我是唯一与他保持密切联系的亲属。当他被捕后囚禁在浙江衢州时，我从上海赶去探望，与他朝夕相处生活了半个月。这不仅使我在他生命未息之际给了他最后的慰藉，也使我多年一直向往的侍奉在父亲膝下的宿愿，得以实现，更主要的是，我有机会对父亲生平的所作所为，对他的思想抱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现在外界对这一段的史实众说纷纭，出入颇大。我谨将我所见所闻笔录于此，以备关心者参考。

一九四七年四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撤销，父亲调任国民政府顾问。五月初他离台湾飞南京，旋即返沪，接着又去绍兴原籍探亲访友，因为旅途劳顿，加上长期为糖尿病所累，心力交瘁，回上海后他就深居简出，埋头读书，间或招几个旧友、部下谈天说地。“国民政府顾问”是个闲职，不必常去南京，因此他得以读了许多传播新思想的书刊杂志，自谓颇有进步。当时我每周总要到多伦路志安坊35号（父亲寓所）去几次，总看见他或者读书看报，或者练练毛笔字，状似“无官一身轻”，“悠哉悠哉”的样子。实际上他内心是很不平静的。这个时期他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冷眼旁观，思想变化很大，不仅深刻反省了他在台湾的失败，而且对未来有了新的设想。根据他人所写的材料判断，这时他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很可能就在这一个时期开始了与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但我当时不谙政治，对此全无所知。

一九四八年春，蒋介石的文官长吴鼎昌来电，邀父亲去南京，其时父亲患感冒未愈，辞不获已，勉力一行。到南京后蒋介石很快接见了，以浙事相嘱。父亲以体弱多病，力不胜任为辞，拒不担任。但蒋认为局势紧张，浙江更显重要，非要他出任此职不

可。接见时，宋美龄在座，也竭力劝他帮忙，父亲不得已，答应回沪后考虑省府人选。

数日后吴鼎昌又来电催促，父亲只好再次赴宁，提出省府人选，并要求以汤恩伯为衢州绥靖公署主任（当时汤在陈诚控制下做他的空头副司令），蒋都一一允准。但蒋是否对父亲就完全信任呢，那很难说。举一个小例子：沈仲九跟随父亲多年，一直做父亲的顾问，他的思想比较激进。陈立夫在南京时曾当着蒋的面对父亲说：“这回可不要带沈先生去了。”父亲回来对我说：“这次不能带沈仲九到杭州去，只能让他住在上海，有事再找他商量。”

一九四八年六月三十日父亲在杭州正式就任浙江省政府主席职。父亲这次重主浙江，公开对人说过：“既有倦鸟归林之感，又想在有生之年为桑梓办一些好事。”所以他一到杭州就埋头工作。当时，解放战争已进入高潮，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的达官贵人都在为自身筹划将来。但父亲一如既往，淡泊宁静，丝毫不为个人考虑。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四日父亲在给我的信中写道：“自我接事以来，一般的批评好得多，将来或许会变坏，等我离开以后，又会变好的，这是我的经验，所以说好说坏的话，我一直不大注意。我终究还是个我，保持本来面目。”

这期间父亲的思想明显地倾向革命。有人在史料中说到，他在杭州八个月中“态度是积极的，言论是乐观的，行动是大胆而敏捷的”。我觉得这些评价很对。当时有这么几件事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

一、一九四八年十月间，我到杭州探望父亲。他突然接到蒋介石来电，要他去南京，我便陪同他乘火车先到上海。他在峨嵋

路我的住所住了一晚，第二天早车去南京。后来父亲告诉我，蒋介石要他去南京没有什么事，只表示了有引退之意。父亲当场就表示极为赞成，并力劝蒋出国。

二、杭州《东南日报》记者刘湘女访问我父亲。第一次谈话时谈到政治，我父亲认为政治家“要有成功的勇气，也要有承认失败的勇气”。这段话明显影射蒋介石，在报纸上一登出来就引起社会上的注意，远在北平的邵力子先生也来信表示赞同，但蒋介石听出了他的“话外之音”，大发脾气。第二次谈到“应变”，我父亲引用越谚说，“船到桥头自会直。”暗示了愿意等待解放的意思，又引起一阵轰动。

三、傅作义先生放下武器，响应共产党和平号召，使北平得以和平解放。傅先生的通电传到浙江，我父亲即囑秘书复电，电文为“×日电敬悉”。虽寥寥数字，但诚恳地表达了他内心对傅先生义举的赞赏。

四、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上海的空气也紧张起来，不少人变卖家财，准备离开上海，另谋生路。当时我举棋不定，为此专程到杭州去征求父亲的意见。他很简单而干脆地嘱咐我：“你们安心住在上海。”回想起一九三七年至三八年抗战初期，他一次是催我尽速离开上海，一次是不要我母亲去上海治病，唯独这一次他的决定截然相反，可见，他当时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很信任的。我幸而听了他的安排，安心在上海等待解放，使我的全家今天得以安度幸福生活。

父亲在杭州的言行当然不能符合蒋介石的意愿。一九四九年春节前，父亲到奉化，向蒋介石作礼节性的拜访。临离开奉化时，蒋对他非常客气，对他说：“没什么要紧事的话，可以在奉化多

住几天。”父亲以政事繁冗为由当天返杭。然知蒋的脾气的人说，蒋待人越客气，则结果越不妙。果然，没过几天，二月十七日各报突然刊登父亲被免职的消息。

免职的消息来得突然，事先连父亲自己也毫不知道。这份免职令不是由南京李宗仁，而是由迁到广州的孙科行政院长发出的。毫无疑问，孙科执行了远在溪口的蒋介石的遥控指挥。

二月二十一日上午，父亲向接任的周岩（浙江人，“京”沪警备副司令）办完移交后，即来到太平洋民众电影院参加省会各界的欢送会。随同他出席的还有张延哲、钱宗起、周一鹗、任显群等。浙江大学老教授郑晓沧先生为大会主席。郑教授说：浙江大学从来没有欢送过达官贵人，今天师生欢送陈主席，不是因为他浙江人，而是因为他爱国爱民，爱乡里，爱护青年。最后我父亲致词，他说：这次回乡本想为人民做点事情，但是做得很少，今天承大家这样热情欢送，觉得很惭愧，感谢大家的盛情。他说话时态度从容，语调平和，十分谦虚，但只字不提国民党和南京政府。

父亲一行离开杭州时已近中午，同车有钱宗起、蒋授谦和王占周。任显群及其家属则乘另一辆车随行。下午四时到闵行渡口，发现还有一辆吉普车在后跟随，状似特务跟踪监视。天气阴沉，轮渡借口雾重停开，经交涉后方开放。抵达上海多伦路寓所已是晚上八时。当时在多伦路寓所等候的有陈公亮（我五叔）、袁守谦（我七姑夫）、徐学禹（招商局总经理）、我丈夫项经方与我。我父亲说：不做主席也好，回上海还有许多事情可做。他还说：离杭之前，蒋介石从奉化打电话来，要他到奉化去，他不愿意去，就找借口先回上海来了。

任显群因家属同行，直接回家。后来据徐学禹说，因为杭州“欢送会”一事，特务要扣留他，经吴国桢（上海市长）作保，总算没被扣留，但迫令马上离上海去台湾。

自从父亲到上海以后，我一有空就到多伦路去陪伴他。二十二日我陪父亲去探望亲戚。二十三日下雨，我没有去，然而不幸的事情就在这一天发生了。

那天特务头子毛森带了十多名特务包围了寓所，把我父亲和继母陈月芳监视起来。他们企图把我父亲立即绑架到台湾，我父亲坚决不肯，旋决定解到浙江衢州。我父亲提出要与我见面。

二十四日清早，我五叔来接我，说我父亲叫我去。我觉得很奇怪，紧着问有什么要紧事。五叔不肯细说，只是说：“你去了就会知道的。”五叔开车送我，未到寓所门口，在转弯处他就停下车，让我独自步行去。事后我才知道，二十三日毛森来的时候，五叔正在我父亲那儿，特务本打算扣留他，经交涉，才把他带到汤恩伯处。虽然免于被扣，但汤威胁他，不得将此事告诉外人，否则汤不能担保我父亲的生命安全。汤恩伯又令他来通知我。

我独自走到父亲寓所门口。给我开门的是一个穿军服的陌生人，我没想到家里会有什么大事，只觉得很奇怪。更奇怪的是，那人一直送我上楼，送上楼后他居然站在门口不走了。我看到父亲和继母坐在阳台上，神情非常严肃愤怒。我这才意识到家里出大事了。父亲见到我就说，汤恩伯要他去衢州，下午就乘飞机走，继母则两个星期后再去。我问他：为什么要到衢州去？父亲说：汤恩伯要他去衢州休养。我又问：汤恩伯是否能担保他的生命安全？他说：这个没有问题。因为有特务监视，我们说话不便，我只好要求下午去送他，他同意了。我就告辞出来。当时我

心中又急又怕，出来后就去找我五叔打听，但他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他告诉我，毛森来时，徐学禹也在场。特务把副官王占周、勤务兵师满盈带走了（后来我父亲到衢州后，徐学禹把他们保释出来）。

下午我再去多伦路。因天气阴雨，飞机不能开，父亲那天下午没有走。我和父亲说着家常话。乘另一个特务上来与监视我们的特务说话的那一刹机会，我父亲急急地暗示我通知沈仲九、丁名楠躲起来。他还轻轻地说：“革命总是会有流血的。”

我离开多伦路后就直接去通知沈仲九。因丁名楠已于二十三日乘车返回杭州，我立即托我丈夫的侄儿项斯琨赴杭州去通知他。沈、丁两人随即就隐蔽起来，没有被反动派抓到。

那几天连日阴雨，去衢州的飞机不能起飞。我每天去看望父亲，我心中很为他担心，但又不愿表露出我的忧虑，只能跟他谈谈家常，以分他的心。

二十七日雨停，飞机下午起飞。我又到江湾机场为他送行。押送我父亲去衢州的有三个特务，机场上阴霾满天，一派萧瑟景象。随父亲去衢州的还有勤务兵陈树声及炊事员陶承喜。

父亲到衢州后就寄我一封短信，信中写道：

文瑛吾女：

昨在机场别后，一路都好，衢州机场虽尚有积水，因飞行员技术甚优且很小心，故安全降落，毫无故障。因衢州上空多绕几转（为侦察机场跑道）故少费时间耳。

仪 二月二十八日

虽然只有这寥寥数语，但使我安心不少。因为我从信中看到

他一如既往的坦荡和镇静，并未露出一丝一毫为自己安危而惴惴不安的迹象。

这里要提一提徐学禹。特务拘禁我父亲以后，我找过徐，探听究竟，但徐守口如瓶，只字不肯说。后来我去衢州之前又去看他，他告诉我，蒋介石叫他到奉化去过，并说，蒋介石很恨沈仲九，只要捉到沈仲九，我父亲就可释放。我知道徐与沈原有宿怨，这些话都是骗我的，无非是想多捉些人而已。因此不去理会它。我由衢州回来后再去看他，他问我父亲说了些什么。我答道，我们父女之间除了家事以外，什么也不谈。他听后，态度马上冷淡下来。以后我们就没有再见面。我不清楚徐学禹在父亲被捕一事中究竟充当了什么角色，但我感到他是个不光彩的角色。

父亲在衢州两个月的监禁生活中，经常与我通信或通电话。我寄给他的信用的地址是：“衢州东门开明坊一号”，收信人姓名写的是“陈树声”。

父亲一生所念兹在兹者惟国家的安危和民族的前途。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我今天有一件事告诉你：我的胡子今天早晨已剃掉。这胡子是民国元年三月间留起来的，那时我正卅岁，到今已足足卅七年了。剃胡子的动机是去年十月在南京参加粮食会议时，我的日本士官同学（同期同班并且同一书桌的）何成浚先生（字雪竹，湖北人）多年不见，忽然碰见，他就劝我剃胡子。问他为什么？他但说无用，不好看。我说我的胡子已有卅多年历史，剃掉觉得可惜。他说，你不要可惜这一点。自从被何君说了以后，对胡子的爱惜渐渐的动摇了。这次来衢州，是我有生以

来未尝有的意外的遭遇，不可以无纪念。所以今早我自己用剃刀把它剃了，作一个永久的纪念。

我一生淡泊，别无希冀，所念兹在兹者为人民，为国家，想把我未尽之生命作涓滴之贡献。我现在仍觉得时间不够，因为要补充我的不足，需要读的书很多，总是读不了。有一本《战后苏联印象记》（系英国人詹森著，宾符译的，上海世界知识社出版）我这里有此书，无庸寄来，你可买来读一读，请经方也可一读。

父字 三月十五日

这封信是父亲身被拘禁以后写给我的最长，也是最重要的一封信。从这封信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父亲当时对自己的处境和未来都是非常清楚的，但他丝毫不为个人的安危考虑，而是思虑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他明白无误地表示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向往。

我在给他的复信中不便涉及时政。老实说，我当时还十分幼稚，根本不懂政治，因此信中大多是写一些家庭琐事，亲友交往，并一再劝他多多保重身体。我知道父亲对部下的安危非常关心，为了免除他的惦念，我请蒋授谦、周一翮代我写信，父亲见到他们的笔迹可以知道他们都是安全的。

三月上旬五叔陈公亮来通知我，何应钦要我去谈谈，我就在他的陪同下去见了何应钦。何应钦和他妻子，还有包志宁（王伯群的妻子）一起与我见面。一见面何应钦说：你父亲真是个好好人，怎么去和汤恩伯搞在一起。汤把你父亲给他的条子到处拿给人家看。何应钦又给我看一份《东南日报》，那上面登载着有关我父亲的事。大意是说：陈仪是国民党的叛徒，与共产党有勾结，

共产党提出了三个条件等等。报上还提到胡邦宪（即胡允恭）和丁名楠的名字。当时我并不了解父亲的事，但我对父亲是信赖的，我相信他这样做一定是有道理的。因此我对何应钦的话没有回答。

我去衢州探望父亲的心情是很迫切的。我想去的目的有三个：一是探望他老人家的健康，因为他长期患糖尿病，身体虚弱，今又独处异地，我不能不为他的生活和健康担心；二是我急于告诉他《东南日报》的消息和何应钦与我的谈话；三是我希望父亲能告诉我怎样设法营救他。

三月十七日父亲来信，同意我去衢州。他信上说：

现在我的下落，经汤恩伯公开向记者说明以后，已大家知道，不必再秘密。所以你来一趟也好。

父字 三月十七日

三月二十日我带师满盈从上海乘火车去衢州。浙赣路车行甚慢，火车常常误点，我到达衢州时已是掌灯时分，街上很暗，什么也看不清。有几个特务和汤恩伯派在那里的严副官来接我。我们一行来到父亲的寓所，父亲还在等着我吃晚饭。我一见父亲，喊了一声“爹”，就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父亲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他们为什么软禁我，他们没有这个权力。”我们父女俩一起吃了晚饭，饭后就一直在楼上书房里坐着谈话，直至深夜。我把带去的《东南日报》拿给他看，又把何应钦说的话告诉他。父亲告诉我许多事情。

一是关于与胡邦宪联系之事。父亲告诉我，胡邦宪是他的旧部，原是共产党员，脱党以后曾在福建当过县长。父亲是通过胡与共产党取得联系的。父亲十分郑重地对待与共产党联系的事

情，因此他没有将细节告诉我。

二是与汤恩伯联系之事。父亲与汤恩伯早就认识。汤在读书求职时多次受到父亲的帮助和保荐。汤平时对我父亲十分恭顺，一直以“恩师”相称。有一次汤去见我父亲，流露出对蒋的不满，又说自己有两支军队，一支在常德，另一支在某地（地名我不记得了），准备反蒋。我父亲劝他不要轻举妄动，并约定以后汤负责军事，我父亲负责政治，俟时机成熟时起义。他还说此事从未向任何人道及。由于有这一层关系，我父亲对汤更是信赖。却不料事未成，机已泄，父亲被解职，被软禁，被解送衢州。即使到了此时，父亲还没有完全识破汤的庐山真面目。他把汤给他的信拿给我看，信是汤亲笔写的，大意是，他很痛苦，有难言之隐，俟以后到衢州看我父亲时再面谈一切等等。所以我父亲当时还以为汤是受到外界压力，或者是在别人的威胁下，出此下策。还在等汤到衢州去。但汤终究没到衢州去。他出卖了我父亲，一手破坏和平解放事业，使老人受到囚禁之苦，同时却依旧施展其伪善的欺骗手段，实在令人切齿痛恨。

三，我父亲问我沈仲九和丁名楠的近况，我告诉他都已通知他们躲起来。我告诉父亲，徐学禹说捉到沈仲九可以释放我父亲的话；还告诉他沈叔瑜（沈仲九之弟）来找我，想让沈仲九之女去求汤恩伯为沈仲九找一个安全的去处，被我极力劝阻了。我觉得徐学禹与沈仲九原有宿怨，可能是想乘机陷害，至于汤对我父亲尚且如此，如今要求他为沈仲九找一安全处，不啻飞蛾投火，万万使不得。父亲认为我的分析是对的。

父亲希望丁名楠最好通过与共产党有关系的同学和朋友赶快到共产党那边去。当时我与丁已失去联系，因此此话直到解放后

我才告诉他。

说到家庭的安排时，我告诉父亲，父亲被绑架到衢州后，对多伦路寓所的监视撤销了。我父亲认为继母的精神不再受到威胁，行动能自由，倒不如仍在上海，又考虑到继母来到中国几十年（她是日本籍），不忍她在老年再受失去自由之苦，因此继母未去衢州。

我们就这样秉烛面谈，直至深夜。

第二天清晨我起床后才看清楚父亲居住的房子和周围环境。

据说这所房子是汤恩伯在衢州的住宅。五开间的一所楼房，前面有花园，共占地两亩多。楼房上层东面第一间是我父亲的卧室，第二间隔成前后两间，前间是书房，后间就是我的临时卧室。中间一间是客室，平时吃饭就在这里。西面两间白天关着门，我不记得是否有人住。从楼上窗口可以望见花园的大门口，门口有警卫站岗。特务、严副官等都住在楼下。楼上没有人监视。我父亲说：“精神上亦不如在沪时受威胁，得以静养读书。”“余独居生活已习惯，怕烦嚣而不怕寂寞”。他在给我的信中还写到，“此间张司令官雪中（是陆军大学将官班毕业的）待我甚亲切，打电话、通信均自由。我也自知谨慎，免得他们为难。不出门，不见客，每日读书，吸纸烟，吃饭，睡觉。”

父亲的日常事务由严副官照料。每日菜蔬由陶承喜去买，有特务跟随。

父亲在生活上的要求本来不高，喜欢吃家乡菜，如笋干炖豆腐、“盐种”（绍兴话，即炭火上煨透的粗盐）炖豆腐、鱼干、咸鸭蛋、干菜丝瓜汤等等。每天早上吃两只嫩鸡蛋（用沸水泡两次即食）。

父亲在衢州订阅的报纸有上海的《新闻报》、《申报》和杭州的《东南日报》，杂志有《时代》、《世界知识》、《展望》、《文学评论》、《中苏文化》等。他手头经常看的书有鲁迅、茅盾的作品、《战后苏联印象记》、《大众哲学》和中国的历史著作。我到衢州去时还遵照他的吩咐，带去《辞源》下册及续编。

我在衢州住了两周，我们朝夕相处，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父亲几十年忙于政事，父女俩很少有机会促膝长谈。

在这两周中，使我终生难忘的是，他总是正襟危坐，读书看报一如既往，谈吐议论都非常镇定。他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充满信心，他要我一家安心住在上海，等待解放。他说：“经方（我丈夫，当时是上海市立第六医院院长）是医生，将来共产党用得着的。”

书房墙上挂着一张很大的地图，每天看完报，他总要指出解放军进展的地方给我看。国民党军队撤退，就是解放军胜利前进。他说：“将来解放军所有的地方都会到的，逃出去有什么用？！”

父亲敬佩毛主席，敬佩共产党，看到报载邵力子和张治中去北平和平谈判，他说：“假使我当政的话，别人比我治理得好，我一定自己去北平谈判。只要有诚意，共产党是会接受的。”

他对个人的安危只字不提，生死置之度外。他知道蒋介石对他不满意，不放心。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毛森之流早就造舆论说，万一浙江发生事变，陈某人是靠不住的。父亲说这次被撤职直至拘禁，“远因近果很多”。

我问他是否会把他送到台湾。父亲未作正面答复，只是说，“我要留在此地，共产党是不会难为我的。”又说，“我这样做不是为我自己。我这样大年纪了，将来我不会出来做事。我对共

产党的一套做法是不懂的。我只为江南千百万百姓免受灾难。北平的和平解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了你们年青一代将来能过好日子。”

有一天他对我说：“将来共产党胜利后，国旗一定要改的。你想想用什么做图案好？共产党是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上面用‘众’字做红旗好吗？”

他的乐观和镇定大大地感染了我。他一生爱国爱民向往正义，向往光明，早年信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以后继续探索真理，几十年未有丝毫怠懈。终于，在他个人生命即将以悲剧结束的时候，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是中国共产党。他立刻毫不犹豫地作出抉择，为中国革命新阶段的到来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他的思想境界升华到一个更高的阶段。我日夜侍奉在他身边，充分感受到这一点。因此我回到上海以后，既没有去向反动派屈膝求情，也从未打算移家海外。

四月初浙江形势开始紧张。我父亲担心日子一久我可能也会被扣留，因此急急催我回上海。四月九日我就离开衢州。

那天清晨我们早早就起来了。父亲陪着我吃早饭，吃完饭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就坐着闲聊。父亲千叮万嘱要我安心住在上海，等待解放。后来他说：“我送你下去。”父亲到衢州后还从来没下过楼，这天他一直送我到门口，我看到他的双眼含着泪。我不忍使他过分激动，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可是我除了再三要他注意饮食，保重身体以外，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一坐上汽车，我终于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我回头看见父亲还和平时一样衣着朴素整洁，频频向我招手，我也向他挥手，一直到转弯看不见他的身影为止。直到上火车后我还是无法抑制离别父亲的悲痛。我知

道“别时容易见时难”，却万万没想到此一别竟成永诀！

衢县翁县长的妻子和严副官送我到火车站。车行半途，因铁路被炸，停车抢修。第二天才到达杭州。平时衢州下午能收到杭州的报纸，那天火车不通，父亲下午没收到杭州报纸，就一直为我的安全担心。当晚就派人到车站打听，又打电报到杭州询问，直到收到我平安到达上海的信才放心。

我收到父亲自衢州寄出的最后一封信是四月二十七日。其中说：

我眠食如常，心境安静，一切都好，勿念可也……

此间楼上楼下的电话均行拆卸。此后只好时常通信，不能打电话了。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随着形势的紧张，反动派对他的监禁也日益加严了。

四月二十九日，父亲在未被准许告诉任何亲人的情况下，被绑架到台湾。据翁县长后来到杭州对人说，第一次由他去通知我父亲，要送他去台湾，还说汤恩伯说到了台湾就可以完全自由。我父亲当即义正辞严地予以拒绝，坚持要回上海；第二次换了别人去，骗我父亲说已同意送他回上海。待他上飞机后，飞机却直飞台湾。据说此后父亲被拘禁于台湾基隆。

到台湾后，我父亲曾来过数封信。五月九日的信说：

我昨日接到你五月四日的信，很高兴地看了两遍。因为我到台北已十日，没有接到你的信，时在挂念中。……你唔娘（即继母——瑛注）是否来台问题，我已于本月六日复你唔娘请其不要来。……汤恩伯虽说“在台湾完全可以自由”，但事实是不然的……现在和在衢州

大致差不多。……我想你四姑、七姑再过些日子总会来看我的，基隆离台北有相当的路，来时恐须总部的陪同来，这也许是迟迟不来的缘故。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到，父亲到了台湾以后，不仅行动没有自由，反而受到更严格的监守，不得会见亲朋好友，要会见得“总部”的陪同。我七姑夫袁守谦离上海去台湾时，我曾托他带火腿和黄油给父亲，但父亲来信从未提及收到，可见在“总部”的严密监视下，他并没有收到我带去的東西。

不久上海就解放了。此后父亲就不能直接给我来信，而是要通过香港转。我寄给他的信是寄到香港九龙山林道三号二楼唐庚先生转陈郁芬（我九姑——瑛注），再转我父亲收。

解放后我很快就去信报告我们全家平安的消息。父亲知道后很高兴，他在八月二十七日来信说：

我昨天接你八月三日的信，知你们平安，甚以为慰。

我起居饮食俱好，生活也习以为常，惟通信断绝，不觉惦念耳。糖尿病近来虽未检验小便，但我饮食很小心，酒绝对不喝，所以不觉得厉害。

我收到父亲的最后一封信是十月十四日写的，此后便音讯突然断绝，我再也见不到他那端庄的颜体书法的信札，再也得不到他的一点消息了。

一九五〇年六月我六叔陈公培从香港回来，带来了几张香港报纸的剪报，从那上面我才知道父亲已于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八日被蒋介石枪杀。这不啻是一声晴天霹雳，顿时使我肝肠寸断，痛不欲生。

据说父亲被绑架到台湾后，蒋介石要父亲承认错误。父亲回

答：“我一生做了许多错事，惟这件事做对了。”蒋要他写信指责张治中，也被父亲义正辞严地拒绝了。蒋见父亲威武不能屈，就组织了“特别法庭”，以顾祝同为审判长，进行审判，判决的罪名是：“勾结共党，阴谋叛乱。”在审判后不久，父亲就慷慨就义于台北。记得港报上还登载了一张父亲就义前的照片。照片上父亲身穿西装，带黑领带，气宇轩昂，神色镇定，正气凛然，视死如归。我当时泣不成声，不忍卒读。但父亲遗像上的神态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至今未有丝毫淡薄。

父亲被害后由我五叔公亮收尸火葬。将骨灰安葬在台北，立碑曰“陈公退素之墓”。“退素”是父亲的自号。父亲生平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为人耿直，清廉方正，与一般国民党官僚不甚相得，故常遭物议，但父亲不为所动，以“我行我素”为处世指导思想，故自号“退素”。这只有至亲好友才知道。五叔以号为名立碑，可免遭国民党当局的破坏。

父亲一生中最光荣的一件事就是起义，这件事的大致经过据我所知是这样的：

一九四九年一月我父亲告诉丁名楠，他已和胡邦宪商议好，拟派丁去上海见汤恩伯联系起义事宜。父亲亲自用原珠笔在便条纸上写了甲、乙两项交丁带去，甲项是（一）释放一切政治犯；（二）保护京沪等地的公私财物，不得破坏；（三）停止修筑工事。乙项是做到上列各条以后，按照新民主主义原则改编所属部队，取消战犯名义，并给汤以适当的位置。便条上没有署名，我父亲在衢州时告诉我，如不说明，还不易认出是他的笔迹。另外，父亲还囑丁口头向汤转告：（1）要开放长江渡口，迎接江北解放军，（2）劝汤多住上海，少去南京。丁去见了汤恩伯，谈了上

述内容，汤表示同意，但说时机未成熟，不宜进行，并答应日内去杭州与我父亲面谈。

一个多星期后，我父亲未见汤来杭，又派丁名楠赴上海，并携带一封信，介绍胡邦宪去见汤恩伯。这封信很简单，只说明胡是他的旧部，希望予以接见。我父亲并推荐丁名楠去警备总司令部任秘书，以便于今后的联系。

汤恩伯接见丁名楠时，假惺惺地表示完全同意我父亲的主张，又说秘书的委令马上可以发下。丁当时就住在多伦路我父亲的高所等候委令。不久警备总司令部派人去看了看多伦路的房子，毛森也约丁去面谈，问问履历后又说，委令即可发下。但胡邦宪并没有去见汤，后据胡说，上海党组织发现汤不可靠而没有去。当时我父亲还没有觉察到事情可能发生变化。现在分析起来，警备总司令部看房子，毛森约丁名楠面谈，都是事出有因的。

丁名楠不久就返杭州向我父亲作了汇报，并取行李准备去警备总司令部工作。我父亲第三次派丁名楠来沪时交给他致李宗仁代电稿一件，内容是要求李宗仁调走驻在浙江境内浙赣路沿线的国民党军队，停止征兵等等。我父亲要丁把这份电稿交汤恩伯看，如果汤同意，浙江马上以正式公文发出。可是丁名楠到上海的第二天浙江报上就登出我父亲被免职的消息。丁见到后去见汤恩伯，问浙江省政府改组与进行中的事情是否有关，汤矢口否认。丁回到多伦路后与父亲通电话，将见到汤的情况告诉我父亲。这以后，事情急转直下，前面都已说过了，这里不再赘述。

父亲毕生爱国爱民，走了许多曲折的道路。最后才找到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一条真理。他早在三十年代就写下

他的理想：“入其境，田野辟，道路平，学校、工厂多，山林葱翠，河川通畅，衣服、屋宇皆整洁；及至旅舍，招待亲切，宾入如归。这是文明国家一般的现象，我们也应迅速做到。”这在旧中国只是幻想。只有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父亲的理想才成了现实，不仅如此，更美好的前景在招唤着我们。父亲若地下有知，必将含笑。

一九八三年是父亲诞生一百周年。抚今思昔，我格外缅怀父亲。每思往事，情不自禁。本文所述仅是沧海一粟，容当陆续补充，以供关心史实的同志参考。

（项斯文 整理）

陈仪被捕后的四封信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五日发自浙江衢州：

文瑛：

你十日夜写的信，我已收到，新闻报也收到。我一切都好。你如果要来看我，过些日子来一趟也好。我今天有一件事告诉你：我的胡子，今天早晨已剃掉。这胡子是民国元年三月间留起来的，那时我正卅岁，到今日已足足卅七年了。剃胡子的动机，是去年十月在南京参加粮食会议时，我的日本士官同学（同期同班并同一书桌的）何成浚先生（字雪竹，湖北人）多年不见面，忽然碰见，他就劝我剃胡子。问他为什么？他但说无用、不好看。我说我的胡子已有卅多年的历史，剃掉，觉得可惜。他说你不要可惜这一点。自从被何君说了以后，对于胡子的爱惜，渐渐地动摇了。这次来衢州，是我有生以来未尝有的，意外的遭遇。不可以无以纪念。所以今朝我自己用剃刀，把他剃了，作一个永久的纪念。我一生淡泊，别无希冀，所念兹在兹者，为人民，为国家，想把我未尽之生命，作涓滴之贡献。我现在仍觉得时间不够，因为要补充我的不足，需要读的书很多，总是读不了。有一本《战后苏联印象记》（系英国人詹森著，宾符译的，上海世界知识出版，我这里此书，无庸寄来）。你可买来读一读。请经方也可一读。祝你起居安善！经方均此

你唔娘请将此函送她一阅

父字 三月十五日

文瑛

你十夜写信给我，我已收到，并向报社刊出。
 我一切都好，惟因年来看报，这些年来，
 熟文如，我亦天有一待字未题你，我的信
 子，今天于晨刊出，这封信是民国元年方向
 而起，在的即时我出叶版，到今，已足，廿六年
 了，别期于知，初我是在十月在南京参加特
 会，会报，我知，本工官同学，向都，因，何
 成，清，无，气，时，受，多，年，不，见，而，忽，然，提，是，他
 就，在，我，别，期，于，向，此，在，在，原，然，但，说，在，因，不
 陪，看，我，说，你，的，信，子，已，有，多，多，年，的，历，史，别
 排，受，的，不，惜，然，说，怕，不，要，不，惜，这，一，旦，自，便，被
 何，君，说，了，以，后，别，期，于，的，爱，惜，渐，以，如，在
 了，这，次，来，浙，州，之，然，有，生，以，来，未，有，有，的，查
 外，他，速，过，不，可，以，本，记，念，不，以，今，期，找，自，己，自，到
 只，把，然，到，了，你，一，个，永，久，的，能，念，我，一，生，深，记，
 别，无，希，冀，而，念，在，三，苦，者，乃，人，民，为，国，家，
 想，把，我，亦，查，一，曾，今，作，清，滴，一，重，就，我，在
 仍，觉，的，时，间，不，好，因，为，要，随，之，行，的，不，是，常，去
 读，的，书，极，多，他，主，强，不，了，有，一，本，群，报，致，群，开
 东，礼，一，作，英，国，人，刺，杀，夫，刺，杀，洋，的，女，海，世，界，知，识，性。
 出，巡，你，不，要，来，请，一，说，我，信，子，
 你，越，来，越，善，能，在，此，时
 你，信，报，亦，亦，在，地，一，句，父，字，有，善。

陈仪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五日给女儿陈文瑛的信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七日发自浙江衢州：

文瑛：

我前日寄给你的信，想必先此收到。我昨晚与你唔娘通电话，她说：你快要到衢州来。现在我的下落，经汤恩伯口开向新闻记者说明以后，已大家知道，不必再秘密。所以你来一趟也好。你来的时候，可带师满盈同来。我书桌上的一块蓝布写字板，最好替我带来。

经方均此

父字 三月十七日

再 我曾两次写信给你五叔，第一次托他定购杂志四种，第二次托他买“中苏文化”（亦是杂志），想必均已收到。那书已交邮局寄出，不必说；如未寄出，请一并托来友带来。

一九四九年五月九日发自台湾省：

文瑛：

我昨日接到你五月四日的信，很高兴地看了两遍，因为我到台北已十日，没有接到你的信，时在挂念中。你所问的几点，

（一）你唔娘是否来台的问题，我已于本月六日函复你唔娘，请其不要来。（二）一切东西我都不要。因为一切食用、器物均由公家置备。至于衣服，夏衣已带来，足够应用。（三）报纸是有的看的。——台湾报是新生报和中央日报，又台湾版的大公报，上海报是申报。你五叔替我定的杂志，我已经有信给你五叔，如能寄来固好，不寄亦可得，因为我还有别的书可看——台湾有书店，亦可托吴副官去买。（四）汤恩伯虽说：“在台湾完全可以自由。”但事实是不然的。因为各主管官的责任问题，他们总觉得

小心点好，这也是难怪他们的。现在和衢州大致都差不多，一、礼貌很恭敬，说话极客气。二、余的饮食起居都很关心，使无不适。三、吴、朱两副官对陈树声、陶承喜，都很客气。四、通信尚自由。——来信有封检扣，余当无所知。报纸、书刊可阅看。五、亲友则务使不接见。——你四叔七姑，至今没有来过。（您四叔处，我一到台北，即托项副处长、林副处长通知他，七姑处托彭副总司令通知的）七姑夫已于六日到台北，（是日午后彭副总司令来看我，恰巧总司令部来电话，云袁守谦已到台北，明日要回去，现须与他见一面。于是彭就告辞回部。）也并没有来看我。我想你四叔、七姑，再过些日子，总会来看我的，基隆离台北，有相当的路，来时恐须总部的人陪同来，这也许是迟迟不来的缘故。台北熟人虽很多，因为这种关系，除了警备总司令部及基隆要塞司令部的主管官以外，绝没有人来。好在现在我已静居成习惯，亦不希望亲友来看我，只要有报看，有书读，一日的光阴，很快地就过去了。请你们一切放心好了。

经方的侄子，已提早结婚。甚好甚好。遥祝新夫妇和谐美满的幸福。请你为我致意。

经方均安

父字 五月九日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五日发自台湾省：

文璞：

十一日我给你的信，想必收到。昨日接你十二日的信，已读过。（一）企止到台北后，没有来见我，托他带来的火腿牛油，也还没有送来。好在不等吃，过些日子，也许七姑会来。（二）寄衢

州的信纸没有收到，此地信纸有的买，请你不必购寄了。（三）托伯羽转交的信，至今未转到。（四）此间用钱，大部分都是公家出的。要另用时，可以现银圆兑换台币，一切没有甚么不便。

你唔娘来信，怕我坐着不动，需要散散步。此地散步倒比衢州方便，因为房子系平房，房屋四周，有点空地可以散步。此地是一个小高山，位置在基隆港口，所以风比较大，下雨的日子亦较多，但因此，气候比台北凉快点。我到旭丘以来，天气最热的时候，室内温度亦不过八十四度。昨天下雨，只有七十四度。我昨天写信给你唔娘，想买两只手表送给陶承喜和陈树声，因为他们没有表，公家又没有钟，感到不方便。并且可以给他们做个纪念品。买好后托便人带台北，交警备总司令部彭副总司令孟缙（号明熙）或军法处处长徐世贤转交给我，均可。

祝 你们健好！

经方均此

父 五月十五日

斯文：你写的信我看过了。谢谢你，我还要过些日子才回来。我希望回来时看见你更聪明！更乖！更健！

你的公公 五月十五日

附件：

国民党政府对陈仪的判决书

(国民政府国防部高等军法合议庭
卅九劲功字第六十八号)

被告陈仪（陆军二级上将），男，年六十八岁，浙江绍兴人，前浙江省政府主席。

右被告因叛乱一案，经本部判决如左：

（一）主文：陈仪煽惑军人逃叛，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除留其家属必需生活费外，全部财产没收。

（二）事实：陆军二级上将陈仪，前在浙江省政府主席任内时，与左倾分子接近，致受环境濡染，思想变迁，徇于共匪局部和平之邪说，适徐蚌战役后，匪我隔江对峙，阴谋发动和平攻势之际，被告于卅八年^①元月卅日，经以紧缩军队，提高待遇，严肃军风纪，规定驻地多建营房，减少徵兵，统一事权，停止防御工事等事项，亲笔作书致拱卫京畿之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劝其停止军事行动，并派其外甥丁名楠持函面洽，汤以幼时受陈私惠甚深，虚与委蛇，佯允考虑。次日，陈乃以电话催询究竟，经汤婉辞，越日，丁名楠偕同陈之旧属胡邦宪再度谒汤，仍持陈

^① 即一九四九年。

之手书以尽先释放政治犯，保护区内武器军需、物资，约定某地区在区外停止前进，“依民主主义原则改编原有部队”，“取消×××名义（指匪方撤销汤战犯名义而言），并给予相当职位”，等具体条件，促汤实行，汤于愤慨之余，一面对丁严予申斥，对胡则不与面。当时杭州学潮骤起，游行示威，汤后恐陈之深入漩涡，或进行北上参加匪团，遂派员将被告监视，辗转解台，送案讯办。

（三）理由：按上开两次函件所载各项事实，均经讯据报告，陈仪直认亲书并派其外甥丁名楠面致不讳。虽据辩称当时总统下野，人心惶然，浙省民众心理都想避免兵乱，基于士绅意见，遂于外甥丁名楠赴沪之便，写信给汤，原意与汤私交甚笃，为无话不谈之朋友，纯以私人意见随便谈谈，至于原函条列之“停止防御工事”，依据过去经验所得，每感征工征料往往无补战益，徒增人民负累，“依民主主义改编军队”，如果和平成功，所有部队当然依照民主方式改编。“取消×××名义，并给予相当职位”，也是说和平成功，现有部队组织番号应该取消的，于取消后再给予相当职位，“约定某地区在区外停止前进”，如果讲和的话，当然要停止前进，都是推想将来。丁名楠去时，并无具体办法规定云云。（见审判笔录）。再查原函列举各项均极具体，与匪党阴谋和平条件吻合，自非徒托空想，已堪认定，再据前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叙述当时经过，丁名楠如何持函往访，力促实现局部和平，次日陈又如何用电话催询，以及该丁名楠、胡邦宪如何再度持函求见，丁对原函如何释明×××即暗示取消汤战犯字样，汤又如何严词拒绝，一一言之历历（见汤总司令谈话纪录），查汤前总司令既直认过去受被告私惠甚深，方图报之不暇，苟非

迫于忠党爱国之诚，安肯故人被告于罪，理极明显，况是项言证，核与被告自承认之函各项互相印证，其情节又极符合，衡情揆理，诸堪徵信是其所为，该陈仪实应构成煽惑军人逃叛罪，应予依法论科，以肃纲纪。据上论结，应依战时陆海空军审判简易规程，第二条第八条，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前段，修正惩治叛乱条例第四条第一项第十一款，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二条，刑法第三十七条第一项，判决如主文，中华民国三十九年六月九日。

（原载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九日《星岛日报》）

张鼎丞同志在闽西南和 豫皖苏边区

姜茂生

张鼎丞同志是我崇敬的老首长、老上级。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九年，我先后在张鼎丞同志领导下的红八团、闽西南三分区交通站和新四军二支队工作，虽然是短短的六年多的时间，但他那种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崇高的思想品质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谈判要做到有理有利”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我党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建议。当时，闽西南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已经二年多了，这个消息是从香港华侨报上获悉的。不久，一个进步华侨从香港带来了南方工委给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信，正式传达了我党中央的方针已从抗日反蒋转为联蒋抗日。在这重大的转折关头，作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张鼎丞同志，没有丝毫的彷徨犹豫，而是坚信这一方针的正确性。他认为，日寇重兵压境，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党中央顾全大局，不计前仇，提出“联合抗日，共同对敌”，建立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个英明决策。军政委员会于一九三七年四月下旬在科岭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停止打土豪劣绅和土改，并向国民党的区、乡、保长晓以大义，订立互不侵犯的和平协定。军政委员会还发表了“六言布告”，宣布我们的抗日救国纲领，并且印刷大批标语、口号，以及告粤军书、告群众书等，提出“顾全大局、枪口对外，拯救中华民族”、“闽西南红军愿与粤军携手合作，共同抗日”等口号。张鼎丞同志还以他和邓子恢二人的名义，分别向漳州、厦门、汕头、潮州、香港、广州、南雄、赣州等地的同乡会、知名人士、同学、亲友写信，阐明我党中央团结抗日的新政策，希望他们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积极努力，推动和平谈判。这些主张，立即得到了很多爱国人士的大力赞助，有的向粤军劝和，有的汇款接济我们，有的积极出面斡旋和谈。

一天，适中区委书记谢开华同志把我找去，我刚进寮棚，他就从兜里掏出一封竖格式大信函递给我，说：“姜站长，你先看看这封信。”

信封上的字是端端正正的毛笔楷书，我抽出信纸看了看，大意是说：

贵党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是符合国民愿望的。日军侵入中国，漳厦前线战事日紧，中国有亡国之危，既然国共两党中央已经和谈，我闽西国共两军亦当停火，坐下和谈，因此，特邀贵军派员来适中进行磋商。

信的落款是：一五七师×旅×营营长吴麒。

谢开华同志让我立即将信送往军政委员会。

回到石门炉交通站，我连忙给张鼎丞同志写了一封短信，信云：黄权同志（张的化名），接到粤军驻适中营长吴麒的一封信，

现送上，请军政委员会速予处示。当天晚上，我就派了两个交通员将信送往金峰大山（军政委员会住地）。

张鼎丞同志看了吴麒的信后，十分重视，认为这是与粤军和谈的大好时机。没几天，他就派谭震林同志亲自来我们交通站传达了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同吴麒接触，由吴麒搭线，准备同一五七师师长黄涛谈判。根据军政委员会的指示，在与黄涛谈判前，岩龙县委书记吴作球、岩南漳县委书记魏金水和我三人先与吴麒初步谈判，达成了两条协议：（一）双方在所管辖的范围内先行停火；（二）由吴麒向黄师长报告，我方准备接受更高一级的谈判。

由于谈判顺利，大家都很高兴，吴麒趁着酒兴说：“我吴某在战场上尝过贵军的滋味，很是钦佩。这次，我将竭尽全力促进和谈，如能成功，皆大欢喜，如谈不成，各自执行上级的命令。但不管怎样，我保证在我管辖范围之内不打共军，如若遭遇，就朝天开枪。”

吴作球同志把这次初谈情况写了一封信，要我亲自送给张鼎丞同志。

过了三、四天，军政委员会就作出了决定，由军政委员会部长谢育才同志为我方代表，我为随员，赴漳州与黄涛谈判。出发前，张鼎丞同志对我们说：“谈判要做到有理有利，既要注意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做一些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又要注意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坚持我党的立场和原则，以防国民党利用谈判消灭我们红军游击队。”

果然，在谈判中，双方在改编番号、部队指挥权和我军集中地点等三个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黄涛硬要红军游击队取消

番号编入粤军，一切听从他们的指挥和调遣，并要我们把队伍开到龙岩的白土去接受点编。（白土是一五七师兵力雄厚之地，前后有公路可通，易被敌人包围消灭。）我方拒不同意粤军意见，坚持我党原则，提出把我军番号改编为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不编入粤军；作战时，在独立担任一定战线作战任务的条件下，接受抗日指挥部的统一指挥；部队分南靖县的卢溪和龙岩县的白沙两地集中点编。由于双方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相持不下，谢育才同志把谈判的详细情况写成书面报告，要我立即送给军政委员会。

张鼎丞同志看了报告，气愤地说：“很显然，黄涛是在耍阴谋，他想借此机会吞掉我们。哼！妄想！在原则问题上，我们绝不能让步。”为了使谈判取得进展，七月九日，军政委员会决定邓子恢同志亲自出面，谢育才同志陪同，和驻龙岩的粤军四六九旅旅长练惕生谈判。谈判中，邓子恢同志坚持我党的原则立场，义正词严，据理力争，反复强调我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诚意。练为之感动，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称赞说：“共产党以民族大业为重，宽宏大度，诚意感人。我练某决不做国共和谈的绊脚石。”双方达成了协议，闽西红军游击队改编为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总队，归闽粤赣省委直接领导。总队长谢育才，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下设三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熊梦辉，教导员钟国楚；第二大队大队长陈联正，教导员黄庆余；第三大队大队长王云生，教导员何志远，外加通讯、特务两个直属连。不久，新四军成立，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又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张鼎丞为司令员兼政委，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我是四连连长，从此，我结束了闽西南三分区交通站的工作，随军开赴苏皖抗日前线。

“这也是为了抗日”

对我党的方针由抗日反蒋转入联蒋抗日，很多同志想不通，特别是听说红军游击队要摘下“红五星”，换上“青天白日”，更是一肚子火。到了一九三七年八月间，漳厦吃紧，粤军部队已陆续开赴前线，这时，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派保安司令和专员张策安来点编，并发了国民党军服。有的战士气得哭起来，说：“‘五角星’同‘十二角星’打了十年仗，最艰苦的时刻我们都坚持下来了，现在要和‘蒋该死’携手合作，这是向敌人投降，是背叛革命。”还有的忍受不了这个“窝囊气”，开了小差。为了使同志们明白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道理，张鼎丞、邓子恢和谭震林同志决定将部队集中到雁石学习、整训半个月。整训开始时，张鼎丞同志亲自给大家做动员报告。我记得他讲了这样三点：一是日寇侵华，重兵压境，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动员一切爱国力量进行抗日，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二是在我党和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蒋介石已经答应团结抗日，共同对敌，全国规模的内战已基本停止下来。我们不要计旧仇，要把新的仇恨凝聚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红军游击队改编，这也是为了抗日；三是党中央、毛主席早有决策，准备在南方也编一个军，保持我们部队的独立性，蒋介石想利用改编吃掉我们，办不到，如果他们要打，我们也不怕他。张鼎丞同志的一席话，说得大家心悦诚服。

整训期间，张鼎丞同志召开各种座谈会，利用各种途径启发

同志们的思想觉悟，并号召队与队之间开展政治工作竞赛活动。思想政治工作抓得及时、扎实、得法，同志们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为奔赴抗日前线杀敌立功奠定了思想基础。

有人说，张鼎丞同志做思想工作深入细致，循循善诱，再难的问题，到了他那里也不难解决，这话一点不差。一九三八年六月，我就遇到了这样一件事。当时二支队司令部住在安徽南陵三里店附近的一个村庄里，一天，张鼎丞司令员叫通讯员把我叫到他的住处，这时，张鼎丞同志正伏在桌上看文件，见我进来，热情地招呼我坐下，还未等他开口，我就抢先问道：“首长，是不是有战斗任务？”

“嗨！看把你急的。”张司令员呵呵地笑起来。

“一天不打仗，手掌就发痒嘛！”我自以为有仗可打了。

“这个任务可非同一般哟！”

“什么任务？”

“支队党委研究，决定让你去上学。”

“什么？去上学？”我感到太意外了。

“对！去上学。”

听说去上学，我一下怔住了。二支队从闽西开赴抗日前线时，我在岩寺得了重病。还未痊愈，就从医院偷偷地跑了出来，一心想上前线打鬼子，现在让我去上学？！我说：“前线这么紧张，让我去上学，我学不下去。”

“让你去上学，是为了更好地打鬼子呀！”张司令员和气地说。

“为了更好地打鬼子？”我不解地问，“是什么学校？”

“国民党工兵学校。”

一听国民党这三个字，我打心眼里感到不舒服。搞兵运工作时，战斗在敌营，我对他们那套政客作风、奸诈行为非常讨厌，如果不是为了革命工作，我一天也呆不下去。现在竟然要我和这帮人坐在一起学习，怎么能忍受得了呢？于是，我说：

“首长，我不是学习的料子，还是换一个人去吧！”

“怎么？不愿去学习？我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张司令打趣地说。

稍停，张鼎丞同志似乎想到了什么，突然问我：“你还记得你入党宣誓吗？”

“英勇战斗，不怕牺牲，为劳苦大众求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说：“这一辈子我也忘不了。”

“是啊！现在还没有叫你去牺牲，你就推来推去，这怎么谈得上为劳苦大众求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呢？”

张鼎丞同志的一席话，道理既简单，又深刻，说得我理屈了。他见我低头不语，又启发我：“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这所学校是专门为抗日培养技术人才的。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样的学校，应该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学一套本领，这不是很好吗？所以，去学习，这也是为了抗日，我们要以大局为重哟！你还有什么想不通的？”说完，张鼎丞同志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说：“你搞过兵运工作，交通站工作也搞过好几年，和国民党打交道你有一定的经验。我们相信你会很好完成这次学习任务的。”我再没什么想不通的了，回答说：“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安心学习，争取优异成绩向您报捷。”第三天，我就愉快地奔赴了学习岗位。

“不理他！我们要继续招兵买马”

一九三八年十月间，刘少奇同志到达豫皖苏边区，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向敌后发展，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但是，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同志，不懂得抗日战争时期发展壮大革命武装力量，依靠我党和人民进步力量坚持持久抗战的重要意义，一个劲地用“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尊重统一战线”来束缚自己的手脚，不敢扩大部队，不敢发动群众，不敢建立革命根据地，唯恐遭到蒋介石的指责。一九三八年底，他从江苏茅山一支队来我们二支队视察工作。那时，我在二支队四团二营新六连当指导员。当张鼎丞同志汇报我们连积极扩大部队，积极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绩比较突出时，项英同志很不高兴地说：“这是与统一战线背道而驰的。”张鼎丞同志说：“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决策。特别是我们部队战斗频繁，兵员不足，更要扩大部队，壮大抗日武装，这样才能保证抗战的胜利，这怎么是与统一战线背道而驰呢？”

项英对张鼎丞同志的话根本听不进去，第二天，他就来到我们连，问我：“听说你们连招了不少兵，建了不少根据地？”

“是啊，这全靠有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我回答说。

“你知道不知道，招兵买马是非法的？”项英瞪大眼睛问我。

“非法？不知道。”

项英见我仍在“固执”，就提高嗓门教训我说：“你们不断

扩大队伍是错误的。今天是统一战线高于一切，我们要一切经过、服从统一战线。现在，国民党正说我们招兵买马，扩大势力。你们这样做，就是破坏国共合作，影响抗日。扩那么多兵干什么？”

“毛主席不是说，我们有独立自主的权利吗？不扩一些兵，部队那有实力去打仗呢？”我解释说。

“你们懂啥？惹出乱子来谁负得了责任？今后，把现有部队管好训练好就行了，不要再扩大了，否则后果难以收拾，”项英气乎乎地说，“把部队集合起来，我有话说。”

根据项英的指示，我把部队集合在一个操场上，项英对全连同志又进行了类似内容的训斥性的讲话。听了他的讲话，同志们很想不通，感到很不是滋味。

项英走后，张鼎丞同志把我和连长叫去支队司令部，见我俩愁眉苦脸的样子，问：“挨剋了是吧？”

“发展队伍有什么错？我们想不通。”我嘟着嘴说。

“扩大革命武装没有错！”张鼎丞同志语气坚定地说。

“那为什么说我们发展队伍是破坏统一战线？”

“他说破坏就是破坏了？”张鼎丞略带笑容地反问我们。

“那他说的话算不算数？”连长着急地问。

“对的算数，不对的就不算数。”张鼎丞同志站起来，在屋内踱来踱去，然后停住脚步说，“毛主席说过，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提法是不对的，我们要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毛主席早就看出了蒋介石与我们合作抗日是被迫的，动摇的，靠不住的。蒋介石一开始就想用统一战线来排除、压抑、限制我们，以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我们不能上这个当。要按毛主席的

指示去做，回去后，要和全连同志讲清楚，新四军发展的人数，不是多了，而是非常不够，发展的速度不是快了，而是还跟不上抗战形势的要求。项英的话，不理他。今后我们要继续招兵买马，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壮大我们的队伍。”

我们及时向全连传达了张鼎丞同志的指示，同志们听后精神大为振奋，疑虑顿时消失。当即，我连又订了扩大部队、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的计划。事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我们连就发展到一百八十多人，成为新四军中最大的一个连队。后来我才知道，为了消除项英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张鼎丞同志在一九三九年四月间召开的二支队党代会上，对进一步发展革命武装、扩大革命根据地问题专门做了强调，还特意把我们连的做法和经验向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作了介绍。

“不会总结经验，就不会更好地工作”

张鼎丞同志十分注意工作方法，讲究工作实效，他常说，不会总结经验，就不会更好地工作。因此，他特别注重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认真推广先进典型，用典型指导工作。

这方面的事例很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三六年春在我交通站召开的地下交通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一九三五年四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参谋长朱森带了一个通讯员，假说到龙岩巡视工作，偷偷跑到敌第十师师长李默庵那里自首叛变，使我岩永、岩宁沿线的交通站和接头处遭到破坏和摧残，龙岩局面也紧张起来，军政委员会一度和各地失去了联系。十一月下旬，我负伤治愈后，从红八团调去闽西三分区武装交通站当站长，在艰难复杂

的情况下，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努力，我们站不仅恢复了被敌人切断的交通线，而且还开辟了几条新的交通线，递送党的信件，护送来往干部，传达上级指示，了解敌人情况，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张鼎丞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认为我们站的做法对其他各站尽快恢复被切断的交通线，很有指导意义。特别是当时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和中央失去联系已经两年了，更需抓紧恢复到延安的交通线。于是，他和军政委员会的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决定，在我站召开现场经验交流会。

现场会召开前两天，张鼎丞同志事先来到我们站，对我说：“茂生同志，你们先准备一下，到时把经验好好向大家介绍介绍。”说实话，我怕的就是总结经验。像这样的会议，规模那样大，首长这么多，我是头一回参加，还要大会发言，心里真是有些不安。张鼎丞同志看透了我的心思，问我：“有什么难处？说说看！”

“在这样的场合介绍经验，我可是头一回呀！”我为难地说。

“头一回怕什么？没有头一回，那有第二回、第三回？中国不是有句俗语吗！丑媳妇不怕见公婆。何况你们是个先进站还怕亮相？”张鼎丞同志诙谐地说。

“我们工作是做了一些，但还很不够，再说，我的文化水平低，恐怕讲不出啥名堂来。”

“不要紧，工作怎么做的你就怎么讲，实实在在，这就是经验嘛！”张鼎丞同志鼓励我说，“你们可以开个讨论会，集思广益，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这样，经验不就出来了？”

对！走群众路线。张鼎丞同志走后，我即召开了全体人员会，大家你一条，我一条，七凑八凑，总算弄出了一个“东西”，这样，我的心才安稳一些。

会议是在山坑村附近一个山上树林里开的，共开了三天，邓子恢、谭震林、谢育才、简载文等军政委员会的领导同志，闽西南武装交通总站负责人雷德兴同志以及各分区、县交通站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张鼎丞同志亲自主持会议，我讲了六点体会和做法。

张鼎丞同志高度赞扬了我们交通站的做法和经验，他说：“军政委员会好比是心脏，交通线就是通往各地的血管，我们就是靠你们传递指示，了解敌情，指挥作战的。三分站的经验很好，很值得大家学习。只要我们各站都能够做到象他们那样，那么，军政委员会就会眼睛更亮、耳朵更灵、头脑更清醒，就能不断取得对敌斗争的主动权。”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那以后，各个交通站的工作开展得更加活跃了，军政委员会通往延安的交通线，也很快恢复了。

还有一件事，我至今难以忘怀。一九三八年七、八月间，二支队四团新成立一个六连，叫新六连，属四团编制，但归支队直接领导。这个连是由支队侦察连的十几个小战士，三十多名刚扩大来的新兵和三十多个成份好、愿意抗日的土匪俘虏组成的。开始，战士之间不团结，纪律也很差，不听指挥，部队思想很不稳定，该连连长全胜仁原来是张鼎丞同志的警卫员，没有带过兵，看到连队这样乱糟糟的，就跑去张鼎丞那里哭鼻子，说这个连他带不了，要求调动工作。这时，我正在支队司令部帮助工作，张鼎丞同志把我找去，对我说：“新六连问题很多，全胜仁刚才叫苦来了，我想了一下，这个连没有指导员，你去帮助一段工作怎么样？”我说：“服从组织决定。”接着，张鼎丞同志又说：“走！咱们一起到连里去看看。”

到了新六连，张鼎丞同志亲自给全连讲话，对大家进行团结抗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当讲话快结束时，他回过头来问我：“帮助工作，没有职务不名正言顺，也不好指挥，你就当指导员好不好？”我点点头，表示同意。于是，张鼎丞同志当场向全连宣布我为新六连第一任指导员。临走时，他再三嘱咐我：新六连基础差，工作比较艰巨，要多动脑子，注意总结经验。

根据张鼎丞同志的指示，我们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部队的思想很快稳定下来，情绪十分高涨，全连不仅没有一人逃跑，而且还扩大了三十多名新战士。

不久，我连奉命开到南漪湖郑村。当时，郑村一带尚未有我地下党组织，群众也没有发动起来，土匪作恶多端，残害百姓，那一带是一片恐怖。我们到那以后，一边剿匪，保护群众利益，取得群众的信任，一面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同时，坚决执行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找当地“红枪会”的头子和绅士谈话，说服教育他们。这样，很快打开了局面，群众也发动起来了，在郑村一带开辟了一大块抗日根据地。接着，我们连又派出几个全是由新兵组成的小组，由党员带队，分头到群众中去，以现身说法，去扩充新兵。一个月的功夫，就扩来了三十多名新同志。

张鼎丞同志考虑到二支队一些同志中存在着忽视扩大部队，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倾向。便派政治部宣传科许济、江潮两位干事来我连总结经验，并决定在狸头桥召开三团连以上干部会。

会上，我介绍了怎样发展和巩固部队，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张鼎丞同志听后很高兴，对大家说：“新六连模范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积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很快打开了

局面，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连队也不断发展壮大。各连要把他们的经验和做法带回去，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使我们整个二支队在这方面有个较大的发展。”

会后，张鼎丞同志又把我找去，对我说：“你们的经验很好，成绩比较显著，但不要骄傲，要继续努力，争取新的成绩。”并说：“我想了一下，光在这次会议上介绍还不够，你们找几个同志到各连去传传经好不好？”我说可以。张鼎丞同志略思片刻，说：“你们利用新兵扩充部队的做法很可取，也有说服力。你们就选几个新同志现身说法，到各连去介绍介绍吧！”根据张鼎丞同志的指示，会后，我们选了三个新同志，由一个班长带领，到各连作了一周的巡回汇报，各连反映很好。

张鼎丞同志不仅重视宣扬和推广先进经验，而且，他亲自动手总结重要典型的经验，《介绍新四军一个模范党支部》这份经验材料，就是他自己动手总结出来的。

一天，张鼎丞带着警卫员来到我们连，刚坐下，他就说：“姜指导员，我要在你们连住几天。”

“那我们真是得天独厚。”我高兴地说。

“我这次来你们连，不是给，而是来要的哟！有意见吧？”张司令员风趣地说。

“要？”我有些迷惑不解。

“是啊！我要你们的经验。”张司令员面带得意的神情。

“啥经验？”

“党支部建设经验。”

“怎么没带人来？”

“你看我行不行？”

“什么，你自己写？”我有些惊讶。

“怎么，信不过？”

“不是的，”我忙解释说，“我的意思是，首长工作这样忙，那还有时间写材料。”

“是啊，工作是忙些，可是，领导不能老是靠‘拐棍’工作啊。”接着，张鼎丞同志就扳着手指头说起领导亲自总结经验的好处来：“第一，领导亲自调查，掌握的情况生动具体，这样就更有发言权，总结出来的经验也实际可用；第二，领导能和群众直接见面，密切上下级关系；第三，领导亲自动手，能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作风；第四，发现问题能及时解决。”

为了总结好这份经验，张鼎丞同志几次召开座谈会，找干部、战士谈心，了解情况。白天指导帮助连队工作，没有时间写，就晚上伏在豆油灯下赶写，有时熬到深夜一、二点钟。他几次易稿，充实修改，终于把材料写好了。这份材料从军事训练到对敌作战，从党支部的模范作用到官兵团结，从巩固扩大部队到做群众工作、建立根据地，从文化学习到文娱活动等，都作了详细总结，有血有肉，我们全连听了都很受感动。一九三九年五月他去延安汇报闽西斗争情况时，把这份材料带去了，由于材料具体生动，经验实在，延安《共产党人》杂志社刊登发表了。

“革命是靠大家干的，我为什么要特殊呢”

在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中，军政委员会机关几乎都是住在山上，吃在山上。敌人为了消灭我红军游击队，疯狂地进行清剿，野蛮地进行搜山、封山、烧山，并移民并村，想切断人民群众与

红军的联系，断绝我们的粮食来源，企图把我们困死、饿死。在这种战斗频繁、工作艰苦、物质条件菲薄的情况下，张鼎丞同志仍然是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没有粮食吃，就和同志们一起吃野菜野果，找不到野菜野果，就以草根、树皮充饥。没有鞋子穿，他自己打草鞋。一年四季他盖的都是那床又旧又破的夹被，管理科要给他换一床，他执意不肯，说：“这床被子还能盖，现在困难，就不要换了。”他身上的那套粗布军装，是一九三四年开始穿的，已经由灰变白，补丁摞补丁，整整穿了三年。一九三七年元旦期间，军政委员会机关转移到牛牯扑一带，当时我们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又面临着断粮的威胁。这时，张鼎丞同志又患了疟疾，身体越来越支持不住了，但却给大家讲毛主席在井冈山时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的故事，鼓励大家克服困难，战胜困难。警卫员全胜仁看见他一天到晚那样劳累，已经好几天没吃到一粒粮食了，这样下去怎么行呢？一天，小全瞒着张鼎丞同志弄来了一小袋粮食，准备留着给首长补补身子。不料被张鼎丞同志发现了，他问全胜仁：

“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没什么。”小全极力掩饰。

“拿过来我看看！”

当张鼎丞同志发现是大米时，脸上顿时严肃起来：

“那来的？”

“从老乡那弄来的。”

“多少斤？”

“三斤。”

“给钱了没有？”

“给了。”

“谁叫你去弄的？你不知道，老乡也很困难吗？”张鼎丞同志生气了。

“可是你的身体越来越差，弄垮了怎么办？”小全理直气壮地说。

“看你说的，那有那么严重！”张鼎丞同志拍着小全的肩膀说，“把这点米拿去交给集体伙食。”

“交给集体伙食？”小全急了，“你骂我，批我都行，把米交出去可不行。”

“不准侵犯人民群众利益，不准以公济私，领导不准搞特殊化，军政委员会的这约法三章我已和你讲过多遍了，都忘了？”张鼎丞同志语气缓和了一些。

小全低头不语。

稍停，张鼎丞同志又教育小全说：“要知道，革命是靠大家干的，大家都这样艰苦，我为什么要特殊呢？”小全抬起头来，凝视着首长那饱经风霜而又消瘦的面孔，眼里充满了泪花。

张鼎丞同志从不以公济私，廉洁的作风在他的身上随时都可以见到。管理科的同志知道他是福建人，有喝茶的嗜好。一次，管理员给他拿来二两茶叶，张鼎丞同志问管理员：

“茶叶哪来的？”

“招待客人剩下的。”管理员回答说。

“公家的东西怎么随便拿呢？”张鼎丞同志不高兴地问。

“听说首长爱喝茶，所以……”

“什么所以，”张鼎丞同志打断管理员的话说，“以公济私是错误的，不允许的，懂吗？”

管理员点点头。

接着，张鼎丞同志又说：“我又不是地主老爷，伺候来伺候去，不喝茶就不行了？爱喝是一回事，该不该喝又是一回事。”管理员很受教育，把茶叶收回去了。

事后，张鼎丞同志又把管理科的同志召集一起，给他们立下了“五不准”：不准以公济私；不准给领导多分东西；不准找借口对领导额外照顾；不准奉承领导；不准侵犯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五不准”在新四军二支队很受干部战士的欢迎，对密切上下关系、军民关系起了很大作用。

（韩鹤萍整理）

抗英英雄于渊烈士生平

吕 光 光



于渊烈士遗像

于渊烈士，字邦齐，一八九三年七月二十日生于四川射洪县洋溪镇的一个佃农家庭。他十多岁就当雇工，后来在川军杨森部当兵。由于他骁勇善战，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已升至旅长，兼任驻防万县的宪兵司令。

于渊同志是一位性格刚毅、思想激进的爱国军人，很早就关心国内外的形势，向往苏联十月革命，经常延揽一些革命知识分子给他讲解马列主义，介绍苏俄情况。渐渐的，他把抵御列强压迫侵略、促进祖国独立富强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当时肖楚女、恽代英、陈毅、杨闇公等同志曾先后在万县进行革命活动，同他时有接触，对他的经历和为人深有了解。一九二六年春，他即由党派至杨森部工作的朱德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在川军中长期从事兵运的重要干部。

当大革命潮流推向长江流域时，英帝国主义为了保护在华的既得利益，公然放纵它的商船、军舰在长江挑衅，多次撞沉我国

民船。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英国太古公司万流号轮船在四川云阳江面肇事，撞沉三只民船，淹毙我同胞四十六人。朱德同志命于渊率部扣留了开至万县的太古公司万通号轮船为质。正交涉间，英帝从宜昌派来嘉禾号等军舰两艘，于九月五日夹靠万通轮，英军蜂拥登轮，开枪射死我守军二人，妄图胁迫我军撤离，以便劫夺该轮。亲赴该轮戒备的于渊同志命令部下还击，当即重创英军。敌舰退至江心，竟惨无人道地炮轰万县和平居民，使我军民死伤近千人，焚毁街房千余间，酿成震惊中外的万县九·五惨案。面对敌舰肆虐，朱德同志又命于渊亲率敢死队，驾驶木船猛袭敌舰。当他率先冲上敌舰痛歼敌军时，不幸头部中弹，负了重伤。是役击伤敌舰一艘，击毙敌副舰长等官兵颇多，迫使敌舰连夜向下游逃逸，严重打击了英帝的炮舰政策。

英帝的暴行激怒了我国人民，全国各地纷纷游行示威，通电声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发表《中国共产党为英帝国主义屠杀万县人民告民众书》，进步舆论盛赞于渊同志为抗英民族英雄。在四川出现了党领导的“四川人民九·五惨案后援会”，党并在成都发行了《九五日报》。整个长江流域都掀起了反帝怒潮，为我国人民收回汉口、九江等地的英租界，扫清了道路。

这次斗争促使杨森投向南方政府，换上了国民革命军旗号。翌年四一二政变后，杨被蒋介石收买，出兵鄂东，配合叛军夏斗寅部进攻武汉政府。当时朱德同志已离开杨部赴武汉，于渊同志即与刘伯承、吴玉章同志联系，准备运用他在杨部的影响，拖出队伍，到下川东搞武装斗争。由于条件不成熟未能正式发动，便改变斗争方式，由他具名发出通电，声讨杨的背叛行为。杨恐军心动摇，下令通缉于渊。

于渊同志了解当时成都大学校长张澜先生与党的密切关系，为避杨森的迫害，专程去成都拜访张。张澜先生为保护他的安全，将他介绍给驻防南充的何光烈师长。何慑于杨的压力，一度将他扣押。张澜先生闻讯，又将他介绍至刘湘所属的二十一军二师六旅任旅长。一九三〇年八月底，罗世文同志代表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向于渊、项鼎（苏幼农）同志交代任务，要他二人潜赴江津，在驻防江津的二十四军第一师中发动兵变（即九·三起义），由项鼎同志任领导兵变的前委书记，他任总指挥。兵变失败，项鼎同志当机立断，将目标很大而幸未暴露的这位总指挥派人护送回渝，并向省委报告，使他重返刘湘原部，继续秘密从事党的军事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于渊同志秘密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为积蓄革命力量，他在一九三三年八月任四川省会警察局局长时，将原在他的部队里搞兵运的党员，安插于局内的重要岗位，直接掩护了一批地下党员和革命志士。一九三四年，他出资，由地下党员杜桴生同志等主办《民族日报》，大兴抗日救亡的舆论。他的这些作为，终被同僚告发，宣称他要配合川陕红军组织暴动。幸亏刘湘在一九三五年春刚接纳了张澜先生介绍去的中共代表张曙时同志，开始响应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遂置告发于不顾，并派于渊立即率部去天全、芦山一带，明为堵截长征的红军，实则借以转移蒋介石集团对刘本人的压力。于渊同志到达川西前线后，接到朱德总司令的密信，得知红军当晚要通过他的防线。他即改变布防，虚留豁口，让红军顺利通过。事后川军将领追究责任，要对他议处，刘湘虚与委蛇，未予深究。接着，刘又派他至川西北“堵截”红四方面军西进，他再度让路，使红军扬长而

过。为此，刘湘在各方面的责难下，只得将他免职，派赴日本考察。

在日本期间，于渊同志与流亡在日的郭沫若同志过从甚密，密切注视国内的革命动向。西安事变发生后，他立即回国，安排曾伴随他搞兵运的原任秘书地下党员吕晨同志等潜入成都军分校屯垦班学习，准备日后到党已播下火种的凉山地区，开辟革命根据地。他还出资由另一秘书地下党员甘树人同志等创办《力文》杂志，与车耀先同志办的《大声周刊》协同作战。他在参加筹组成都市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同时，又与车耀先同志筹建四川退伍军人组织，为促进抗日救亡，积极作好组织准备。

抗日战争爆发，刘湘起用于渊同志为第七战区师长兼游击司令。他驰骋于华东战场，实现了抗日救国的宿愿。一九三八年春刘湘病逝，继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为分化、收买刘的旧部，许以军长之职，拉他人复兴社。他不便固拒，于是借故与上司王陵基公开闹翻，弃职返回成都，以走避陈诚的迫害。

于渊同志不为国民党的高官笼络而“挂冠”的行为，在四川进步势力中传为美谈。他移居成都北门外乡间，生活很清苦，但为团结群众，却经常周济北郊一带的贫民。民盟成立后，他在一九四二年经张澜先生介绍加入民盟，后为民盟中央委员，借此大力开展党在川康地方势力中的统战工作。成都商业场的二泉茶楼，是川康在野军政人员的聚首之所；这些在野人士大都受过蒋介石集团的排斥和压迫，不满现实，不明前途，亟需引导。正是因此，他每天从乡间步行十余里来到二泉“品茗”，到下午又步行回乡，几乎风雨无阻。他并没有“品茗”的雅兴，而是相机行事，非常艺术地给那些政治上的彷徨者宣讲党的政策，分析形

势，指引道路，晓以大义，终于使其中许多人有所觉悟，从而拥护党的主张，反对投降，反对内战，站在党和人民一边，扩大了党的统一战线。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成都市立中学学生在受该校三青团分子的经常凌辱后，又遭到大批警察的毒打，酿成严重的“市中事件”。于渊同志以学生家长名义，串联其他家长起而斗争。他又告知成都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华西日报》主笔杨伯恺同志将事件真相揭露于该报，引起舆论大哗。成都各大学的地下党员及时发动各大中学声援，形成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周恩来同志誉称之为“新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这次事件沉重打击了反动派的暴行，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成都市长和警察局长双双撤职。

此后不久，国民党右派头子张继的独子张琨，在成都北门外驷马桥附近暴卒。张继为泄“绝嗣”的私忿，栽诬当地居民“谋财害命”，大兴冤狱，苦打成招，惨绝人寰。于渊同志仗义执言，极力替无辜者鸣冤，敦请成都的名律师多人担任义务律师，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激烈的斗争。同时发动地方人士，向社会公开揭露国民党草菅人命的黑暗统治，为“张琨案”中的许多受害者，减轻了很大的苦难。

于渊同志曾任川北旅蓉同乡会副理事长。他利用这个民间团体，经常为民请命，进行合法斗争。一九四五年冬和第二年春，川北的红苕（甘薯）大量霉烂，威胁着广大人民的生计。张澜先生情知其苦，嘱我转告于渊同志以川北旅蓉同乡会的名义，呼吁当局减免赋税，施行救济。他立即奔走呼吁，博得《新华日报》和进步舆论的支持。张澜先生又要当时任嘉陵储运局局长的奚致

和同志配合于渊同志的活动来个“先斩后奏”，由嘉陵储运局先行救济，使川北广大人民受到实惠。事后奚致和同志为此遭受反动派的诬告和逮捕，他同张澜先生又一起进行营救。对于为人民谋福利的事，他总是知难犹进，乐此不疲。

自从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一日于渊、杨伯恺、李相符、田一平同志等成都文化界一百余人发表《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献言》以后，于渊同志洞察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随即将斗争的矛头，指向美帝和蒋介石制造的内战危机上。作为抗英、抗日的民族英雄，他对美帝出钱出枪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言室满室，言堂满堂，揭露得尤为深刻。蒋介石深知他在川康军政界的影响，视为潜在的威胁，便使出拉拢的手段，诱他人彀，于一九四六年春派侍从室主任俞济时专程赴成都，向他面交蒋送给他的照片和委任状，任命他为中央军官训练团中将大队长。他识破蒋的阴谋，即以“息肩已久，无意仕途”而拒绝。此后，特务便加强了对他的监视。但他反对美蒋的活动，却更加义无反顾。

一九四六年七月，昆明发生李（公朴）、闻（一多）惨案，于渊同志踏着烈士的血迹，积极筹组成都市李闻烈士追悼会，经他多方奔走，觅定蓉光电影院为追悼会的会场。他是追悼会的发起人之一，并将射洪县旅蓉同乡会和射洪县旅蓉学会列为发起团体，以壮大声势。八月十八日追悼会散会时，特务狂呼反动口号之后，又猖狂袭击张澜先生。他和杨伯恺同志等挺身而出，顶着特务的袭击，掩护我和沈自强同志护送头部受伤的张澜先生迅速脱离险境，方得化险为夷。当时他厉声高呼：“不许乱打！”压制了特务的凶焰，而凶残成性的特务，终于将追悼会的工作人员张松涛同志，在归途中殴打成重伤。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后，四川地下党的斗争任务之一，就是要在四川拖住敌人，增加敌人的后顾之忧。为加强华蓥山地区的武装斗争，党组织要于渊同志这位熟谙军事的宿将，去华蓥山协助领导。他正准备束装首途，特务为镇压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竟于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凌晨，将他同杨伯恺、田一平等数十位同志逮捕，关进成都国民党保密局蓉站的监牢。他同杨伯恺同志不为利诱，不怕威胁，大大鼓舞了狱中难友的斗志。在张澜先生的营救下，国民党当局要于渊、杨伯恺同志“承认错误”，便可获释，他俩凛然反驳：“只有你们承认逮捕我们是错误，我们才出去！”针锋相对地同敌人进行斗争。（田一平同志等后被转押于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经张澜先生营救获释。）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国民党反动派狼狈逃离成都之际，竟对于渊、杨伯恺同志等三十余位下毒手。当敌人捆绑于渊同志时，他劈面给敌人几个耳光。残酷的敌人，终于将于渊、杨伯恺同志活埋于成都外西十二桥，其他三十余位同志也遭惨杀。

于渊同志以他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

佛门擎天一柱

巨赞法师生平事略

朱哲



巨赞法师像

巨赞法师（一九〇八——一九八四）博通三藏，解行并重，为我国当代著名高僧。他不但精通佛典，对先秦诸子、宋明理学及西方哲学，莫不广为涉猎，对气功和中医阴阳之说，也有很深的造诣和独到的见解。

法师原籍江苏江阴，俗姓潘，名楚桐，字琴朴，青少年时期就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于江阴师范学校毕业后，继入上海大夏大学。一九二九年回江阴任金童桥小学校长，并秘密参加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负责江阴东乡的组织 and 宣传工作。后为土豪劣绅所告发，被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下令通缉，险遭逮捕。一九三一年，经太虚法师介绍，乃至杭州灵隐寺从却非^①老方丈披剃出家，

法名传戒，字定慧，后改名巨赞。同年在宝华山隆昌寺受具足戒。

^① 却非法师出家前曾任北伐军团长。

与法师同时受戒的有现为上海玉佛寺方丈真禅法师等。

法师出家后，究心法义，遍览群经，淬厉奋发，读经八千多卷，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笔记。法师颖悟过人，一九三六年即在《论学》杂志（江苏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李源澄所办）发表了《评熊十力所著书》。熊十力时为国立北京大学名教授，哲学、佛学尤为所长。熊十力教授看了法师的文章后，称许：“是用心人语，非浮士口气。”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京沪弃守。法师满怀悲愤辗转福建、香港、广东（在粤时一度曾任虚云老和尚记室）、湖南各地，路经宁乡寒铁生余楼，翘首云天，山河残碎，狼烟滚滚，寇焰嚣张，无限伤悼，不觉引吭哀歌：

“……九洲沉陆滋蛇豕，绝脰刳肠忆万夫。文物忍看沦敌手，江山默祝复康衢。

挥戈反日思良将，袒臂高呼待硕儒。

寄语山林深密处，倾危大厦要君扶。”

这首诗字里行间，洋溢着法师对祖国锦绣河山的无限眷恋之情，他是多么盼望胜利能早日来临。

一九三八——三九年，法师应湖南南岳华严研究社社长宝生邀请，前往该社讲学。时田汉、冯乃超、杜萱及日人鹿地亘等同志适游南岳，得与法师相会于上封寺，并由田汉同志引荐，见到了叶剑英同志（时任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副教务长）。未几岳阳沦陷，人心惶惶，法师遂与知客演文密商，拟组织游击队以抗日。几经密商，在叶剑英的关怀下，乃组成“南岳佛道教难协会”。开成立大会时，叶亲临讲话，八路军高参薛子正同志还兼任救难协会战时训练班军事教练。训练班结业前，法师与演文秘密召集

青年三十余人，组成“佛教青年服务团”^①。演文任主任兼训练股长，法师任副主任兼宣传股长，明真法师（现为中国佛学院教务长）任文书股长。法师积极参加抗战救亡运动，不意竟为反动当局所忌，复遭通缉。这时衡阳《大刚报》刊登了法师写的一篇通讯，报道时任贵州省主席的张治中先生在黔厉行改革，将一些寺庙、祠堂改为学校、义仓、工厂。不料这篇通讯竟然引起了轩然大波，法师成了一些守旧的老年僧人的众矢之的。国民党更趁机从中煽风点火，法师几乎被害。在进步人士的护送下，出走桂林，往依李任公（济深）。

一九四〇年，法师于广西桂林，任广西佛教会秘书长，并主编《狮子吼》月刊，继续宣扬抗战救亡的爱国理论与佛教革新运动。这时法师与夏衍、田汉、欧阳予倩、聂绀弩、万仲文兄弟、朱蕴山、郭沫若、柳亚子、方孝宽、盛成、端木蕻良、廖沫沙、关山月、尹瘦石、林半觉、龙积之、林素园、李焰生等诸公时相往来，过从甚密，相互切磋，共商国是。“漓江雅集”，是当时颇负盛名的爱国诗社，很多左翼作者在此集会议事，法师亦经常被邀参加。法师还用如是斋主、辑哉、万均、育之等十余个笔名，常为《大公报》、《广西日报》、《小春秋》、《救亡日报》撰稿。法师爱国爱教的高尚品德，深得李济深、李任仁（广西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先生等的敬重，并得到各界的好评，被誉为新佛教的领袖。

一九四一年，寇患日深，法师路经桂林开元寺废址，横触时事，悲从中来，吟诗一首，以寄哀思：

^① 详见本辑《巨赞法师在湖南的抗日活动》一文。

“……极目神州无限泪，桂江日夜泻汪洋。”

这时由于法师和社会各界频繁接触，得能深入考察和了解社会上各个阶层的底蕴，从而也坚定了他希望彻底改革佛教的夙愿，提出了“生产化”、“学术化”两个口号。撰成了约十馀万字的《新佛教概论》。广西师范学院教授万仲文为之作了序言。《新佛教概论》的基本内容大体是：认为过去的佛教和封建主义血肉相连，有密切的关系，佛教徒的思想行为大都是迷信落后的。因此，要排除佛教中封建的思想和迷信的毒素，扬弃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必须用科学的历史的观点，在理论方面研究大乘教理，才能弃伪扬真，澄清思想；在行为方面，要发扬菩萨的积极精神，无我除执，以之实践理论。对于僧伽制度、僧伽教育的改革、僧伽人才的培养、寺庙的管理和整顿、经典、文物的保管和整理、佛教界的因循守旧的积弊如何革除等等，在这本书里都有详尽的系统的阐述。对于广建坛场、聚徒讽诵，以做佛事为衣食之资，巨法师尤为反对，他力主佛教徒要参加劳动生产，自食其力，发扬古德“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美德，恢复释迦牟尼原有的光明和佛陀的优良传统。只有这样才能不被淘汰，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也才能体现“生产化”、“学术化”的宗旨。

在桂林时，有过这样一个插曲：法师的一些知心朋友，认为法师才华洋溢，又倾心革命，遁入空门，未免可惜，一再规劝他舍戒还俗，这样可以专心为党，一心为革命。其实，竭诚拥护党，对党有深厚感情的巨法师，何尝不想为党，为革命多做一些工作呢？只是他有他的想法：干革命有多种渠道，佛教工作也要有人去做，多年来自己对佛教又有了兴趣，有了感情，何况东南亚各国多数信奉佛教，如能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也未始不是重要

的，不是没有意义的。对关心他的朋友们的好意，法师婉言谢绝了，并赋了一首小诗，以表明他的隐痛和志向：

“亡羊自昔多歧路，脱俗方为中道行。

夏绿春红何足惜，要以冰雪验人生。”

当时，怱怱法师还俗的有田汉、李焰生先生等。柳亚子先生则认为法师的想法也有一定的道理，人各有志，不能勉强。

一九四二年，法师离开桂林，卓锡桂平西山^①，任龙华寺住持。觉光法师（现为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也同在该寺。巨法师虽然离开了桂林，但仍时刻惦念着那些同他同过患难，共过呼吸的老朋友，有诗为证：

“言入西山路，和风发籁音。

泉甘堪涤虑，茶淡自清心。

隐几双江合，开轩万木森。

难忘饯别意，对月每沉吟。

——一九四二年孟春再至西山寄怀桂林诸友”

西山风景秀丽，有吏隐洞、飞阁、乳泉等八大名胜古迹。法师在这里一面潜心研究佛学，一面筹划西山风景建设。桂林的一些老朋友也不时远道前来看他，如李焰生曾来西山住了一个多月。

我第一次见到巨法师是在广西梧州，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苍梧日报》刊登了一则有梧州商会等联名的启事，大意是定于某月某日请巨赞法师前来讲演，欢迎各界人士前往听讲，启事还扼要介绍了巨法师的经历。我才知道这位法师也是江阴人，

^① 卓，立；锡，僧人外出用的锡杖。僧人在某地居留称“卓锡”。

和我同乡。抗战期间，流亡在外的人遇见同乡，一般都感到非常亲热。这个同乡，又是个闻名的进步人士，而且是大学生当了和尚的。出于好奇心，我就慕名前往，不料这次听讲，竟然给了我终生难忘的感受和得以追随他老人家三四十年的因缘。我原以为法师演说，不外乎宣扬因果报应、封建迷信的说教而已，无非是在教者言教。可是大出意料，法师讲的主要内容却是呼吁佛教徒在这民族危殆，国难当头的艰险时刻，要与各界父老兄弟姊妹暨善知识，同仇敌忾，义无反顾，紧密团结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生产，组织缝纫、医疗救护等力所能及的工作，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支援前方。抗日救国，不仅人人有责，而且救苦救难，除暴安良，消灭害人的魔鬼，也是大慈大悲的菩萨行为，完全符合佛教大乘精神。

所有在场听众，无不为巨法师的爱国热忱和激昂慷慨的说辞所感动。听完演讲，我就赶到北山西竺园谒见了巨法师，刚寒暄了几句，清凉法师（西竺园当家）就来把他请走了。不久，我从梧州转到桂平工作，那时就经常上山，时得两位法师教益。

巨法师和觉光法师交同倾盖，谊切投胶，有很深很深的感情。觉光法师对巨法师推崇备至，与我也无话不谈，视我如手足。我所知道的关于巨法师的事迹，多数是觉光法师告诉我的。

在西山，我第一次和巨法师见面时，他就问我：“你的人生观是什么？”他这句问话，使我茫然不知所措，因为我那时虽已二十岁了，但惭愧得很，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国破家亡，天涯沦落的人，工作尚无保障，生活尚成问题，茫茫前途，谈得上有什么世界观！但愿早日打败日本鬼子，收复失地，重返家园，于愿足矣！我犹豫了一回，就这样坦率地告诉了法师。他摇

摇头，随即说：“不能这么消沉，青年人是祖国的希望，要有所作为，前途要自己创造。要立志，有志者事竟成。要有正确的革命的人生观。胜利一定会到来，要有坚定的信心，大家都要为胜利的早日到来，作出应有的努力。……”法师的谆谆教导，使我感动得几乎流下泪来。

巨法师一向忠恕待人，严于律己，但怀才不遇，事多拂逆。西山也是多事之秋：有一天晚上，觉光法师拿了两个洗脸盆，要我和他一起把盆里盛满了水，倒在吏隐洞外边的“乳泉”，（“乳泉”两字为陆荣廷所写，是西山八大名胜古迹之一）内来回倒了好多盆水。我问觉光法师为什么要这么做？觉光法师说：桂平县参议会副议长陈××和巨法师作对，因为法师从桂林来到桂平时，没有去登门拜访他，因此他怀恨在心，处处找借口，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巨法师到西山后，西山的风水被破坏了，菩萨不灵了，香火少了，乳泉干了等等，想以此煽动群众不满，陷害巨法师。

又有一天，觉光法师悄悄对我说：“朱哲，二月十九（观音诞辰）你一定要来，听说陈议长要带人来寻衅捣乱。”我听了很是气愤，二月十九一早，我就上了山，觉光法师关照我守护在巨法师的房门口，我从早到晚一步没有离开。那天善男信女很多，香火很盛，维持秩序的警察来了不少，桂平农场场长尹聘三（江苏萧县人）也派了十多个人来保卫。因为已有戒备，那天总算虚惊一场，没有发生什么事。

一九四四年，日寇疯狂挣扎，连陷长沙、衡阳、桂林、柳州，巨法师不得不离开桂平，避往北流。

饱经忧患，心多哀思！今天，巨法师又要与志同道合，两年

多来朝夕共处，祸福与共，为他老人家分忧任患的知心道友觉光法师告别了！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凄伤，含悲忍泪写下了如下首情挚意切，哀婉动人的离别诗：

“山门两载赖维持，缘尽思灵未忍离。

此去好研真佛理，男儿贵不负相期。

——一九四四年赠别觉光法师。”

巨法师到北流后，任教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该校本在江苏无锡，抗战期间迁至广西北流。校长姓冯。向达、饶宗颐等教授在该校执教。）巨法师由桂平至北流，路经容县时，我去旅邸看望了他。他到北流后，住在冯校长家里，我又去看过他几次。有一次，他对我说：“《新佛教概论》被游云珊（女画家，与关山月同为岭南派大师高剑父的弟子，时在玉林巡回展出）借去好几个月了，要我向她取回来。游云珊女士我在桂平蒋慧澄老太太家里见过几次，是熟人。到了桂林见面后，她很客气，对《新佛教概论》很是推重，连连对我说：“佛教要革新，要去粗留精，否则会被时代的浪潮所淘汰。巨法师的设想很好，我深有同感。”她表示非常赞赏，还要我转告巨法师，希望设法早日出版。在她住的旅馆里，她留我吃了饭，还当场挥毫画了一幅仿吴道子的观音像送给我。

抗日战争的胜利，举国欢腾。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法师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偕锡专同事饶宗颐、向达教授等登上北流山围之磐石山。八年萍飘浮泊，艰苦岁月的辛酸往事，恍惚间倏然涌上心头，法师百感交集。他无比激动，但又若有所思，感慨系之，奋笔疾书写了下面一首诗：

“避寇入山围，游欢乐已捐。

匈奴忽解甲，金甌缺复全。

登高一舒啸，慷慨动坤乾。”

一九四六年，法师回到杭州灵隐寺，任浙江省及杭州市佛教会秘书，对佛教界内幕有了进一步的洞悉。当时浙江省主席沈鸿烈及民政厅长杜伟曾先后多次鼓励法师草拟改革省、市佛教教务的计划，法师深感在国民党反动政府下面要谈改革，无异缘木求鱼，是办不到的，因此没有理他们。一九四七年，撰写了介绍灵隐寺历史的《灵隐小志》。在这本书的再版前言里，巨法师热烈歌颂了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衷心感谢周恩来先生对修复灵隐寺的亲切关怀。一九四八年，法师创办武林佛学院，兼任院长。这时浙江大学哲学系拟聘请法师前往任教，因时局紧张，未果。

在此期间，巨法师仆仆风尘，数度来往台湾、香港与澳门之间，蹈危履险，参与新民主革命活动。在香港时，他再次会见了李任公、郭沫若、沈钧儒、章伯钧、夏衍、廖沫沙等旧友。当时大家一致认为全国不久行将解放，佛教现状势将打破，以后究竟如何？大家都很关心。法师更深深感到佛教教务的改革，已成为当务之急，为了迎接新的形势，新的时代，过去的一些改革设想，如《新佛教概论》等，有调整、充实的必要。未几，就赴台湾考察。在台湾一个多月参访了很多寺庙。写有《台湾行脚记》一文，刊登于上海《觉有情》月刊。从台湾回到杭州后，巨法师就开始草拟改革全国佛教教务的计划，赵朴初居士也为此专程由沪至杭和法师商量，并想秘密召集分散在上海、杭州、宁波一带的有进步思想的佛教界人士开一个会，共同商讨，后因故未成。

在由香港回上海时，李任公还托法师转交一封秘密信给当时

为国民党软禁在京、沪的陈铭枢先生。巨法师不畏鼎镬，不惧刀斧，欣然受命，果不负所托，机智地完成了这次冒险任务。淮海战役一结束，法师又至香港，这时李任公已北上，陈劭先与吕集义（李任公夫人）先生等向法师转达了潘汉年同志要法师写个新中国佛教改革草案的建议，法师欣然承命。草案拟就后，即由潘老派员送往石家庄党中央所在地。

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巨法师毅然和李夫人等自港北上，夏衍、廖沫沙诸公还为他们此行发了个电报。因此，当法师一行一到天津时，即受到当局欢迎接待。四月十三日抵达北平。

法师到达北平后，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和讨论（与周叔迦老居士等），即以北京市佛教同仁名义，为改革全国佛教上书毛主席及各民主党派，其内容概括有四点：

一、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是历史上最光辉最伟大的，佛教界同人一致欢喜赞叹，踊跃爱戴。

二、佛教来我国，虽有一千八百多年历史，和我国文化的各个方面，虽也曾调和融摄，但在封建社会的长期统治下，不免逐渐变质，近三十年来虽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毫无成绩。

三、佛教的本质，不同于别的宗教，他“无神”，又主张“实践无我”。与时代精神相吻合，加以即待解放的西藏和台湾，都是崇奉佛教的。我们毗连着的国家，如安南、暹罗、缅甸、锡兰、印度、朝鲜乃至日本，都是根深蒂固的佛教国家。假定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漠视了佛教这个单位，恐怕对于解放西藏、台湾和世界革命的进展，或者会发生困难的。反之，如果新中国的国土上，出现了佛教的新姿态，对于全国的完全解放和世界的革命进展，或者也不无便利之处。

四、提出了“生产化”、“学术化”，两个口号，作为改革佛教一切制度的目标。生产化可以打破旧时各寺院封建的经济组织；学术化则加强佛教徒对于佛教的认识与正信，以破除迷信。封建的组织与迷信的愚昧既已毁弃，佛教革命的本质，才能完全流露。这对于争取佛教信众参加革命队伍，不是没有帮助的。

改革佛教教务，整理僧伽制度，这是巨法师的素愿。对此，赵朴初居士也认为“势在必需，与其被动，不如争取主动”。

这个有远见卓识的建议，不仅为当时有关方面（如李维汉、林伯渠、胡乔木、张友渔等同志）所重视和嘉许，即就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也还有它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在收回广济寺，创办《现代佛学》、大雄麻袋厂，筹备成立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佛学院等等一系列问题上，巨法师又多次上书中央有关领导，并得到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笔复信。毛主席在复信中指示巨法师与政务院李维汉秘书长联系。对毛主席的这封亲笔信，巨法师很为珍惜，请人裱了，挂在他的书房中，有好长一段时间，佛协的工作人员都见到过。

巨法师早年就献身革命，对党和新中国有无限深厚的感情。他无比喜悦的心情，常常溢于言表。办僧尼学习班，办佛学杂志，办麻袋厂，他听思夕筹，无时不思以实际行动多做贡献。

一九五三年，陈铭枢为庆祝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写了一首诗，巨法师即步原韵和诗一首，热情歌颂祖国的繁荣昌盛：

“禹颜非异轍，真俗本相依。
国运隆前古，梵葩香益奇。
抑扬除旧垢，澹泞接新机。
不作两头话，披衣得坐时。”

建国十五周年时，他感慨万分满怀激情赋词一阕《满江红》，
赞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歌遍行云，旂挥红浪，满城花雨缤纷。光华日月，
勋业冠群伦。多少丹心碧血，皆回向，祖国人群。凝眉
处，东风浩荡，英爽动乾坤。

凄凉思往事，魑魅魍魉，豕突狐奔。漫招致山河破
碎如焚。搔首问天不语，又谁信，扫尽氛昏。嶽峯甚，
誓随高躅，努力建斯文。”

巨法师为了佛教的改革，栉风沐雨，辛勤奔走。可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到处碰壁，苦无建树，他的理想是无法实现的。新中国的诞生，宗教信仰才有了真正的自由，党的政策也给予了中国佛教以涤瑕荡垢，重放光明的机会，全国各族佛教徒才得以团结一致，精进不懈。往事不堪回首！有着亲身感受的巨法师怀着无限感激党的心情，经常号召佛教同仁要爱国爱教，众善奉行，促进团结，绍隆三宝，成就“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大行，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他一再强调佛教徒要真正发扬释迦牟尼的革命精神，从事劳动生产，真正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他还常常告诫和勉励佛教徒要认清时代，认识佛教的真精神，才能接受改革佛教教务的理论与方法。

巨法师敦气节，重然诺，言信行直，人乐与交，与之忘年投分的朋辈很多，与李任仁、田汉诸公更为莫逆。一九四二年在桂平闻悉国民党假选举之名，行排斥之实，迫害李任仁先生，忿忿不平，寄赠以坚硬著称的桃榔杖及诗一首，表示慰问和支持：

“坡公迁岭外，此杖独随行。

坚过仙人杞，文如紫玉英。

灵山分得种，净手自雕成。

世路犹崎岖，扶持步履轻。

——桃榔杖寄赠李任仁议长”

法师与田汉同志分手以后，彼此尤念念不忘，相互唱酬寄怀之作很多，摘录一首如下：

“崎岖山下路，惻怛佛家情。

对镜惜华发，年来白几茎。

——一九四二年岁暮，寄怀田汉桂林”

解放后，田汉同志与巨法师同在首都，时相聚谈，相得益彰。文化大革命中，田汉同志遇害，法师得悉后悲痛异常，有好几天饮食不下。田汉同志平反后，法师犹旧情难置，伤感不已，口占悼诗一首：

“靴声橐橐忆当年，慷慨陈词猛着鞭。

南国剧场聆夜话，祝融峰顶设斋筵。

北来常作书房客，迟到方知厄逆连。

往事萦思剩一恸，于今昭雪尚凄然。

——悼田寿昌”

在反右斗争中，法师含垢忍辱，检查了十次，几乎被打成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法师被关了整整七年。有功革命，而受无妄之灾，法师始终恬退为怀，不以荣辱介意。用舍行藏，不足撻其胸臆，处怨尤交集之中，独能泰然自持，超然扬外，胸无城府。一九七五年出狱后，仍有“不婚不宦情如洗，独往独来无所求。收拾乾坤归眼底，一肩担却古今愁”的眼量与胸怀。岁寒知松柏，疾风知劲草，得失毁誉如浮云，才高行洁如法师者，实足以师千古。

法师德闻强记，敏而好学，明于经，优于史，妙于文，工于诗。通英、日、德、俄等外语，晚年又孜孜不倦攻习法语。

“不积跬足，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佛教经典浩繁，文义深奥，难以卒读，其中积极意义，尤非一般人所能理解。巨法师乃能锲而不舍，寝馈其中，终能在佛学上出类拔萃，成为卓越超群的一代巨人，其著述之富，为当代佛教界中所罕有。嘉言懿行，楷模一代。遗著甚多，惜战祸纷飞，散失者可能亦不少。近闻香港觉光法师处，保存了一部分法师遗稿。殷切希望有关方面能将这珍贵的遗作，整理出版，以供同好，以慰法师在天之灵。

解放以还，巨法师在长期参与中国佛教协会领导工作中，积极协助党和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增进各民族佛教徒的团结、培养佛教人才、开展佛学研究等工作，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曾多次出国访问，增进了中国佛教和国际佛教的交流和合作。近年，法师又以耄耋高龄在百忙中担任《大百科全书》佛教部分的编撰工作。

一九八四年四月九日，这位佛教界的传奇人物终以劳累过度，不幸去世，终年七十六岁。法师遽归道山，中外闻者莫不扼腕悲悼，无不认为这是佛教界的一个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四月二十七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邓颖超、李维汉、帕巴拉·格列朗杰、叶圣陶等送了花圈。习仲勋、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刘澜涛、杨静仁、屈武等参加了追悼会。

巨赞法师在湖南的抗日活动

戒 圆

戒圆法师系长沙佛教协会副会长。一九八〇年曾对巨赞法师抗战期间在湖南发起南岳佛道教难会及组织佛教青年服务团等活动作过详细调查，写成《南岳佛道教难会的成立及其活动》，经巨赞法师修改后编入湖南省志书稿中。本文是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特请戒圆法师撰写的。

——编者

抗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军一再败退，广州、武汉相继失守，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国共合作的历史背景下，为培养一批敌后游击干部，一九三九年春，共产党派叶剑英同志到南岳参加国共合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并任副教育长。周恩来同志数次来到南岳指导工作，同叶剑英一起接待了许多各界人士。这时，一些经常阅读《新华日报》、与进步文化人士有联系的佛教徒，如巨赞、暮笏等都由沩山密印寺迁往南岳各大寺院。

巨赞在抗战之前曾在支那内学院专攻佛学四、五载。一九三七年准备赴德国深造，因抗战爆发，未能成行。一九三八年，他

辗转来到湖南，先后在浏山、南岳从事佛学教育事业，一度曾在浏山佛学社任教，后在南岳创办华严大学。他是国内著名的坚持进步、追求革命的佛教学者之一，著述不少。他和暮笏法师眼见祖国大好河山被日军铁蹄践踏，心情异常沉痛，同情和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周恩来曾在暮笏的纪念册上写下了“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题词。巨赞法师在出家前就认识田汉同志。这时田汉与冯乃超、鹿地亘从桂林来到南岳，在上峰寺见到巨赞后，即把他介绍给叶剑英相识。叶剑英同志的亲切交谈和教诲，在南岳佛教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于是以巨赞、演文为首，发起组织“南岳佛教救国协会”，于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在南岳庙召集僧、道全体大会，接着又举行了各寺庙负责人联席会议。叶剑英同志来到祝圣寺同大家交谈，了解到“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就要召开成立大会时，立刻找到为首的几个人，表示支持他们的爱国行动，然后又商量说：“我建议你们这个组织的名称改两个字，将‘教’字改为‘道’字，‘国’字改为‘难’字。这样就可以团结更多的宗教界爱国人士。不仅仅僧尼，还可以把道士都团结起来。搞民族救亡，团结的人越多越好，越广泛越好。”“南岳佛道教难协会”的名称定下来以后，于五月七日在圣化寺召开成立大会，叶剑英应邀参加，并作了讲演。后来暮笏将这讲演的记录稿邮寄给夏衍同志在桂林办的《救亡日报》，该报不但发表了，并且热情洋溢地撰文支持声援宗教界人士起来抗日。

在南岳佛道教难协会的成立大会上，选举上封寺方丈宝生为会长，祝圣寺方丈空也、南台寺方丈悟真、大善寺知客有缘、三元宫住持刘光斗道士为副会长。协会设若干股，巨赞任宣传股长，演文任训练股长，灵涛任书记长（相当于秘书长）。当时国

民党也想抓这个组织，空也、悟真对巨赞、演文抱着怀疑的心情，南岳有些豪绅也暗中支持空也等人。通过灵涛在暗中调停，才达到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目的，使这个爱国抗日组织顺利地建立起来并开展工作。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宣言和组织大纲在衡阳《大公报》上发表。暮笏写的《炮火下的一群僧青年》一文曾发表在邹韬奋主编的刊物《全民抗战》上。

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后，首先在祝圣寺、南台寺、福严寺、上封寺、大善寺等寺招集青壮年僧侣和少数道士约七十多人举办军事训练班，五月八日开始，六月二十日结业。这些僧人道士组成一个大队，大队下设中队，中队下设小队。大队长演文，中队长有三个，由大定、竺尹等担任。受训课程有：政治常识、佛学、军事常识、救护常识、精神讲话、抗战歌曲等六门，其中佛学由僧人自讲，其余课程请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民运指导处指导员等军官来协会讲授。在学员中选出三名到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训。凡参加受训者，都穿新式僧装，带红色三角符号，统一由救难协会供应伙食。集中训练一个月以后，在学员中选出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佛教青年组成两个宣传队性质的组织。以巨赞、演文为首的叫佛教青年服务团，以暮笏、绍贤为首的叫佛教流动工作团，分赴长沙、湘潭两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巨赞、演文带领的佛教青年服务团六月十日成立，成员有大定、洗尘、焕文、常乐、可亮、澄源等十二人。六月三十日晚从南岳奔赴长沙，人人脚穿草鞋，头戴草帽，打上绑腿，不畏艰苦，雄赳赳气昂昂地投入火热的抗日救亡斗争。到长沙后，七月四日开始工作。那时上林寺已在一九三八年被大火烧毁，开福寺放满了枪炮子弹，他们只好落脚在一个小庵——华严精舍内。他们在

《阵中日报》出《佛青特刊》（七月十一日出第一期），宣传抗日主张和佛教徒的抗日活动。他们广泛与社会各界接触，动员和组织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还在街头刷标语，出壁报《佛青》，作通俗讲演。群众亲切地称他们为“和尚兵”。许多佛教徒捐款捐物支持他们，如长沙市白云庵比丘尼翊莲赠他们每人一顶草帽、一床草席。团员光宗病了，翊莲老人亲自为他寻找单方和药物。她竖起大拇指赞道：“巨赞法师到底是有本领的人，国难当头，人人有责，他们这样干，就是要得。”开福寺、龙王宫也设斋招待他们。这一时期，长沙市、县均设有佛教会组织，佛教青年服务团全体成员会同佛教组织中的各寺庵僧尼七十人，于八月十四日下午四时集体举行国民宣誓。在此之前，已于七月二十八日成立“长沙佛教青年战时训练委员会”，另行准备设全省性的僧伽训练班，地址选在开福寺，由湖南省佛教会指令各县佛教会保送青年僧侣来省受训，拟请国民党湖南省民政厅、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公安局派员当教官。计划九月三十日开学，报名者已有四、五十人。这期间，徐特立同志曾在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接待了巨赞，两人多次作亲切交谈，引起国民党特务注意，曾盘问巨赞与徐特立谈些什么，巨赞幽默地回答：“他讲唯物主义，我讲唯心主义。如此而已。”那个家伙无言以对。

九月中旬，日寇集中两个师团的兵力，开始向湘北进攻，矛头指向长沙。敌人此次进攻主要是为了在政治上压迫国民党，向其诱降；第二个目的是掠夺洞庭湖的粮食，十月初即自行撤退了。国民党事后虽然大肆喧嚷他们的“第一次湘北大捷”，但当时不但不组织军民抗敌，反而借口“诱敌深入”、“战略转移”，强令长沙市所有军民一律疏散、撤退。佛教青年服务团不得不于

九月二十五日解散。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巨赞与道安、暮笏等在桂林一起创办《狮子吼》月刊，号召佛教徒抗日救国。

佛教流动工作团约二十五人，自智、心专、灵根、观念等人均为团员，由暮笏、绍贤率领到湘潭海会寺，该寺住持灵悟、监院拂云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隆重举行了招待会，湘潭各界人士赴会，国民党湘潭县党部、湘潭日报社都派人参加，会上散发了大量抗日救亡的传单，全体团员在某戏院举行了国术表演。有一天还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游行，前面乐队奏管乐，团员沿途贴标语、发传单。标语中有“当汉奸的，生受国法死堕地狱”一类结合佛教教义宣传民族气节的口号，这些标语，每一条都是明真法师亲自草拟的。佛教流动服务团的宣传活动在湘潭轰动一时，老幼妇孺人人皆知。他们原准备到衡阳去，因事未果，仍回到南岳。巨赞在长沙解散佛教青年服务团后，曾到湘潭拜访过碧辉法师。

总之，一九三九年南岳佛道教难会的成立及其活动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宗教界发生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的全过程都与巨赞法师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无论在中国现代佛教史上还是抗日战争史上都应占一席之地，其历史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一九八四年）

我与巨赞法师的相识

沈 醉

惊悉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病逝，我哀痛之余，又内疚不已。

读者也许奇怪：这位佛门长老还会与我有何恩怨吗？是的！不过这事我自己也是解放后才知道的。

一九六三年秋天，在全国政协礼堂休息厅里，我遇见了阎宝航委员。谈笑之间，一位中等身材、风度儒雅的佛门长老向我们走来。阎老忙迎上去握着他的手，并介绍说：“这位是沈醉专员，这位是巨赞法师。”

我忙合十，握手说：“久仰，久仰！”

老法师笑眯眯地握着我的手，出人意料地说：“手劲不减当年！”

“哦！您过去认识他？！”阎老的惊诧不在我之下。

“岂止认识，他那两个耳刮子打得我好重哟！”

听这话，我更加吃惊了。过去，我虽然杀人不眨眼，打人不计其数，却何时打过他呢？大概是他记错人了吧？！我尴尬而又疑惑地望着他，不知如何是好。

他还是笑眯眯地望着我说：“忘了吧？抗战时，在常德稽查处……”糟糕！确有其事，我突然想起来了……

抗战期间，我曾在湖南常德警备司令部任稽查处长。当时，

我还自以为是主张抗日的“爱国志士”。听到南京失守，日本人长驱直入，而常德的军政、工商巨头们仍旧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很感愤懑。

一次，听说常德警备司令的爱妾要来常德。上至县长、商会头目，下至土豪、乡绅无不为了取悦司令而四处奔走、动员，备酒、设宴。夫人到达之日，几乎全城出动，前往渡口迎接，那阵势宛如在迎接一位抗战凯旋的“巾帼英雄”。

当时，我二十五、六岁，年轻气盛，认为国难当头，如此隆重地去迎接一个女人，实有伤党国威信，即写了一首讽刺诗，以劝谕同僚，诗中这样写道：

空巷空街接美人，美人容貌果倾城，

伤心半壁沦亡日，举国烽烟独太平。

后来，我将此诗送往《自强日报》，用化名发表了，许多不解内情的人，均夸这诗写得好。我也很得意，甚至为自己有如此“忧国忧民”之心而感动。

就在这不久，江浙地区有一批难民逃到了常德，其中还有几个出家人。难民们流离失所，怨声载道。听部下报告说，难民中有一个法名叫传戒的和尚到处宣传说，国民党不抗日，弄得国土沦丧，百姓无家可归……。

我听后便怒从中来。我想国民党不积极抗日，国土大片沦丧虽然都是事实，我自己也写诗讽刺过这些情况，而我是出于对党国的爱护，是为了维护国民党的统治。但平民百姓批评国政，指控党国的政治弊端则肯定是别有用心，是意欲危害党国，扰乱民心。这还了得？我立即派人把传戒抓来审问。一见面，我就凶狠地怒斥道：“你好大的胆子！你一个出家人不安分守己地念经超

度，却跑到这里来妖言惑众。你说！是不是共产党派你来的？你为什么要到处宣传说国民党不抗日？辱骂党国，蛊惑民心？”

他见我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就双手往胸前合十，双眼微闭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然后不紧不慢地说：“出家人不问政治，无党无派，但国土沦丧却是事实。如果贵党抗战，我偌大的中华何至于败在小小日本之手？如果贵党抗战，我等出家人何至于流离失所，逃到此地来？……”他振振有词地回答，使我恼羞成怒，上去就是两个耳光，并破口大骂道：“××，你倒跑到这里来宣传了？老子不看你是出家人，今天就毙了你……。”

回首往事，我顿时面红耳赤，愧感交集，忙道歉说：“老法师，实在太抱歉了，请多多原谅！”

他忙说：“不！不！你那两个耳刮子打得好呵，我还得感谢你呢！”说完诙谐地一笑，对阎老说：“要不是他那两下子，我也许还不会那么痛恨国民党呢！过去，我恨是恨，没恨得那么厉害。”他转过身又神秘地对我说：“你知道，我们出家人素以慈悲为本，是不应该恨人的。可是你那两下真把我气极了，我晚上打坐的时候，心里还恨得咬牙切齿。后来，我才坚决地走向了共产党。所以，我有今天，不是还得感谢你吗？”阎老和我听他这么一说，都随着哈哈大笑起来……。

以后，我俩每次见面都象老朋友一样亲切，彼此毫无顾忌地开玩笑……。

如今，巨赞法师虽然逝世了，但他那朗朗的笑声，诙谐的话语，依然记忆犹新，在这悼念之际，特撰此文，以表我对巨赞法师的敬意和歉意。

（转载自《文史通讯》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北平解放前夕“北平市各界 人士代表团”出城与 解放军谈判经过

王 瑞 堂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胜利完成了辽沈战役作战任务后，未及休整，便接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命令，挥师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十二月上旬，四纵队从南口入关，分别包围了北平至张家口一线的康庄、怀来、张家口之敌，并与华北野战军一起全歼了康庄、怀来、张家口之敌。接着，纵队又向北平方向进军，很快扫清了北平以西海淀一带的敌人，做好了攻城准备，只要党中央的命令一下，一场激烈的攻坚战就要开始了。

一九四九年的一月一日，蒋介石发表了元旦求和声明，并宣布“隐退”，让广西实力派的首领李宗仁当代理总统，妄图玩弄和谈计谋，以挽救国民党垂死的命运。针对蒋介石的求和声明，党中央毛主席于一月五日发表了《评战犯求和》一文，于一月十四日又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实现和平的八项条件。这八项条件一发表，震撼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大大小小的军政头目。北平的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在我党我军强大的军事、政治双重压力下稳不住了，开始考虑走和平谈判的道路，但又不甘心老老实实

地执行我党提出的八项条件，便派出了以北平市市长何思源为首的各界人士代表团来我方摸底，进行和谈侦察。

为了打破敌人在和谈问题上的幻想，进一步宣传我党的方针、原则，在叶剑英同志、彭真同志领导下组织了一个班子，并在北平以西的海淀镇设立了联络处。我当时在四纵队十师政治部担任敌工科科长，参加了联络处的工作。这次对付敌人侦察战的主帅是第四纵队政治委员莫文骅同志，在党中央和中央首长的直接领导下，我们做好了和谈的准备。

一月中旬的一天，联络处接到四纵队司令部的电话：何思源率领的北平各界人士代表团十一人，将于下午两点钟左右从西直门出城到达海淀。四纵队原来是山东胶东军区的部队，听说何思源是代表团的团长，便议论纷纷，有的说：“何思源在山东时当过国民党的教育厅长、省主席，日本鬼子来了以后，又当过汉奸。这个老汉奸当起和平谈判的团长来啦！”还有几个山东籍的干部、战士唱起来了：“何应钦，何思源，都是头号的大汉奸……”这是抗日战争时期骂汉奸的一首流行歌曲，他们一唱，引起了同志们的哄笑，阵地上十分活跃。当天下午三点多钟，从西直门开出了三辆小轿车，慢慢腾腾地来到了我军的前沿阵地，为首的何思源和他的秘书李某下了车，对我们的干部战士说：“鄙人是何思源，经贵军允许到海淀联络处有公事商讨。”有些山东老战士听说何思源的名字，又唱起了那首骂汉奸的歌子。何思源一听，神经非常紧张，赶快上了汽车，由我们接待的同志把他们带到了海淀。

莫文骅政委在联络处的客厅里等待着代表团的到来。当何思源一行来到客厅时，莫政委很热情地说：“何先生，辛苦了！请

坐，喝茶。”何思源看我们待他很客气，阴沉而紧张的脸上开始有了喜色，何思源边喝茶边说：“莫将军，贵军的官兵真了不起啊，我的过去他们都非常清楚。”莫政委说：“我们不仅了解你的过去，对你的现在我们也是了解的。”何思源眼神一楞，含着苦笑说：“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我要为北平的和平尽自己的力量。”莫政委问：“何先生这一次到海淀有何贵干？”何答：“一是表示对贵军的问候；二是为了探讨一下北平的前途问题。”莫政委说：“从目前的情况看，北平的前途是十分清楚的，傅作义的五十多万军队已处在我分割包围之中，西进之路已被我切断，南逃没有出路，海上也被我封锁，因此北平的前途只能有两个：一是穷兵黩武，顽抗到底，把北平化为灰烬，数十万军队遭到全歼，那只能在傅作义的罪行录上增加新的罪行，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可耻的失败；二是接受我党提出的八项条件，举行谈判，争取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这样，一场战争灾祸可以避免，这是北平二百多万人民所盼望的，也是傅作义最光明的前途。”何思源一听可以举行和平谈判，便急忙追问：“关于和平谈判，贵军有何具体的主张？”莫政委果断地说：“谈判的具体条件就是我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八条，不知何先生看过没有？”接着，莫政委把和谈的八条念给代表团听。何思源听了这八条以后，脸色深沉地表示：“毛泽东先生提出的八条，兄弟已经拜读过了，只是这条件太……难以……。”接着何思源又阐述：“北平的老百姓是盼望和平的，如果条件能够宽容一些，和谈便能顺利地进行，如果把傅作义先生也列入战犯名单，那怎么能谈得起来呢？”莫政委明快地指出：“北平人民是要和平的。我们也是赞成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但要的是真正的和平。我党提出的八条就是实现真正和

平的依据，缺少那一条都不可能实现。至于战犯问题，那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有的人，像傅作义先生，能够认清大局，举起义旗投向人民的怀抱，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能够立功赎罪，战犯名单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但是，如果有人妄想玩弄和谈骗局，死心塌地，顽抗到底，继续犯罪，那么想把战犯的名字从名单上拿下来，人民也是不会答应的！”何思源听到战犯可以立功赎罪，有功的还可以从战犯的名单上拿下来，眼睛一亮，急忙表示：“领教，领教，真是至理名言，我一定将贵党的主张转达给北平的有关当局。”接着他又提到另一个问题，“贵党的和谈八条中提出没收官僚资本，这一条的含意是什么呢？”莫政委回答：“官僚资本是指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及其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就是对这一部分财产，加以没收，为国家所有。例如铁路、银行和官办的厂矿企业必须收归国家所有。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厂矿企业不仅不予没收，而且还要加以保护和发展。”何思源立即振奋地表示：“兄弟顿开茅塞，如见光明。”吃晚饭的时间到了，下午的谈判到此为止，确定次日上午继续交谈。

晚饭后，按照我们预定的计划，采取分头接触的办法，进一步把这个代表团的情况摸清楚。我分工的谈话对象是代表团中两个老太太，一个是康有为的孙女，一个是西直门里十三小学的李校长。我陪着他们往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的马路走去，边走边谈，我说：“这次代表团来海淀，处在兵荒马乱之际，怎么让你们两位老人作代表呢？”这位康老太已经七十多岁，走路还要靠一根棍子才能移步，战战兢兢地说：“是呀，我是快入土的人了，还当什么代表！昨天市党部一个什么书记长来到我家，一定

要我参加代表团，当士绅名流代表，我很害怕，没有答应，后来他说非来不可，没有办法就坐着汽车来了。”我又问李校长：“你是怎么当的代表呢？”李答：“昨天，我正在给学生上课，也是市党部来了一个书记长找我，要我当教育界代表，我给他讲，我老了，走不动了，可是今天中午硬把我装上汽车拉来了，谁知道他们要干些什么，真见鬼！”我又问：“这次代表团出来要干什么他们没有给你们讲吗？”康老太答道：“给我讲是出城慰问贵军，别的就不清楚，今天上午讲了什么和谈呀，八个条件呀，我们妇道人家那管那么多！”讲着讲着康老太激动起来了。李校长也不满地说：“那个市党部的书记长还对我说到海淀看看风景，兵荒马乱有什么好看的，要看叫他们带着夫人、小姐来看嘛，叫我们老太太来看什么风景，真叫人奇怪！”我又问：“代表团这些人你们都认识吗？”康老太太沉思了一下说：“何市长我是见过的，可是昨天那个书记长今天变成了工人代表了，为什么这样做我也说不清楚。”李校长又说：“今天在来海淀的汽车上，他说他是工人代表，叫我不要对别人说他是市党部的。还有一个大个子，以前到我们学校抓走了一个老师，今天他说他是商界代表，不知他们想干什么事？”这时天色已经很晚了，我们又从燕京大学的路上回到了海淀住处。这两个老人说的情况很有价值。看来，主角还在隐藏着自己的身份，他们企图在海淀得到他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已经是夜晚十点钟了，何思源的工人代表突然向我们提出，代表团希望到颐和园去住宿。研究后立即给他们作了回答：“夜已经很深了，不便另作安排。颐和园是古迹保护区，已派部队封锁，到颐和园不方便。”我们判断，敌人是想摸摸我们的攻城准

备情况。这个判断，午夜以后得到了证实。陪同何思源来的李秘书找联络处的同志谈了这个代表团的底细。

李秘书是中共北平市委城市工作部的地下工作人员，被组织派去专门做何思源的工作的（当晚已向城工部查对，李秘书确实是自己人），他对这个所谓北平市各界人士代表团作了如下介绍：“第一、这个代表团是何思源根据李宗仁和傅作义的授意组织的，其目的在于打着和谈和慰问的幌子来摸我们的底，主要是摸清我们的和谈条件、具体办法，以及我军攻城准备情况，总的意图是玩弄和谈，以和谈拖延时间，保存实力，巩固国民党统治的地位；第二、代表团的组建是傅作义和何思源具体安排的，他们怕露出这次实地侦察的马脚，所以用北平市各界人士代表团的名义作掩护；第三、代表团的成员是十分复杂的，除了那两个老太太是硬拉来作掩护的以外，其余的都是中统、军统和市党部的人，他们表面上要到海淀和颐和园看看风景，实质上他们想作一次实地侦察，摸我们的底。他们明天要在和谈时间上作文章，请务必注意。”李秘书提供的情况极为重要，将有利于我们第二天的斗争。

第二天上午，第二轮会谈开始了。果然不出所料，何思源主动提出了时间问题：“我是愿意为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奔走的，可是……贵方能给兄弟足够的时间，我便可以从各方面进行周旋。”莫政委问：“据何先生看，需要多少时间呢？”何答：“起码需要三个月的时间。”莫政委微微一笑，站起来果断地说：“何先生，当前形势的发展是日新月异啊，你从西直门到海淀一路上已看得非常清楚，我军对北平的攻击准备已经完成了，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即可进行总攻。你要三个月的准备，我们是不同意的。”

何思源急忙又问：“三个月太长，两个月或者一个月行不行？”莫政委答：“北平人民目前正处在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他们要求马上解放北平，一个月的时间对北平人民来讲是太长了。”何又问：“半个月行不行？”莫政委答：“半个月也不行！我们给你们的时间已经很多了，自毛泽东主席发表《评战犯求和》以来，已经半个多月了，假如你们真有和谈的诚意，绝对不要那么长的时间准备，只要三五天就可以作出理智的决断。”何思源的脸色由激动变为沮丧，哀叹地说：“三五天时间，实在……贵方太……。”莫政委爽朗地说：“是不是我们太苛刻了，不是的！我们是从人民的愿望出发的，拖久了，数百万北平市的人民是不会答应的。请何先生转告傅作义先生，希望他能够认清局势，当机立断，迅速举行正式谈判，真正的和平一定会到来。不过，假如有人不是为了真正的和平，而是玩弄和谈阴谋，故意拖延时间，其后果就难以设想了，到那时你们后悔就晚了。”这些代表们听了莫政委这一番话以后，多数人点头，也有的目瞪口呆，唉声叹气……。他们在精彩地表演着自己扮演的角色。

吃过中午饭，这个代表团就要回城里去了，我专门找三个司机在一个桌上吃饭，打算从三个司机那里了解一些情况，还想通过他们把一些宣传品带进城去。从交谈中知道有一个卧车是市党部的，有一辆是军队系统的，有一辆是何思源的专车。前两辆车的司机很狡猾，什么情况也不透露，只有何思源的司机对我们很热情，但在吃饭的时候也没谈什么话，饭后我们个别交谈时话匣子就打开了，他说：“市党部那辆车的司机是中统的人，军队系统那辆车的司机是军统特务，原来他们都不是开车的，这次出来他们到处打听消息，千方百计地想搞我们的情报，你们要多加注

意。”后来李秘书对我们讲：何思源的司机是自己人，可以信得过，宣传品可以让他带，那两个司机是中统和军统的，一点风也不能向他们透。我们趁代表睡午觉的时候，在李秘书和司机的帮助下，把两捆宣传品藏在何思源专车的座位底下，带进城去了。

以何思源为首的北平市各界人士代表团，在我方活动了两天之后，又回到北平城。他们在离开海淀之前，一方面再三表示感谢我们热情、诚恳的接待，两个老太太甚至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另一方面，他们对于我党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原则以及实现和平的方针一再表示赞赏。事实证明，由于我方坚持斗争并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次与代表团的对话，为北平的正式和平谈判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傅作义将军终于全部接受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北平守敌在傅作义将军的率领下接受了和平改编。我军于一月三十一日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整个平津战役即胜利结束。

回忆赤峰、承德军调执行小组的斗争

段苏权



段苏权同志
摄于解放战争时期

一九四五年十月，国共和谈签定《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密令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在国民党的军事进攻遭到沉重打击后，美蒋发现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处于不利地位，为了争取时间，部署全面内战，又挂起了假和平的免战牌，合演了一出“调处国共两党争端”的文明戏。翌年一月，根据《停战协定》，北平成立由国方（国民党）、中共 and 美方参加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并派出若干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分赴各冲突地点进行调处。赤峰第二执行小组和承德第十一执行小组，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我作为中共代表，先后参与了这两个小组的工作，现根据有关史料和记忆所及草成此章，如有笔误切望斧正。

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国共双方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十日，双方下达了停战命令，并规定十三日二十

四时生效。这个协议给人们带来了一丝熄灭战火的希望。但是，蒋介石在和平幌子的掩护下，变本加厉地进行内战准备。就在停战令公布前夕，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军队“星夜前进”，“秘密迅速占领有利地点”，“抢占战略要点”。停战令下达后，国民党在关内的大举进攻虽然停止了，但对我解放区的蚕食和偷袭则不断发生；与此同时，又以“接受主权”为名，增兵东北，派五个军到山海关。这就给军事调处工作造成了极为困难的局面。

纵览全国当时军事冲突形势，热河省是争夺较为严重的地区。而赤峰又是国共双方争议较大的热点地带。为了制止国民党军的进攻，军调执行部派遣美国海军陆战队飞机于一月十六日晨飞往赤峰地区上空散发停战命令。与此同时，军调执行部组成赤峰三人执行小组：国民党代表为谷礼汉上校，中共代表为段苏权少将（因工作需要，临时授予此军衔），美国代表为杜锐孟·德梯乐上校。我们一行六人（包括我方翻译周立波和美方翻译、译电员等）于十六日同机飞往承德，十九日抵达赤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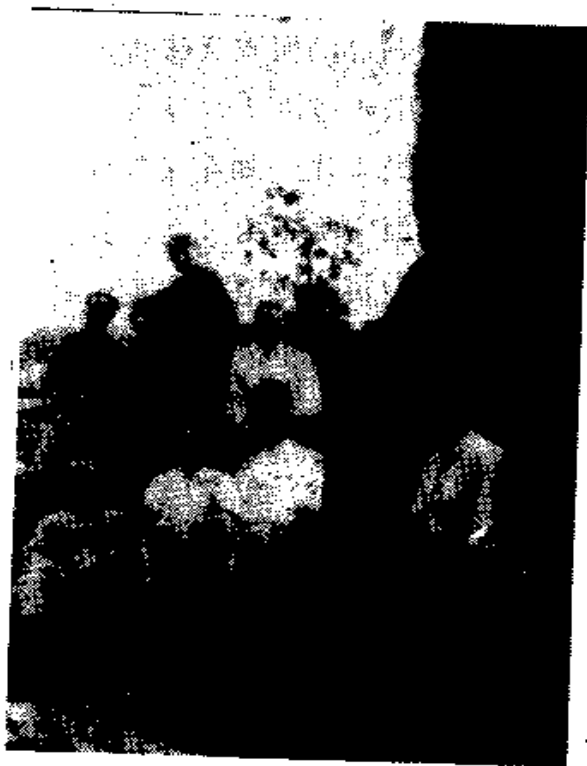
军调执行小组的主要任务是：监察停战令执行情况，调处双方有争议的事宜，防止发生军事冲突。执行小组名为三方，实际上美国和国民党是一方，中共为一方。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假“调处”之名，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的势力。正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所述：调处是“使政府（国民党政府）能趋于稳定”，“在中国广大的地区建立其权威”。这就使调处执行小组内充满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对于这一点，当时我们是有思想准备的，因而头脑是清醒的。那时，我们都有这样的想法，在这场斗争中，遵照毛主席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与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和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北平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及冀热

辽分局的指示，决不让他们在谈判桌上讨到便宜。

赤峰执行小组到达赤峰后，首先解决军队停止地点、赤峰归属和赤峰驻军等问题。

赤峰位于热河省北部。

一九四五年八月，我冀热辽部队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了全热河，建立了热河省民主政权。与此同时建立了赤峰中共地委、行署、市委、市政府（地委书记宋诚，专员王新华、市委书记卫官芝等同志），管辖地区有赤峰市、赤峰县、乌丹县、建平县、新惠县、平泉县。由于国民党军在停战令前没有抢到赤峰，此时就想在谈判桌上取得对赤峰的控制权。国民党代表根据东北剿共总司令杜聿明的指令，要求接收赤峰。他们说：“如果保安队是共产党的，则苏联允许保安队在赤峰就是破坏中苏条约。如果保安队是第三者的，则政府应接受赤峰，反正非接收赤峰不可。”我们根据停



赤峰、承德军调小组我方成员与冀热辽领导干部合影。前排右起：王乃天（第三任承德执行小组中共代表）、赵毅敏（中共冀热辽分局宣传部长）、凌莎（建国学院教育长）、段苏权（热河省军区司令员兼承德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后排右起：程子华（冀热辽分局书记、代司令员兼政委）、李逸民（朝阳执行小组中共代表）。第三排：张苏（朝阳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助手）。

战协议，严词拒绝，指出，赤峰在日寇投降后，一直为我解放区，不得以任何借口强行霸占。经过斗争于一月二十一日达成如下协议：国民党军队停止在太平地，八路军停止在北井、双庙；赤峰由共产党领导的保安队维持治安。同时，北平军调执行部也命令国民党军队不准进赤峰城内。按理，有了协议就不成问题了，但美方和国民党代表却在保安队问题上纠缠不休。

赤峰保安队是由黄文、张立文率领的宁（城）赤（峰）游击队和共产党员王逸伦、黄英信同志组织的地下军合编而成的。苏联红军进入赤峰不久，赵复兴同志于十月上旬从延安来到这里，担任保安队司令员。这段历史十分清楚地表明，赤峰保安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武装。然而，美方代表为了达到撤走保安队的目的，谈判中暗示国民党代表杜礼汉，让其对保安队入城时间提出异议，杜礼汉未加理会，美方又暗示杜要求调查苏联红军未撤时城内保安队的人数，杜礼汉还是未领会美方意图。德梯乐只好赤膊上阵，提出上述问题。对此，我们以热中保安队形成历史予以驳斥，使美方无言以对。

在赤峰驻军问题的协议达成后，国民党仍不甘心放弃进驻赤峰的野心，又唆使中央社造谣，说：“国民党军将遵照执行部命令进入赤峰。”妄图以此迫我就范。为此，在我方的提议下，三人执行小组于一月三十一日晚在美方代表的房间里，举行了集体记者招待会，就赤峰驻防部队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

问：“赤峰治安由谁负责？”

答：“本地保安队赵复兴部。”

问：“保安队归谁指挥？”

答：“共产党指挥，小组认为是共产党的武装。”

问：“保安队何时在城内？”

答：“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保安队即在城内。”

这次记者招待会，揭穿了国民党军妄想进驻赤峰的阴谋，使中央社的造谣不攻自破。

美方和国民党代表在赤峰驻军问题上遭到失败以后，中央社又造谣说，保安队到赤峰郊区之四道井子驻防，“有违停止冲突命令”。事实是：为了维持赤峰治安，经执行小组同意，保安队曾派二百人到四道井子加强警戒，后来执行小组说明不需要到此地驻防后，保安队就撤回了。调处中，美方和国民党代表就是这样，经常利用他们的通讯社、广播电台、报纸造谣，对我施加压力。

建平问题，也是双方争议的重点地区。该地原属赤峰管辖，停战前国民党并无驻军。一月二十七日，我军为了自卫，保安队予以进驻。国民党和美方代表以此事大作文章，污蔑我不恪守协议。三月九日，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肖克同志为此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我军二十七日占领建平虽在一月十三日之后，但是在国民党军继续不停之进攻，更直接危及承德的严重情况下占领的，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自卫。现下如国民党军和平泉方面停止进攻，我自可以退出建平，但国民党军在一月十三日后所强占之土地亦应完全退出。”当我军撤出建平后，国民党立即派县长徐某去建平，企图独占建平。在徐某走马上任途中，遭到当地群众的强烈反对，使徐某不得不折回叶柏寿。于是，国民党代表指责我尚未撤军。三月十三日，我又接到转来的国民党军联络组主任王廷宜的电报，内称：“顷奉杜聿明将军电示，建平附近尚有共军二千人。”事实并非如此，这时我保安队已全部撤出。此时

恰逢美方代表易人，三月十八日，裴思理海军上校来到赤峰。为了澄清事实真相，执行小组赴建平视察，证实停战前国共双方均未进驻建平。三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时，执行小组开会，美方和国民党代表不得不承认：“一月十二日至二十八日，建平村民自行管理村政，该村并无国共双方之驻军。”几个回合的交锋使我更加看清了美蒋勾结的真正面目。

停战令公布后，国民党军违令行为屡有发生。为制止国民党军的进攻，执行小组经常到出事地点视察，以便依据事实作出准确的判断。停战令颁发后，国民党军杜聿明部秉承上峰旨意侵犯热河，随后由天义出发，大举西犯，其先头部队已进至宁城附近。二月中旬，执行小组去宁城以南一带视察。当我们乘坐的汽车走到甸子时，遇当地群众报告，在甸子南二、三华里处的马架子曾发生战斗。我当即提出，执行小组应去该地视察。可是，美方说汽油不够。美方这样做的目的很清楚，就是避开到国民党军有违令行为的地方去，既可以不使他们当场出丑，又不让我们抓到把柄。于是，我就严正地向他们指出，你们不敢去就是等于默认了国民党军在马架子有违令行为的事实。

回到赤峰后，美方在拟写执行小组报文时，又大耍花招，对国民党违令行为轻描淡写，对我军的情况不厌其繁，以此来转移目标，为国民党军开脱违令罪责。按理，这次去宁城视察，是执行小组来赤峰后第一次调查冲突事件，小组报告应把中心放在报告冲突事实真相和解决办法上，但美方却大写途中见闻，以此来混淆视听。对此，我在小组内据理批驳。

位于叶（柏寿）赤（峰）线上的莫里河、古山子等地，是国民党军在停战令公布后侵占的。为了证实确有此事，在我们的提

议下，美方和国民党代表勉强同意去该地视察。到莫里河、古山子以后，我们不仅看到有国民党驻军，还看到了大量工事。根据以往的经验，我怕他们以后赖账，就当场将工事指给他们看。可是回到赤峰后，我在小组会议上，郑重指出国民党军以铁轨铺筑碉堡，这是破坏交通，大搞战争准备，违反停战协议的行为时，美方代表虽神色有些紧张，但却回避说：“我没注意。”对美方的这种诡辩，我们一方面据理驳斥，一方面提出备忘录，使之处于被动地位。

在承德地区，由于国民党军肆意违令，平泉、凌源地区的军事冲突不断发生。为制止国民党军的违令行为，二月中旬，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肖克同志冒着塞外风寒赴平泉附近，与国民党十三军军长石觉会谈。二月下旬，双方举行的下坝会议由于国民党方面缺乏诚意而无结果。会后国民党军以二万之众进攻二道河子、红山咀子、松树台等地，袭击我黄土梁子阵地。承德执行小组视察平泉归来时，承德各界代表在机场向执行小组提出要求，必须立即停止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但是，国民党方面对人民的要求不予理会，驻平泉国民党军又于二月底分两路出袭大榆树、大石桥，会攻小寺沟车站。为了掩盖这些违令事实真相，他们捏造所谓“共军围攻平泉事件”，企图把责任推到我军头上。以后，国民党军的挑衅行为还是不断发生。

七月间，我接替陈伯钧同志任承德执行小组中共代表。这时正处于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的前夕，国民党的违令事件有增无减。为了争取和平，七月二十一日，朝阳执行小组的我方代表李逸民上校来到承德，带来了关于召开热河长官会议的建议。对于这个建议，美方和国民党代表虽然表面上表示同意，但骨子里是

反对的。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阻碍这次会议的召开。尤其令人气愤的是，八月十五日，美方和国民党代表在有关会议事宜尚未商定的情况下，决定于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在二道河子开长官会议。我当即提出，此事未经我方同意，我方不会参加会议，也不负任何责任。会议地点按理应选在中心小组所在地或国共双方之间的中立地带。可是，美方和国民党代表坚持选在二道河子。这个地方距平泉四十里，与我军控制的颜仗子只隔一条小河，是国民党军占领区，街上有国民党军便衣人员手持冲锋枪、驳壳枪乱窜。美方代表却说：“这是中立地带的常见现象。”为了促成长官会议如期召开，我们对此做了让步，同意将二道河子作为会议地点。

召开会议的时间，美方和国民党代表也百般刁难。在八月十七日的小组会上，他们提出将会议时间定于十九日上午十时。我们考虑由于路途遥远，缺乏交通工具，加之道路被水冲毁，有一百七十里不能通车，难以准时赴会，建议是否将会议时间定于二十一日上午。但是，美方和国民党代表坚持不让。后来，我方又提出改为十九日下午六时到达，他们也不同意。对于美方和国民党代表这种毫不顾及我方困难，缺乏调处精神的蛮横态度，我们十分愤慨。尽管如此，为了表示我方的和平诚意，我们又一次作了让步。

在参加会议的人员问题上，美方和国民党代表更是大耍花招。八月十六日晚，国民党代表在执行小组会议上要求我方肖克司令员出席会议，不承认李运昌同志为热河最高指挥官。我当即指出，肖克是察晋冀军区副司令员，不能作为我方热河最高指挥官出席会议，而李运昌是此地最高指挥官。后经双方协商和北京军调执

行部确定，国民党军由十三军军长石觉，我方由李运昌出席会议。十八日早晨，美方和国民党代表为了阻止会议召开，又在出席会议人员问题上演出了一场滑稽戏。他们故作姿态，将会场布置起来，架起了电话线和电台，又准备了饭食，似乎即将开会。到了晚上，在执行小组联席会议上，国民党代表突然提出，国民党十三军军长石觉将军因病不能出席会议，派舒云副军长参加。我当即声明：中共为了和平，在此次会议的地点、时间上均作了极大让步，如果此问题不能解决，中共方面不考虑任何问题。可是，第二天，国民党和美方代表仍不顾我方的反对，单方去二道河子开会。

这次长官会议由于美方和国民党代表的阻挠而流产。为了澄清事实真相，我除及时地向北平军调执行部的我方代表叶剑英同志作了详细报告外，并于八月二十一日提出十七号《备忘录》，指出：出席此次会议的我方之高级指挥官李运昌将军曾两次亲赴最前线等候开会，费时七日，跋涉六、七百里，足证明我方之诚意。不料十八日晚贵代表竟然提出石觉将军因病不能出席，另派舒副军长代表参加，我军已严词拒绝。称病不参加会议的石觉将军，次日能参加跳舞晚会，岂非怪事。由此足以证明政府方面毫无诚意，而指挥官会议之破裂，应由政府方面完全负责。

长官会议的流产，不是偶然的。由于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作好了进攻解放区的准备，已开始向热河解放区大举进攻。八月二十八日占领承德。因此，执行小组已无力执行调处任务，于八月二十七日撤出承德。这时，热河大地炮声隆隆，战火纷飞。于是，这场谈判桌上的交锋转到战场上去最后见分晓了。有感于此，我当时曾赋诗一首，以抒怀言志。

取掉三环披戎装^①，
却开对吵动刀枪，
别论飞机车吉普，
跨上骏马上战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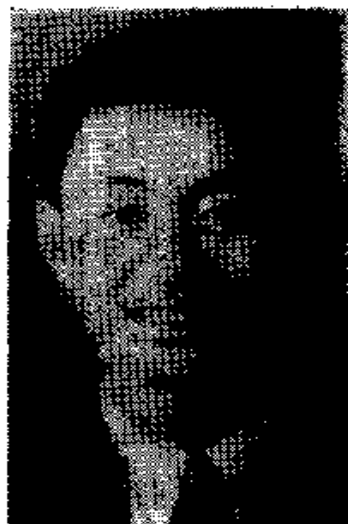
^①“三环”是军调执行部人员佩带的徽章。

廣州兄弟圖書公司始末

李梅甫

在桂東和粵北

一九四四年夏天，桂柳疏散。周恩來同志指示：“生活、讀書、新知三家書店從水路向桂東撤。撤，就是要大家去撒革命文化的火種”。因“讀書”的人員少，就全撤到重慶去了，其書籍財產由“新知”代管。生活、新知兩家書店派遣一部分人員從水陸撤到桂東的昭平、平樂、賀縣（即八步）一帶。我是新知書店工作人員，隨隊來到桂東，在賀縣兩家協議合辦的八步兄弟圖書公司工作。這時已是國民黨三次反共高潮過後，三家書店在全國各地的分店全被查封。因此，在八步合辦的書店不得不改名。取名兄弟圖書公司，其意一是三家書店都是黨領導下的戰友，二是三家書店是遭國民黨迫害的患難兄弟。稍後，我們又在連縣辦了兄弟圖書公司。因連縣地方較大，是粵北重鎮，連



曹健飛同志於解放戰爭時期在廣州兄弟圖書公司留影

县有广州女师和五、六所中学，中山大学也撤到那里，这样书店业务有发展的余地。另外，从当时的形势看，万一战局恶化，桂东陷于敌手，我们可以迅速撤到东江纵队、北江支队控制的游击区。

八步和连县的兄弟图书公司除发行进步书刊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是发行《广西日报》昭平版。昭平版是地下党通过统战关系，由张锡昌同志（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是新知书店顾问）出面组织广西国民党左派人士陈劭先、进步民主人士欧阳予倩、千家驹、莫迺群等创办的，各业务部门由“生活”、“新知”和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人员分管。昭平版发行近三千份，这在当时影响是很大的。

到 广 州 去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了。国民党广西官办的《广西日报》桂林版复刊，迫令昭平版合并于桂林版中。昭平版被迫于当年九月三十日停刊。“生活”、“新知”和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人员分别撤回原单位。

与此同时，从沦陷区离乡背井流亡到后方的人们也纷纷返回家乡。在新形势下，八步和连县“兄弟”两店也有必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以便联系更多的读者，扩大和宣传党的影响。于是，两店分别停业，其人员先后会合于刚刚光复后的广州，创办了规模更大的广州兄弟图书公司，门市部在热闹繁华的惠爱东路三二八号之一。我们是书业界在光复的广州最早打出图书公司招牌的，而且公司的招牌是通过地下党员左洪涛同志利用做张发奎

秘书的身份请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委员陈策题写的，显得很硬气，国民党一时不至于来找麻烦。

当初八步和连县“兄弟”只有“生活”、“新知”两家的人员参加，“读书”只提供货源，未派干部。这时原桂林“读书”人员唐棠同志也从后方回到广州，作为“读书”的代表参加广州兄弟图书公司的工作。这样，三联书店便初具雏型了。

到广州后，我们都一改在农村工作时的穿着和习惯，每个男同志都换上了一套临时从估衣摊买来的旧西装，穿上皮鞋，以应付这里特务如麻的政治环境。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广州兄弟图书公司在爆竹声中正式开业，同读者见面了。同业开明、世界、光明书店都来祝贺送礼。开业后才收到黄洛峰代表三联书店总处的来信，嘱广州店名以“越秀”为好，因“兄弟”已在国民党那里挂了号。但这时“兄弟”招牌已挂出，无法改了。

刚开业时，出售的书刊基本上是抗战时桂渝版读物。但这局面很快就改变了。上海、香港、北平、广州、重庆大量出版的新书源源而来。“兄弟”经售的全国新杂志有：粤版的《自由世界》、《文艺生活》等二十六种，渝版的《中华论坛》、《民主教育》、《中苏文化》等二十六种，沪版《苏联文艺》、《新纪元》等一百二十六种。最引起读者注意的书是上海、香港翻印的解放区读物，如《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白毛女》、《李有才板话》等，其中以黄炎培的《从延安归来》、《悼念黑茶山四烈士》最为吸引读者，供不应求。

这种情况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特务们天天来，跨进门槛

就混在读者中间，拿起一本最进步最革命的书或杂志做样子，眼睛却乱转，以确定跟踪盯梢的目标。

“兄弟”的任务很明确，就是宣传革命思想，宣传党的主张，对于带知识性的科学性的书刊、开明的政治书刊，我们也经售。国民党当局曾强迫我们代售反动书刊。我们收下后说明月底结帐，按实际售出付款。我们把这些书刊放在书架最不显眼的地方，过两天就收起来，月底告诉他们卖不出去，如数退还。两、三个回合以后，他们自知无法遂其意，便不再来寄售书刊了。对托派的出版物我们也照此办理。

我们除了从事出版发行工作之外，还力所能及地尽可能帮文化界进步人士做一些工作，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广州“兄弟”位于南中国交通要冲，也就成了文化界人士南北东西的中转站。陈此生先生夫妇由广西北返上海，梁漱溟先生从广西经广州飞重庆参加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我们都招待他们在“兄弟”留宿，帮他们买船票、飞机票，为他们送行。他们到广州时，广州自来水系统遭到日敌破坏，只有电灯，没有自来水。我们天天提了吊桶到广州“兄弟”对面的小胡同打井水，给他们用。

进步作家黄药眠、高士其也居住在“兄弟”的三楼，从事著作约有半年。士其同志是一位热爱党、热爱同志的党员作家。我们两次为他招聘女秘书，要同时能兼顾护理和秘书两项任务的。

逆 境

一九四五年十月，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翌年一月十日，国共双方发布《中共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关于停止国内冲

突的命令和声明》，政治协商会议亦于同日召开。会议刚刚开过，协议墨迹未干，二月十日，重庆发生较场口血案，国民党特务打伤政协代表郭沫若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的大会主席团主席李公朴、马寅初等人。二月二十一日国民党特务组织反苏游行，捣毁重庆《新华日报》营业处，打伤职员多人。三月一日，西安《秦风工商日报》被特务组织反苏游行时捣毁……

这股法西斯恶浪也冲击着广州文化界。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郑彦棻突然抵达广州，大谈其加强法西斯活动的所谓“革新运动”。广东CC派主要人物高信上任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主任委员时，也以展开广东的“革新运动”为号召。广东三青团召开了两次省市代表大会，也提出要“加强学校工作”，强化学校的特务活动。中山大学、文理学院各校特务分子破坏民主运动，日益猖獗。

二月十三日，戴有广州市政府职员证章、自称饶某的人带了一名便衣特务和一名警察，闯入“兄弟”门市部，出示广州社会局局长袁晴晖手令，说《自由世界》、《文艺新闻》、《新世纪》、《学习知识》四种期刊不合出版手续，内容荒谬，应予禁售，并声称要没收。我们据理力争，最后饶某说，期刊可以不没收，但今后应禁止发行。

三月三十日，广州市国民党警察局向所属分局下达保字第一一六五号密令。这密令的内容有两点：一、查禁书刊。称“近来各书局经售之书刊如自由世界、文艺新闻、新世纪、学习知识、愿望、民主生活、大千画报、文猎、国民、现代生活、文艺生活等杂志，皆共党所办之宣传书刊，有攻击政府煽动青年之不良文字。在省会地方，已由党工干部会报特种宣传小组，在不抵触取

消新闻检查和言论出版自由之原则下，以消极或积极之种种方法，破坏其推销发展。希所属仰体斯旨，善用环境，对上列各杂志书刊，会同当地党政机关予以有效查禁”。二、发调查表，侦查广州各书店发售什么书刊，为查封进步书店作准备。

同时，特务对香港《华商报》、《正报》广州分社，广州兄弟图书公司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如在这些报社和公司门市部撒大粪，放毒蛇和黄蜂，使读者不敢到分社和公司看书报；还组织一批小孩专门偷“兄弟”和《华商报》、《正报》的书刊。

两个学联

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引起了有文化有觉悟的广大爱国学生的不满。“四月二十一日由爱国学生自动组成的广州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民主学联)在平山堂举行大会，决定于‘五四’这个革命爱国的传统节日举行成立大会”，以抵制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广州反动当局得悉这消息，甚为恐慌，苦思对策，“四月二十八日在三青团会议上，广州市党部主任委员CC头目高信授意中山大学特务学生云昌海提出所谓以行动对行动，以组织对组织的方案。”广东省党部迫令各校组织由特务学生操纵的新学联合会，取缔民主学联。新学联合会组织反苏反共游行，并打着学生群众的旗号去干国民党特务想干的事，比如捣毁进步书店和报社等。

形势一天天紧张。五月初，张发奎的秘书左洪涛、何家槐（均地下党员）秘密通知我们，国民党特务要在五月四日这天捣毁“兄弟”，要我们做好防范。我们请示地下党负责人张铁生同志：“兄弟”是否转移？或以纪念五四为名放假一天。铁生同志

指示：让他们打，这样在政治上可以教育广大群众，揭露国民党的真面目。经理曹健飞同志在店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向大家说明情况。我们听了很震动，很气愤。出售和平民主书刊，何罪之有！同志们同仇敌忾，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反击敌人的迫害。大家商定采取紧急措施，当夜即疏散大批书刊到河南书库，把库存的法币赶紧兑换港币，出事时便于携带。还决定五四那天，除必要的部门留人外，全店同志都集中于门市部，加强防卫。由身强力壮的曹健飞、吴仲、沈慧，把守铁闸门，预防突然袭击；同时派文之冈在路南（“兄弟”门市在路北）骑楼观察，如发现暴徒来捣乱，立即打电话报警，如果警察不来，更可证明这次行动是政府当局策划的。我们还准备了九个警笛，发现紧急情况立即鸣笛，引起市民注意，用事实教育市民。

事情果然和我们得到的情报一样，国民党当局五月三日便开始布置第二天的行动。五月三日下午二时，文理学院学生自治会干事会一致通过决定，号召全体同学参加五月四日下午在平山堂举行的纪念五四与庆祝市学联成立大会。但是，当天下午四时，学院院长突然出了一张紧急布告，说奉教育厅令，要学生一律参加五月四日早上在中山纪念堂召开的五四爱国运动大会，不准参加平山堂举行的大会。其他学校也多是这种情况。

五月四日上午九时，国民党当局强迫广州大学、执信、华南、中正、光华医学院等三十七所学校的学生两万三千五百人在中山纪念堂举行所谓纪念五四爱国运动大会。大会主席云昌海在大会上讲话，说什么“东北、华中甚至广州都布满了第三国际走狗……”，接着宣布民主学联为不合法组织。中统头头、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也捏造事实，极力煽动学生反苏反共。在特务导

演下，大会临时动议向蒋介石发致敬电，还有恶毒咒骂我党的致共产党书等。

大会于十时五十分散会后，特务们便组织全体学生进行反苏反共巡行。队伍从纪念堂出发，经吉祥、越华、汉民北、惠爱东等路。十一时十五分，不少关心“兄弟”的读者从汉民北路跑来向我们报信：“来了！来了！”原来，在捣毁《华商报》、《正报》分社的同时，三、四十个穿便衣的警察和特务，穿过汉民公园向“兄弟”门市部直扑而来。另有四个特务坐着吉普车到“兄弟”门前停车。守卫店门的同志们立即拦住想冲进来的特务，并随手把铁闸门拉上。这时特务们掏出了带来的铁锤、铁棍、木棒，隔着铁栅，向守卫在那里的“兄弟”工作人员飞舞。被锤得颤动的铁栅，把天花板上的玻璃灯罩震落下来。“兄弟”人员拼命吹响警哨，但五十步外的警察却置若罔闻。特务们搬起大块的石头掷过来，抬着梯子、门板向铁闸门撞击。十多分钟，铁闸门脱下一角，打手们便硬生生地把铁条扳下，一拥而入，于是暴徒的嚎叫声、木器破裂声、纸张撕碎声响成一片。几百册书从铁闸门缝隙里抛了出来。楼上也有几百本书被抛了下来。打手们，童子军和特务们接过书来，撕碎了向天空抛撒，再把印得精致的封面书页践踏在脚下。打手大部分是三青团广东支团部的组员和杂差，事实上动手的只有十几个人。学生们停留在马路上，有时不得不跟着童子军教员喊几声，他们是被强迫来的，他们内心却为这毁灭文化、毁灭人性的疯狂暴行而难过。捣毁书店后的十分钟，国民党中委、三青团广东支团部干事长、广州警察局长李国俊居然文雅地穿着西装（平时穿军服或警服），满面春风地到现场巡视，新任广东新闻记者公会理事长、前军委会新闻检查员余铭新，及几

位省党部的老爷也来了。

特务施暴的结果，广州“兄弟”被捣毁，公司职员曹健飞、吴仲、华昌泗、沈汇、文之冈被打伤，其中华昌泗重伤。楼上楼下存书现款设备均被捣毁洗劫殆尽，损失在三千余万元以上，比《华商报》、《正报》的损失更为惨重。

我当时负责出纳工作，清理现场，清点损失时，看到存放现金的抽屉被撬，现金被洗劫一光，收支发票被撕。出乎意料之外，抽屉里独存一张旧《大公报》，那里面夹着三张港币——两张五百元，一张五十元，共一千零五十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相当书店半个月的门市收入。我庆幸之余，立即向在场的同伴和经理报告。

数十包书被特务们抢走后，立即就在文德路一带被摆成长蛇阵发售，以饱其私囊。

坚持斗争

“兄弟”被砸之后，华昌泗、文之冈和我请了照相馆的师傅来拍照现场，一个穿便衣的特务立即前来警告照相师，照相师被吓得连忙收起相机的四脚支架，搬起相机走了。照相馆不敢照，我们自己照。我们借了国民党第二方面军演剧队的照像机。特务们在阴暗的角落里监视着我们。

尽管财物书籍损失惨重，门市部被打得七零八落，许多同志被打伤，然而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在读者的支持下，我们包扎好伤口又坚强地站起来了。就在当天晚上，书店开了一个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决定第二天立即营业。经过彻夜的紧张整理，“兄

弟”就在被打的第二天——五月五日照常开门营业，向国民党反动派示威！抗议！这一天来“兄弟”买书看书的读者人山人海，营业额突破二十万元，超过“兄弟”开张以来的任何一天。为了向全国人民说明事件真相，揭露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破坏民主自由的本质，五月五日，我们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门市部，并于五月二十四日在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广州兄弟图书公司的《重要启事》。两者的基本内容是：

一、说明五四暴行经过，“兄弟”人员被殴打受伤情况和财产、书刊所受损失之数目。质问在军委会委员长行营及广东省政府所在地，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发生此非法事件，广东治安当局坐视不管，凶手谁属？

二、我们是纯民营书业企业，要求国民党政府保护正当的商业权益，对此次事件彻底查究，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三、感谢社会各界人士之爱护与关切，本公司不管环境多么险恶，决心一本国民忠诚，只要有一线机会，一定坚持继续为文化事业服务。

五四暴行之后，国民党特务一方面通过中央社对我们造谣诬蔑，同时还在兄弟图书公司周围监视我们的行动，跟踪盯梢。特务们还放出风声：“兄弟”被打，损失惨重，能立即复兴，定有后台，是共产党书店无疑。对这些威胁和恐吓，我们早已司空见惯，吓不倒我们。

在与特务暴徒斗争的日子里，我们和《华商报》、《正报》的同志们并肩战斗，配合得也很好。

解放后，党组织公开，我们才知道“兄弟”的经理曹健飞、

副经理吴仲、会计董顺华（我们当时称她为董大姐）三位是地下党员。他们确实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五四那天特务打来时，两位共产党员经理站在第一线，和同伴们一起把守大门。至于董顺华，韬奋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到：“董顺华同事亦本店忠诚同事之一。”虽然我们当时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但从八步、连县办书店起曹健飞就是经理，他很得大家拥护，在斗争中大家千方百计地保护他。五月五日，特务搜劫大批“兄弟”书刊，并要求经理亲自到保安司令部去取被没收的书刊收条。谁都明白，敌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经理到保安司令部可能就回不来了。于是，文之冈同志说：“我们的经理外出不在家，我同你们去取收条。”之冈同志当即把衣服口袋里的东西全掏给董顺华。董顺华怕不安全，请朱明陪同之冈一道去。原来特务所谓开收条是个圈套，原本是要抓“兄弟”的经理，见来的是书店两名小伙计，甚为恼怒。于是从楼上跑下来一个特务头目，又是咒骂，又是拳打脚踢，把文、朱两同志打出了保安司令部。又一次，几个特务突然登门，说有事要见曹经理一面。在场的谢国贤、董顺华、文之冈等同志见来者不善，异口同声地说：曹经理到梧州收账去了，不在家。特务要抓人，扑了空。后来广东省保安司令、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十三太保之一的王珍吾扬言：抓到曹健飞可立即枪决。人们都深为健飞同志的安全担忧。在地下党的帮助下，他乘坐小木船离开广州，安全到达香港。

“兄弟”于五月四日被捣毁后，领导上已预料到我们将面临最坏的后果——被查封，告诉我们要有所思想准备，并采取了相应措施。例如，虽然“兄弟”被打，经济损失很大，但我们决不能把损失转嫁到读者和同业身上，必须信守商业道德。我们清理了

同业的帐目，清理了邮购帐目，尽量满足读者要求，能寄书的寄书，无书可寄的退还书款，并一一作了答复。许多读者来信表扬和感谢我们。

社会各界的反应

《华商报》、《正报》和兄弟图书公司被洗劫一事震动了羊城和港澳各界人士，许多人打电报或来函表示慰问，如中国民主同盟港九支部、蔡廷锴将军、全国文联港粤分会、孙中山先生当年的侍卫长都相继发表声明或向报社发专函，表示对国民党这一暴行的愤慨和抗议。

前面已经说过，“兄弟”被打后，许多热心的读者来买书。他们看到包扎着头部的华昌泗，纷纷走上前来同他紧紧握手。有的人买定价一元的书，却硬要付五元，不让找钱；有的读者把暴徒扔在马路上的残破书刊一本一本地检拾起来交还书店，并要求按原定价卖给他们，同情与支持之意是很清楚的。更值得一提的是，兄弟图书公司被抢去的书有一小部分给义愤的读者抢了回来，当晚（五月四日）便送回书店。这一切都使我们深为感动。

“兄弟”从开业起，就注意在书业界做好统战工作，团结同业，引导他们认清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因此，“兄弟”被打后，没有任何一家私人书店出来支持国民党的反动暴行。相反，五四暴行发生后，广州书业界十分愤慨，有一个大书店拟发动全市七大书店罢市一天，以示抗议，最后有五大书店公开表示罢市，支持“兄弟”的斗争。

查 封

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进攻的激烈展开，他们对新闻界、书业界的摧残日益加紧，以图掩人耳目。六月五日，距五四暴行之后一个月，广州书店、书摊多家又遭到更大规模之摧残，计遭害者有广州兄弟图书公司、广州书报供应社、《华商报》、《正报》分社、正大、国华、光明等书店及一些小本经营的书摊。其中光明、国华一向以温和面目出现，也不幸遭劫。

他们分为多组，每组由穿黑胶绸便衣、西装、中山装或穿军服而不带军帽诸色人等组成。他们携带武器，还带有警察和人力货车和苦力等。每到一地，既不说明身份，也不说明理由，就一面把守门户，一面动手将书店的书抛入货车，扬长而去。不但将所谓“思想偏激，诽谤党国”的书刊查禁没收，而且将纯文艺书刊、古籍《诗经集注》，广西省政府出版的《广西建设》，甚至连孙中山先生原著《三民主义》也列为禁书，一概没收。正如上海大公报所揭露的“这是搜查者取一扫光政策，其意必欲从经济上彻底打击彼等也”。不仅如此，他们终于对书业界采取了更严厉更彻底更野蛮的措施。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拥有广大群众的十三家文化机关被广州警察局钉封了，包括三家报社——香港《华商报》广州分社、《正报》广州营业处和在当地出版的第三党机关报《人民报》……

六月二十九日，对于“兄弟”的同志们来说，是个难以遗忘的日子，兄弟图书公司被正式钉封了。钉封手令规定，书籍、财产、家具、器材、设备均属没收之列，只有私人行李可以带走。于

是，昌泗、之冈两同志买了十多条行李袋，把书刊当行李放在行李袋中携带出来。其它财产全被没收。华昌泗、文之冈两同志最终被强迫离开了兄弟图书公司楼房——惠爱东路三二八号之一。偌大的广州，能住上几百万人，但却竟然没有他们两人容身之地，投宿无门，借住在同业处，怕连累别人；住旅店，又怕宪兵特务搜查。后来，承蒙一位热心的读者掩护和帮助，才得以在河南一所中学寄宿一夜，第二天紧急乘坐轮船前往香港。

被查封前，三联书店的黄洛峰同志就已代表总处下达善后指示：“兄弟被封后，其工作人员留职停薪，等待安排工作。目前，可暂时隐蔽到国民党财经部门工作。”据此江浙籍同志先北返上海，有的去台湾，有的去香港。广东籍同志，有的隐蔽在广州私人书店。我因发现有人跟踪，不宜停留广州，后经地下党员张锡昌同志介绍，返回广西宾阳文化服务社和桂林文化供应社（韬奋与广西进步人士合资经营）工作。原广州兄弟人员虽暂时分散在全国各地，但我们为党的出版发行事业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丝毫没有动摇。后来这些同志都先后回到各自的原单位，继续坚持出版发行工作，直到全国解放。

浙江第一儿童 保育院概述

许为通 · 严金明

儿童保育会的成立



李家应像

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后，陷我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是战区和接近战区的劳动人民，直接遭受日寇的轰炸与烧杀，又无法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只好设法将自己幼小的子女送到后方去抚养；有的抗日军人，政工队员，子女无人教养；还有一些孩子，因家庭失散或父母牺牲，成了孤儿。因此，战时儿童的收容教养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儿童保育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

浙江儿童保育会的全称是：中国妇女慰劳前方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浙江分会。儿童保育会总会成立在抗战第二年——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当时全国政治中心的武汉。多数省份，包括陕甘宁边区，随即设立分会。浙江分会便在当时浙江政治中心的金华成立了。分会具体执行领导工作的是理事会，由当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夫人蔡凤珍为理事长，财政厅厅长黄祖培的夫

入黎沛华为副理事长，具体负责分会各项日常工作。理事有李家应、肖银、程为昭、戚铮音、李清华、贵婉兰等，兼任保育、会计、文书、事务等股。另设秘书一人，联系各股具体工作。以上所有人员全是妇女。正副理事长都是官太太，而做具体工作的，策动这工作的是地下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这体现着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一儿童保育院

随着战火的蔓延，战区难童增多，急待抢救。浙江分会决定：大力组织人员，赴前方抢救。首批难童约百人，送到丽水县碧湖镇，成立浙江第一战时儿童保育院。由彭惠秀主持教养事宜。一九三八年九月，彭惠秀辞职，分会推选李家应为第一保育院院长。李家应是黄绍竑的省政府秘书长李立民的女儿，大学刚毕业，没有工作过。另由理事戚铮音推荐、理事会聘请地下党员严金明为副院长，协助工作。最初李家应不肯接受，戚铮音竭力鼓励，说她参观过贫儿院，那里以崭新的教育培养“民族幼苗”，很有生气；她可以介绍贫儿院实际负责的严金明来保育院，协助李家应的工作。李家应这才放心接受了院长职务。

第一保育院开办初期，儿童不多，除碧湖天后宫旧屋外，租用一家梨园内的土地盖了些茅屋。后来一批批难童由保育会收容后转送来，共达八百余名。又添造了一座山字形瓦顶平房做教室和办公室。

保育院的组织：院长以下设总务、教导、保育三股。总务下面又分会计、文书、事务三组。其中事务组的工作范围很广泛，

包括采购、仓管、膳管、院具、建筑修缮、服御、水电等等，除教育、医务外，几乎包括一切。教导包括教务、训导，掌管知识、生产、体育、德性方面的教育。保育股专管生活、医疗、卫生工作。

参加保育院工作的教职员，初期全是一批救亡青年。当时流行这样的话：“救亡以外无工作，吃饭以外无要求。”大家都满腔热情，忘我工作。无论院长、教员，还是炊事、勤杂人员，月薪一律十元（供膳，和儿童一起吃）。只有医师一人五十元，理发员一人十四元，算是例外。这待遇比小学教员低得多，可是任务之繁重远远超过小学教师。这些儿童不象小学生那样可以放学回家，保育院的教师白天和儿童同起同作同食同息，晚上还得给儿童查铺盖被。是老师，亦是父母。没有高度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做不好这工作，经不起这艰苦考验的。

新型的教育方针

保育院很早就有地下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其教育方式方法，在国民党统治区是独树一帜的。

保育院的教育目的，是要把儿童培养成为能认识真理，有文化知识，有劳动习惯，有优良品质，有反抗精神的新儿童。反对假公济私，损人利己，恃强凌弱。这种教育为他们以后投入革命，投入社会劳动做了很好的准备。这些儿童长大以后，很多都走上革命道路。

分班采取中队编制。编队标准根据儿童年龄、文化水平、智力水平来决定。小孩子四、五岁，大孩子十六、七岁；文化程度有的已达高小，有的十来岁还是文盲。一些已达中学年龄而从小失学的孩子，比较难管教，另编一个中队，以便于其他中队的教

学。这个中队的任务特别重，由地下党员胡汉娥担任教养员。

教学内容和时间分配，基本上是：上午上文化课，下午参加适当劳动（多数是参加农业劳动）。师生共同开垦的荒地，计有青田岗、中央洲、沙溪、菜圃，共四大片，种植面积一百五十余亩；另外还有畜牧场，饲养猪、牛、羊、鸡、鸭等，不时拿来改善师生的生活。儿童认识到劳动和自己生活的关系，劳动热情非常高涨。除农业外，其他劳动还有织席、制鞋、洗染、缝纫、织袜、做豆腐等，为孩子们日后就业创造条件。少数女生到医务室学医，当小护士。个别学理发。有些儿童学业成绩比较好的，送他们考外面中学公费生。升学费用除公费部分外，一切由保育院负担。寒暑假仍回保育院这个“家”来。

对儿童的思想教育，我们和旧学校不同，运用以下几种办法，收效很大：

(1) 生活检讨会。每星期六晚上召开，以中队为单位，就一星期来所发现的问题，在会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多数儿童不讲情面，对问题单刀直入，干脆痛快。这对维护纪律制度，扭转强凌弱、大欺小等不良倾向，及揭发说谎欺骗等，效果显著。生活检讨会，亦培养了儿童的斗争性，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不怕强暴，不怕困难，敢于反抗。

(2) 组织故事会。不以中队为限。补充精神食粮，起潜移默化的作用。

(3) 介绍进步书刊，个别指导课外阅读。针对各人的兴趣与接受能力，一步步地介绍阅读故事、小说、战地通讯以及浅近的政治读物，有意识地培养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这对他们将来的思想倾向影响很大。

(4) 组织地下少先队。在思想认识最好的少年儿童中发展地下少先队员，使他们起先锋作用。孙明标、张担华等都是少先队员。后来党领导的青年组织“民先”解散，地下少先队亦随之解散。虽然解散，队员们有时仍配合地下党员做些贴传单之类的秘密工作。

《儿童报》、儿童剧团

保育院不是光关门办学。在地下党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创办了直接影响社会的《儿童报》与儿童剧团。

一九三九年五月，第一保育院成立一周年时，《儿童报》创刊了。三日刊，八开大小的四版，铅印；主要给保育院儿童阅读，亦向省内外发行。战时交通不便，这给报纸的销行带来一定的困难。稿件来源亦少，编者要改写新闻、写评论，还有例行的改稿、编排、校对，都是教课以外的额外工作。外界名作家邵荃麟、仇重、杭苇，都曾为《儿童报》写过稿。创刊初期，编辑由教师许为通兼任，后来张友鉴、陆明、何为及抗战胜利后在宁波编《孩子们》半月刊的陈冠周，都曾专任过《儿童报》编辑。

《儿童报》的“小园地”副刊专登儿童作品，多数是保育院儿童所作。后曾选印成书，作为“儿童报丛书”之一。

保育院成立不久，儿童剧团随即诞生。经常于碧湖镇及附近的石牛、高溪、保定、周巷、周村等农村，以及大港头为兵工厂的工人演出。还曾去过丽水、永康、金华一带售票公演，票价缴作寒衣捐。

儿童剧团实际上是师生共同组织的，剧目亦以师生合演的居

多。教师演成人，儿童演小孩。如《最后一课》，故事发生在一间教室内，就全由第一中队的师生来演。台上台下都是师生关系。《小英雄》中的母亲，由小英雄吴新华的母亲叶庭筠来扮演。台上台下都是母子关系。这使观众倍感亲切逼真。有一部分剧目都是成人角色，完全由教师扮演，如《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以及汪精卫叛逃后，举国面临投降危机时的活报剧，就全部由教师上台了。教师差不多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但亦有年满四十岁的叶庭筠。她亦和年青人一样热情，经常演到深更半夜，跑夜路回来。

保育院后期迁至云和、平阳，除话剧外，还演出延安作品，冼星海作曲的歌剧《农村曲》、《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等。在音乐方面，经过几个对音乐有素养的老师（包括后来牺牲在台湾的台南市委书记王冠民烈士）先后努力，保育院的音乐有相当水平了，伴奏乐队亦是师生共同参加的。战时有的乐器买不到，如大胡之类，就因陋就简自己制造。

地下党的斗争

保育院创办初期，就有地下党组织。由于反动势力嚣张，尤其是几次全国反共高潮时，一些同志被迫撤离，党员的流动性较大。但是明去暗来，加以革命青年在成长，党的队伍有增无减。

最初，党员只有严金明、白天、蒋家运、王金美四人。不久，白、蒋离去。逐渐发展了李树华、盛杰山、胡汉娥、乐加里。当时上级组织给严金明个人在保育院的主要任务是搞好上层关系——李家应这棵“大树”。当然，争取搞好关系的基本方法是努

力做好本职工作，使保育院对外拿得出成绩来。其次是搞好对李家应的私人关系，包括她的同学、好友叶庭筠、孙多慈等。碧湖是战时反动派党政机关林立的地方，那些老爷们以及他们豢养的特务嗅觉很灵，他们认为保育院教职工的工作繁重，工资很低，怎么这样积极愉快地工作？——“肯定有问题！”工作最积极的被怀疑为共产党，提不出证据，就示意李家应予以撤换。不撤换就向方岩（当时省政府所在地）的特务机关汇报，对李家应施加压力。目标首先是严金明。省府秘书长李立民获悉方岩 CC 头子方青儒的黑名单中有严金明，为了关心女儿，两次打长途电话给他女儿李家应。李家应因为严金明是她保育院工作的得力助手，一再加以应付解释。李立民骂她“引火烧身还不知道”。几经周折，把严金明降为教导主任，后来又调总务主任，以图缓和压力。

反动派对保育院的进步力量，除威逼排挤外，另一方法是打进来。初期工资低的时候他们是不进来的，后来因物价上涨，一九四〇年从供给制式的一律十元一月改为等级工资，比一般小学略高，一下子打进来四个三青团教师。他们拉拢两个落后教师当大炮，气焰不小。他们以“要正规化”为幌子，全面反对保育院原来的进步教育设施。他们反对半工半读，反对劳动，说是“不符合部颁课程标准”。他们反对儿童剧团，反对生活检讨会，甚至大门外溪边的烧饭木柴，也反对儿童去搬。这一切，实质上是国共两党在基层的斗争。后来他们就公开挑畔争吵，目的要挤走党的力量。这就形成短兵相接的局面。

由于在上述几个教学措施问题上有争论，争吵表面化了，好像空气中弥漫了易燃气体，一根火柴就可以燃为熊熊大火。有一

天，一个三青团教师做班主任的中队里，有个女孩子散布说：保育院的教师有共产党，谁的头可以值几斤煤油，谁的头值得还要多……，还说二中队女同学张担华亦是共产党。这些言论马上在全院较大的同学间传开了。曾经是地下少先队的同学更沉不住气，一场尖锐的斗争就此推向高潮。

一九四〇年七月，有一天课前会议时，教师双方多人面红耳赤地在争吵。反动透顶的三青团卢明望（他离院后，四九年初在东阳被我浙东游击队击毙）特别凶横，儿童们把他和“几斤煤油”联系起来，有个儿童把墨水瓶从窗外向卢明望投去。卢明望便说是“有人指使”，向李家应告盛杰山等五个教师的状。李敷衍几句，没有支持。他们就向联师三青团告状。当天晚上九时左右，联师三青团学生二十余人，手拿柴棍，闯进保育院，口口声声叫盛杰山几人出来。听到这消息，师生员工许多人迎上前去，就在教室到寝室的梨园内对峙着。李家应闻声赶到，痛骂了他们一顿。李说：“你们是些什么人？为什么半夜三更闯到我们保育院来？想干什么？……用不着说，我知道你们是联师学生，我要问问你们徐旭校长，这样的行为，将来配为人师表么？……你们拿柴棍来干什么？叶庭筠，你打电话给楼区长，带警察来……你们不要走！”一顿臭骂，那些三青团学生悻悻地走了。

第二天，李家应找严金明说：“这事情不能再闹下去，只有把双方正面冲突的九个人一起解聘。已经打长途电话请示黄太太（黎沛华），她同意。一边是卢明望、张亚凤、陈惠珍、袁泳仙，一边是盛杰山、胡汉娥、许为通、徐继耀、乐加里。”严金明说：“那边是无事生非制造事端的，只解聘四个，而这边是被迫的，却解聘五个，这样摆不平。”磨了几次嘴皮，亦为《儿童

报》一时无人接手，最后，李家应说：“那么留下一个许为通，两边一样。”

解聘消息宣布以后，卢明望等在学生唾骂下当天就走了。盛杰山、胡汉娥等分别由党组织介绍去皖南新四军和浙西政工队。第二天上船，数百学生和老师自动去船埠头送别。

盛杰山、胡汉娥等离去后，接着地下党员夏风等进入保育院，地下党在保育院依然活跃如常。过了半年，皖南事变后，组织上又介绍张心豪、周明祥等四同志来保育院，人数更多了。这些同志都是组织上交给严金明利用院内院外各种人事关系向李家应推荐的。保育院的地下党员，往往因进步倾向有所表现，就被院外的反动势力逼着李家应把他们赶走。李家应能顶则顶，顶不住时，就告诉本人：“方岩有你的名字。”为了避免损失，张心豪、何为同志等就主动离去。

瓯江边的保育院中央洲农场，有一名守场农工，化名王直，其实他是碧湖区委书记林艺圃，暂时隐蔽在这里的。前任区委书记邱惜光被捕，他继任后，以小贩身份出现在街市和各村。碧湖环境复杂，他感觉已被特务注意，便通过严金明安置在这里。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把国共合作的假面具撕掉了，完全露出本来的狰狞面目，对进步人士和怀疑对象，大肆搜查逮捕。碧湖农民支部支委、保育院职工严金藏家被搜查了两次。其他单位如汽车修配厂、面粉厂，都有职工被搜查，他们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毛主席发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严正声明后，声明全文由丽水浙江印刷厂学徒、地下党员张光炜用头号铅字排印出来。严金藏黑夜带了一个保育院原少先队员去大街小巷张贴，直贴到碧湖区署和保安队的门口。

峥嵘岁月

保育院创办初期，物质生活还比较好。后来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加之附近驻军增加，粮食便发生恐慌。大米要自己去一、二百里外的松阳、遂昌、龙游一带提取。为了减少运费开支，师生自己组成搬运队，在被破坏了的公路上，长途徒步搬运。

碧湖镇是比较偏僻的后方，但是敌机经常来轰炸。空袭警报一来，老师带着儿童去镇外田野山林上课。一九四一年五月有一天，丽水、碧湖、大港头一带遭受敌机狂轰滥炸。保育院医务所被炸毁，一名病童中弹牺牲。这孩子临死前不断的叫喊：“我的腿好冷呀！”她不知道，自己的腿已被弹片炸断。追悼会上，很多师生为之悲愤落泪。

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寇进攻丽水，距碧湖只有四十华里，情况很急。幼儿班和病房药械，先上了两只小船，逆水向云和方向去了。还有师生五百余人，亦须立即撤退。瓯江山洪猛涨，江阔水急，只靠剩下的两只小船，过渡很慢。下午开始摆渡，到晚上八点多钟，还有百余人未渡过去。不料来了一个蒋匪军官，带了士兵，要强抢这两只小船，威迫院童：“下去！下去！”李家应沉着脸，叫院童不要下船。一面骂得军官无话可说。军官恼羞成怒，拔枪恐吓。李家应拍着胸脯说：“开枪吧！我是保育院院长，省政府李秘书长是我爸爸，你们要怎么样？”这军官软了下来，假意说派两个士兵过去报告部队，说找不到船。李家应同意这两个士兵搭渡。船到对岸，这两个士兵露出真面目，不肯上岸，威迫船员林世焕把船开到他们指定的地方去。林世焕不肯，两个

士兵要打他，他连人带箭跳到洪水里。林世焕水性极好，黑暗中安然游上了岸。

第二天东方露白，最后一部分师生亦过渡上了路。这些孩子，除自己衣物外，还按各人不同体力，每人带五至十五斤大米。从碧湖到云和的公路上，沿途只见敌机到处用机枪扫射，疯狂轰炸，杀我手无寸铁的人民。下午五时，在云和河上村开晚饭时，检点人数，除两船幼儿班和病号的船未到外，还少两个十二、三岁的小孩。派几个人正待出发沿途去找，远远看见一个小孩，拖着沉重的脚步走来。大家迎上前去一看，只见他满身黑灰，身上背着两个包袱和两小袋米。看见老师们，他放声大哭。原来他和一个同学结伴同行，路上敌机扫射，他们躲进路边农民堆草木灰的矮屋，屋被炸了，同伴被炸死，他受轻伤，忍着痛连同伴的东西一起背了回来。

在云和过了三个多月，日寇退出丽水，于是先派一小批人回碧湖看看。劫后的保育院，看了真是痛心！山字形的瓦房，十多个教室和办公室完全被毁，未留一片整瓦。总务处的房屋、大礼堂、会客室、办公室、工场、厨房、仓库，以及再前面的幼儿班教室、寝室等等房屋，尽成瓦砾。只有在外面的医务所和畜牧场房子还在。农场没有多大损坏，却增加了茂密的青草。

全部回碧湖是不可能了，决定部分教师带高年级儿童回碧湖，其余中、低、幼各班全部留云和河上村，作为分部。以王冠民为分部主任。

一九四三年夏，又有日寇窜扰丽水的谣传。留碧湖的师生仍撤到云和。几次迁撤的经验教训，觉得太近前线不是办法。商讨的结果，准备迁去平阳顺溪。但成行不易，一再拖着。一九四四

年秋，云和河上村一带发生鼠疫。保育院所有寝室教室，由卫生部门封掉，衣服杂物一律不准移动，泼上火油，完全烧光。这样一来，不得不马上迁往平阳顺溪。

顺溪在平阳北港区的山区里，距县城一百四十华里，距北港四十华里。房屋古旧而高大，山青水秀，是南雁荡山的风景区。屡经搬迁，到此稍松一口气。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得到这个消息，师生欣喜若狂，互相庆贺。可是，高兴得太早了！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浙江省社会处处长方青儒派平阳土豪吴勃来接管保育院，原有的教职员一律被辞退。保育院改名为慈幼院。保育院就这样宣告终结！

长期工作在保育院的老师们和长期生活在保育院的孩子们患难与共，亲如父母子女，这样的师生感情，离别是痛苦的。老师们要离开的前三天，已听到孩子们嘤嘤的哭泣声。到临行前一天，就围在教师宿舍门口放声大哭了。临走那天，老师们决定提早悄悄上船，不料天还未亮，房子四周已有很多儿童在低啼暗泣。孩子们在炮火中失去了爹妈，流离颠沛，好容易进入保育院，老师们给他们以温暖，现在老师走了，怎能叫他们不哭呢！老师们几年心血，得到如此结果，又怎能不哭呢！到天亮，师生都放声大哭了。引了附近的居民围着来看，问长问短，好多人掉眼泪。

保育院的老师们，由于几次搬迁，逐渐离去，到被解雇时，只剩三十余人。解雇后，这三十余人多数去杭州找工作。那时找工作可难啊！由于长期工作在保育院，与外界接触很少，不易找到新的工作。加以外人对保育院侧目相看，找工作更困难些。长期为国家工作的报酬，是失业与贫困。

留在平阳的院童，后来和吴勃闹得很凶。物价飞涨，加以吴勃用人不当，伙食一天比一天差。饭吃不饱，牢骚怪话当然很多。吴勃企图用强制压服办法，可是越压反抗越厉害，风潮越闹越大。吴勃除赶出部分院童外，还嫁祸于人，为自己推脱罪责，到杭州省社会处告状，说是“严金明、王冠民埋下的定时炸弹”。

在平阳被吴勃赶出来的院童，有几个无家可归，流落到杭州。此时在杭州的老师多数失业，只有李慧英找到了小学教师的工作，有点儿收入，接济了孩子们。解放以后，这几个孩子分别成为部队政委、工厂劳模、技术员，多次来看望少年时代的老师。

保育院儿童长大后，参加革命队伍的为数甚多。现在散居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部队、学校、工农业战线。有解放战争中参加作战和打游击的，解放后参加抗美援朝立过战功的。他们的成长和保育院这个大家庭给他们的启蒙教育是分不开的。于今“喜看稻菽千重浪”，桃李芬芳遍地开的时候，回顾往日的脚印，当时的老师，有的已成古人，王冠民、王桂五同志更成为烈士，为革命事业献出他们的一切了。

（一九八二年）

浙江第一、二儿童保育院 点滴回忆

孔昭锐

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统治区曾办过儿童保育院，收养战区难童。浙江有两所，它们的全称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浙江分会第一保育院和第二保育院。当时两院都有中共地下党的活动。一九四〇年秋到一九四二年秋，我曾在两院工作过，知道一些活动情况。不过如今事隔四十年，个人回忆，难免挂一漏万，不尽不实之处，尚须识者补正。

第一保育院设在浙江丽水县碧湖镇。该镇位于丽水西南，丽松、丽云公路横贯其间，南临瓯江，水陆交通便利。杭州失守后，丽水成了浙江后方基地，碧湖增添了许多外来的机关和学校。第一保育院自成系统，不受当地国民党党政机关管辖，院长操有实权。

院内编制为总务、教育、医务三个部门，有教职员工八十名左右。学生七百名左右，全是从浙江前线收容来的难童。学生费用由院方供给，院方经费来自重庆保育总会。日常生活管理和教育以班级为单位，学生按年龄和文化程度编班，从幼儿园到小学六年级为止。班主任既管教育也管生活，吃住都和学生在一起。课程设置与一般小学同，教材亦用国民党教育部颁发的课本，这

些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并不过问。高年级每周有劳动课，多在自垦的沙洲农场劳动。学生读完小学后，一般报考初中和初级师范，有的院方给介绍工作，如到附近大港头兵工厂当工人。也有极少数的女生在医务所学习护理。院里还办了一份《儿童报》，对外发行，是四开的铅印小报，每周二期，每期四版，由碧湖印刷所承印，作为儿童补充读物和对外宣传刊物。

第一保育院有我党地下组织，在教职员中有一个支部。我去时支部书记是夏风（现名傅一夫，在上海金山石油化工总厂），他还在学生中领导少共组织。当时中共地下党员多以机关学校作掩护，第一保育院也是一个点。党的活动是合法与秘密、院内与院外相结合的。一九三九年，丽水的党在各方面都有很大进展，抗日救亡活动很活跃，保育院内外的公开活动也比较多。一九四〇年国民党积极反共，查禁进步书刊，压制进步活动，逮捕进步人士，院里一些引人注目的同志先后转移。这一年夏天，区委重新调整，县委派我到碧湖，并由夏风介绍进保育院任教员。我和夏风都参加区委工作。为了便于发展和开展活动，区委决定发动进步青年参加由浙江省立碧湖民众教育馆举办的剧团。我们动员了六、七名青年教师参加，我和夏风也在内，演出过抗日剧本《烟苇港》。院内我们采取单线联系，我只和夏风商量，总务主任严金明同志属统战部门，由区委书记周春龙（他在碧湖民众教育馆）单独联系，我们不与他发生横的组织关系。

第一保育院院长李家应，是位大小姐，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省政府秘书长，当地国民党官僚也要向她讨好。她的老家安徽已经沦陷了，我们主要从抗日救国方面打动她。这个人争强好胜，只要她认为是为保育院争荣誉的事或是她点过头的事，她都会承担

责任。虽然她是国民党的人，但由于从浙江保育分会到保育院都有我们的同志影响她，因此她是倾向进步的。教职员中绝大多数是青年，其中女教师比较多，一般都要求抗日，不满现状，关心时局的发展，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但也怕惹是非。我们的工作争取进步势力团结抗日，扩大队伍，揭露反动派顽固派破坏抗日的罪行，孤立少数反动分子；结合形势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叫嚣越来越厉害，我们也更注意隐蔽活动，一般都以个别串连和谈心的方式活动，党的组织也暂停发展了。有的学生（少共）转到附近大港头铁工厂当工人。

院内出版的《儿童报》是我们的主要宣传阵地，从编辑到发行，都很注意掌握在自己人手里。以前主编是徐继耀同志，我去时她已离开了，接替她的陈冠周，和我们的意见是相合的。之后他去贵阳，由陆明同志继任（陆明同志是中共党员，现在浙江绍兴军分区）。陆明同志走后就由我负责。在这方面，院长李家应还是肯放手让我们干的。我们很注意运用合法的材料，如介绍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等。另外，每期都有利用国民党报纸上的材料写成时事综合报道，揭发汉奸走狗破坏抗战投敌叛国的罪行。我们还选编了一些小故事、小常识作为儿童的补充读物，刊登一些儿童作品，启发儿童爱学习关心国事。在晨会、周会时我们常将《儿童报》作为宣讲材料。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浙江的党组织也遭到破坏，上级通知我们隐蔽起来，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这一年夏天，区委书记周春龙调走了，保育院的夏凤、陆明也先后调走了，上级另派小王（现名吴艺圃，在七机部）和我联系。这一年冬我也因受到反

动派的注意离开了第一保育院。

一九四二年四、五月间，我到松阳赤岸村第二保育院工作。这里的情况和第一保育院不同。赤岸是个小村，社会关系比较单纯，当地反动派的干预也少。院内虽无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但实际上却比一院强。虽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我却象到了家一样，学习、工作、交换意见都比较方便。主要原因是院长戚铮音同志的关心和爱护。大家都叫她“戚大姐”，不称“院长”。当时车朝镛（改名陈骊，现名肖车，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长）、袁洪（现名方徨）、黎纪湘（现名杨立平，在上海外贸学院）、艾重年（现名王敢泊）等人从上饶集中营中逃出来，辗转到保育院，她都留下了。解放后知道还有一些人也是失散了的同志。我当时已失去党的关系。肖车介绍我见院长，她和我谈话很坦率，要我担任院里的教育主任。后肖车与袁洪先离院北上找新四军。

二院的组织编制与一院同，只是规模较小，内有教职员工三十名左右，学生近四百名。教材是自编的，有的把社会发展简史也编入教材。学生思想比一院活跃，倾向进步。曾组织剧团，到附近的古市镇演出《表》。

正当我了解情况，准备开展工作时，意外的事情来了。日寇进攻浙东，衢州、金华相继失守，松阳危急，我们不得不后撤。但搬迁缺乏交通工具，翻山越岭全靠步行，沿途食宿供应也成问题。学生最小的只有四、五岁，全靠大人照顾，需要全撤出，困难重重。我们先退到赤岸南面约五十里的白岩山，住在一所大庙里，距离比较近。天气还不很热，分两天步行，再陆续搬运生活物资，情况比较好。不意只住了半个月，战争又恶化了。我们又从白岩山后撤到龙泉（全是山路），沿龙泉溪到了小梅。不多儿

天，又沿公路南撤到庆元竹口，之后又退到福建松溪大埭。八月间，日寇后撤，才又回到庆元竹口安顿下来，整个夏天都在大搬家，先后持续了三个月。我们遭到的困难是很大的，走路难，安排食宿难，接洽粮食物资供应、接洽交通工具难，沿途溃兵难民乱作一团，地方政府一日三惊，有的已属半瘫痪状态，想靠它们办事真是难上加难。这时戚大姐最忙了，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一把手，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好不容易安全转移过来，正想安顿下来，修理院址，重新转入正常秩序开展教学活动时，眼病和痢疾蔓延开来，院里缺医少药，设备条件又差，孩子们在搬迁时体力消耗太大了，更容易受疾病侵袭，常有学生病死。医务室仅有的一名医生又走了，真是急死人。戚大姐一面向庆元县求助，请他们派医生来院，并派人买药，一面组织老师日夜轮班加强护理，还设法改善伙食，注意饮食卫生，自制豆浆每日供应。情况一直到秋后才恢复正常，各方面也都稳定了。

这时黎纪湘决定北上再找新四军归队，约王一民（现名王民华）和我同行，于是我们三人就于十一月间辞职离院。

我所经历的营救工作

张友渔



张友渔和韩幽桐在北京家中

皖南事变后，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民主进步人士的迫害加剧，中共南方局决定把当时在重庆、桂林等地活动的左派文化人撤退到香港去，并派我和夏衍、胡绳等党员同志去做这批左派文化人的联络工作。

我是在一九四一年二月到香港的，主要是在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香港分局负责人廖承志同志领导下，搞救国会的工作和文化工作。后来周恩来同志指示香港分局，要在香港建立宣传据点，出一张我们自己的报纸，但不要办得太红，要灰一点。因此，创

办了《华商报》，意思是华侨商人的报纸，由胡仲持担任总编辑，范长江主持报纸日常工作，廖沫沙任编辑主任，我担任主笔，负责社论的撰写和审定。写社论的分工是：邹韬奋写民主运动方面的，夏衍、茅盾写文艺方面的，胡绳写思想方面的，乔冠华、金仲华写外交问题和国际问题，我写抗日、民主宪政、日本问题方面的。所有社论最后由我定稿。这张报本来是想办得灰一些，但不管写作上如何讲究技巧，文字上如何小心，办起来还是被人认为红了，因为我们坚持团结、抗战、进步的方针，就不能不骂汪精卫卖国，批评蒋介石搞分裂投降和倒退，就不能不呼吁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动员广大群众抵抗日本侵略者。我们这种鲜明立场，当然为国民党顽固派所忌恨，日本法西斯和汉奸走狗，更是把我们视为眼中钉。因此，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香港一沦陷，我们这些党内外文化人就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当时，我们对港战爆发的紧迫性估计不足。日军攻占香港后，我们仓促应付，停办了《华商报》，分头疏散转入地下。我自己就搬了好几次家。我原来和胡绳住在文委机关，后搬到铜锣湾附近的一个小院子里。日军从九龙打炮，打中了这个院子，把我住的房子都炸毁了，幸好我和韩幽桐不在家。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连贯同志得知后，派一个姓杨的同志为我们在一家商店楼上找了房子。一天夜里，有几个伪军突然闯进来，气势汹汹地用刺刀顶着我的胸，要进行搜查。我以前去过日本，会几句日本话，就用日语喝斥道：“你们要干什么？！”他们一听日语就软下来了，以为我和日本人有关系，不敢贸然得罪，慌里慌张地跑了。事后，为了防止意外，我又在连贯领导下的潘柱同志的帮助下，搬到波斯富街一个工人家的阁楼上住。

从这以后，潘柱经常与我联系。他告诉我，党中央、周恩来同志来电报指示地下党和游击队，要想尽一切办法将困留在港的文化人抢救出去。他准备安排我尽快离港，但我听说还有好多文化人尚未与地下党组织联系上，无法组织他们撤离香港，便主动提出我先不忙走，留下来帮助联络。战争爆发以来，为了躲避敌人的耳目，好些人都象我一样，搬过多次家，失却了联系，找起来很不容易。我记得找胡绳时，好不容易打听到他的住址，但敲了半天门，出来开门的却是一个不相识的女人。她说了声“没有这个人”，就把门“啪”一声关上了。我悻悻地走到楼底，正要离开，忽听到背后有人叫我，回头一看，正是胡绳！当时情况很复杂，确实不能不谨慎。以后，我又在一个胡同里碰上了戈宝权，在跑马地见到了于毅夫，在铜锣湾灯笼街找到了邹韬奋……，我把联络上的文化人及时提供给潘柱，由他和香港地下党分批组织文化人转移。在这之后，我和韩幽桐也离开了香港。

撤离香港的文化人，都是在深夜乘地下党准备的小船偷渡到九龙的。我们偷渡那一次，正赶上日本哨兵在九龙渡口检查。我们不能在渡口靠岸，只好划到岸边一个僻静的崖壁下，由护送我们的交通员先上去，然后吊一条绳子下来。我们紧紧地抓住这绳子，慢慢沿着崖壁缝爬上岸去。

在九龙，我们在地下党早已准备好的秘密住处化装成商人模样，然后到一个叫西贡的小港上游击队的船，准备从海湾过渡到对岸的沙鱼涌，进入惠阳游击区。正当我们在海上航行的时候，迎面开来一条大船，挡住我们的去路，上面满是全副武装的土匪，一个个凶神恶煞，大喊大叫要拿“买路钱”，不然就要动枪。我们船上的游击队员一下子亮出了武器，顿时间剑拔弩张，针锋相

对，好不紧张！那股土匪先是一愣，后对峙了一阵，见我们不是好欺负的，便知趣地把船闪开，让我们过去了。

上岸后，惠阳的地下党组织安排我们住在田心村一个老海员家里。那老海员只有一个孩子，把我们当家人看待，每天给我们煮红米、白薯吃。在战争年代，这是难得的啊！

我们在田心村住了十多天后，由游击队交通员带领，步行去茶园。这是叶挺的家乡，游击队在那里设立的秘密交通站。在路上，我们又碰上了一帮土匪，他们站在半山坡上拿着枪喝令我们把带的东西留下。护送我们的两个小交通员毫无惧色，拔出手枪用广东话喝令他们放老实点，说我们是打“日本仔”的游击队，这一带到处都是我们的人，谁要惹麻烦，日后定饶不了他！这一番话义正词严，土匪们听后面面相觑，随后不声不响地溜了。

在茶园，我们意外地碰到了茅盾夫妇，还有与他们同行的胡风、宋之的夫妇、叶以群、廖沫沙等，他们和大多数文化人都是从九龙走陆路先到达宝安游击根据地白石龙，然后再从那边过来的。我们两队会合约有二十人左右，记得还有许幸之、周钢鸣、沙蒙、葛一虹等。大家见面，喜出望外，互相诉说这一段流离颠沛的生活。

当时，日寇正在惠州城烧杀抢掠。惠州是我们前进的必经之路，我们只得在茶园隐居下来。一个星期后，日寇撤离了惠州，茶园交通站站长蓝造带着游击队员护送我们上路，组织上指定由我负责带队。从茶园到惠州有九十多里路，为了保证安全，必须一天赶到。我和大家越坎坷、涉溪水，一路上跌跌撞撞，急走疾行，茅盾夫人还不慎掉到两丈多深的干涸河道里，幸好水浅泥多没伤着身体。就这样，终于在当天夜里赶到惠州。到那后，地下

党的卢伟如同志把我们分别秘密安排在东湖旅店和一家商行住，并通知我，廖承志已从惠州去曲江（即韶关），留下了联络地址，要我到曲江去找他。

两天后，我们从惠州坐装盐的木船溯江而上，到老隆。船到时，到这里负责接应文化人的连贯同志已在岸上等候。他以接待逃难的“香港商人”的名义，安排我们住下，并很快通过地下组织，联系了四辆贩私盐的汽车送我们去曲江。我乘的那辆汽车走到半路，听说前面缉私队查私盐查得很紧，急忙折回老隆，不愿冒险走了。可是我已找不到连贯了。在这里人生地不熟，很容易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怎么办？我只好给盐贩子好说歹说，并给了他一些好处，他这才答应，待缉私的过去了，再设法用车把我送到曲江去。

到曲江后，我和韩幽桐按预先告知的联络地点，找到了在这里负责接应文化人的乔冠华。他带我们到一条船上，会见了廖承志。廖承志告诉我，从香港来的大多数文化人都要从曲江坐火车到桂林，南方局已派一个秘密代表李亚群和先期到达的夏衍在桂林负责接待和安排工作。最近南方局决定夏衍回重庆工作，让我去接替他的工作，到那里后有什么问题直接向南方局请示。

当时，国民党对桂林控制得很严，派了许多特务监视共产党与左派人士的活动。我到桂林与夏衍交接工作后，就以做书店编辑为掩护，出面接待文化人。李亚群则一直没公开活动，我每天早上同李亚群在一个地方接头商量工作。周恩来同志有什么指示，都是他传达给我的。我们把大部分文化人送往重庆，如茅盾、胡风、胡绳、戈宝权等同志都是经我手送走的。记得高士其已瘫痪，行动很不方便，我找了个姓谢的保姆照顾他，并护送他去重

庆。张铁生当时身体不好，从香港辗转到重庆，一路上劳累，患了重病，就安排他在七星岩附近一个姓王的教授家住，找人给他治疗，待他病好转后才送走。此外，象邹韬奋、范长江这些同志，国民党顽固派对他们恨之入骨，到重庆危险性大，就送往苏北抗日根据地。韬奋当时人在广东，但他的家属已到桂林，南方局让我把她们送到广东，和韬奋一起去苏北。还有一些能暂时留下的文化人就留在桂林。如千家驹、狄超白、萨空了、司徒慧敏、廖沫沙等等，我经常组织他们暗地里集会，谈谈形势，讨论一些问题。常参加的人记得有邵荃麟、狄超白、司徒慧敏、杜宣等，茅盾和田汉夫妇等去重庆前，也参加过。

为了保证在桂活动的左派文化人的安全，我一直同国民党左派人士李济深先生保持联系，并通过另一个国民党左派人士陈此生认识了李宗仁、白崇禧的两个亲信，一个叫李任仁，是白崇禧过去的先生，另一个叫陈劭先，是李宗仁的幕僚。通过他们对李宗仁、白崇禧施加影响，争取他们支持或默许抗日救亡的活动。

我在桂林呆了约有一年。一九四三年春，接待左派文化工作者的任务基本上告一段落，同时，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一个叫左钱的党员叛变。廖承志曾派他从广东到桂林与我联系过，知道我的底细，我继续留在桂林不安全，周恩来同志来信叫我赶快回重庆。我把事情清理安排好后，通过司徒慧敏找了一辆私人运输汽车，迅速离开了桂林。我走后，原来留在桂林的一些文化人也陆续到了重庆，只有萨空了没来得及，被捕了。至此，营救文化人的工作结束。这充分体现抗战时期我党我军同革命知识分子患难与共、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的伟大事件，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刘百粤整理）

旅苏廿四年

韩铁声

我是一九二七年受党派遣到苏联留学的。本想学习一、二年之后就回祖国工作，但始终未能成行。直到全国解放后，一九五



韩铁生与夫人朱家瑞
及其儿子摄于一九四九年

一年才得回国，在苏联辗转工作了二十四年。这期间我在西伯利亚、乌克兰、外蒙古、国际儿童教养院、苏共中央编译局等许多地方和单位工作过，回忆整理成章，或许对史学工作者有点用处。

赴 苏

一九二七年十月间我由向忠发、李震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以前我在天津做河北省农民委员会委员，住在法租界里。因我的活动引起巡捕注意，组织上介绍我同河北省委

的高俊峰同志一起到上海找党另外分配工作。八月，我们一同到了上海。上海仍处于四一二后的白色恐怖中，形势很紧张。我们没有找到党组织，只碰到一位党员同志，他说：“临时中央在武汉，你们到武汉去吧！”于是我们乘船来到武汉。

武汉形势也很紧张，天天晚上戒严、查户口，在小旅馆里住不下去。高俊峰说他的同乡王法勤任国民政府劳工部长，找他去吧。王是国民党左派，比较同情我们，但这时他人在南京。他家里人虽不欢迎我们，但碍于同乡情面，高与王又很熟识，只好叫我们住下。我俩每天上街转，希望碰上同志，但总也没碰上，心里非常焦急。说来也是无巧不成书。有一天我到江汉关码头一带漫步，那一带全是大、小码头，来往的人很多。我边走边想：今天总会碰上一个同志吧？突然，我背上被人击了一掌，回头一看，是陆求人（当时是共产党员，同我在哈尔滨一起办过报纸。后来听说他到国民党里当了少将）。我喜出望外，连忙向他打听情况，他反问我到武汉干什么来了？我说是来找党中央分配工作的。他说：临时中央原决定由李震瀛在武汉领导武装暴动，但是条件不成熟，没有发动。

李震瀛是李大钊同志派到哈尔滨开展党的工作时认识我的。一九二三年他提出要介绍我参加共产党，那时我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只知爱国，就说：“我再想一想。”经过几年的斗争锻炼，特别是四一二大屠杀血的教训，我终于决定了我要走的道路。这时候我是非常迫切地希望加入共产党了。一听李震瀛在武汉，我高兴极了，想马上就去找他。陆求人说：“现在白色恐怖太厉害，开展工作不容易，找来找去容易暴露目标，你不要去找他了。党中央已经决定把这里的同志分为两批，一批参加南昌起

义，一批去苏联学习。南昌起义你是赶不上了，去苏联学习吧！”我一九一五年就在哈尔滨工作，十月革命时，哈市的俄国人分成两派，斗争激烈，给我印象很深。我一直想知道社会主义究竟什么样子，去苏联正是梦寐以求的愿望。我当即答应下来。

陆求人同党中央联系后，带我到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许之祯同志处。许将帅孟奇、卢育群、朱家瑞、范文惠和我编成一组，由帅孟奇同志任组长，并给每人发了五十元银洋作为去上海的路费，还要我们自己找医生检查一下身体。过了几天，帅孟奇与朱家瑞到王法勤家来找我，适逢我外出。我得知后马上又去许之祯那里找她们，帅孟奇告诉我哪天到码头上乘哪条船去上海，到上海后直接去××旅馆（名字已回忆不起来），这是党中央已为我们联系好的。

上船之前，我终于见到了李震瀛同志，原来他就是这次赴苏学习的组织者。我向他讲了别后几年的经历，郑重地向他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们五人按指定时间上船，顺利地到了上海。指定的那家旅馆来往人员很杂，收费也较高，住不进去。正好我弟弟在燕京大学驻上海招生处工作，他替我们找了一家学生公寓，这里清静多了。闲聊时听学生说：前几个月有一批准准备去苏联的人，被国民党特务从海船上查出来，全部抓走枪毙了。

在上海呆到十月间，我们得到通知：到杨树浦码头去搭乘一艘苏联商船。我同帅孟奇商量：“国民党特务对苏联船很注意，直接从码头上船恐怕会引起麻烦，不如雇条小船从轮船背向码头那一面上船。”她也认为这样做比较稳当。小船划到江心时，遇到水上警察的船只，他们大喝：“停船！干什么的？”我回答：

“想搭船去天津。”年纪大些的水警说：“怎么那么多人去天津，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我尽量坦然地说：“穷学生，没钱买船票，只好想这个办法。”年轻的一个水警大概动了恻隐之心，说：“放他们走吧！”于是，他们调转船头奔别的小船去了。我们也赶快划到苏联船旁上了船。

上船之后，苏联海员把我们藏在货舱里。我一看，货舱里密密麻麻地挤了有一百多人，怪不得刚才那个水警问“怎么那么多人上天津”。临出发前，我们每人起了一个俄国姓名，我叫伊万·尼格莱维奇·基巴尔奇。组织上规定，互相间只准称呼俄文名字，不许互相打听中国名字，防止万一出了叛徒，连累一大片。所以我们谁也没有互相搭讪。开船之前，海关又来人检查，发现货舱里挤满了人，便问：“你们这么多年龄相若的人都在一起，要到什么地方去？”说着，他走近李震夫，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到什么地方去？拿证件来看看。”要证件！谁也没有。只听李震夫生硬地说：“我是湖北人，不懂你讲的上海话。”检查员无可奈何，怒不可遏地走了。大家都有些担忧，怕他带警察宪兵回来，那我们就要重蹈前几个月那批人的覆辙了。

紧张空气持续了几十分钟。突然，汽笛“呜！呜！呜”地叫了几声，船也跟着动起来，大家这才放心。闯过吴淞口不多一会儿就到了公海上。可解放了！自由了！大家都跑到甲板上来，高兴得又笑又嚷，不知谁起了个头，我们尽情地唱起《国际歌》来。后来，李震瀛（中央后补委员）和向忠发（工会主席）向大家宣布：我们这一行人算是中共派出的赴苏学习代表团，目的地是莫斯科，带队的是第三国际派来的一位印度同志。

同船的人大部分我不认识，又不许打听中国名字，所以只记

住了很少几个人：应修仁、曾爱华、陈伯达、易定山、赵云容、李震夫，再就是我们小组的几位女同志。

一路之上风平浪静，过了两夜三天便到达海参威。代表团党组织审查了我的要求和表现，决定吸收我为中共党员，介绍人是向忠发和李震瀛。入党这件事对我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意味着我终于在人生的旅途上确定了方向，找到了归宿。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也知道它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但总想得十分理想，没想到一下船就遇到一件令人不快的事。在海参威海关，苏联检查员见到我们带的东西中有当时在苏国内很难买到的日用品和毛线，便蛮不讲理地全部没收了。第三国际代表——那位印度同志几番交涉还是要不回来，只好不了了之了。

海参威原来是中国领土，后来虽被中俄璦琿条约划归沙俄，中国人在这里还是能够自由出入的，没有什么限制。十月革命后才设立起关卡，中国人不再能自由出入了。这里街上的商店饭馆大都是华人开办的，整个风俗习惯、生活习惯也同国内差不多。尽管到苏联学习是件极令人神往的事，但踏在成了外国领土的祖先留下的土地上，看着同胞由土地的主人变成了侨民，心头总觉十分梗涩。幸而在海参威只停留了半个月就上路了。

当时交通十分不畅，我们这一行人分三批向莫斯科进发。第一批是共产国际代表、代表团领导和一些团员，帅孟奇、朱家瑞她们是第二批，我是第三批。在路上听说托洛茨基被开除出联共（布）。十一月十三日到达莫斯科后，便进了中山大学。据说按国际法规定，我们的身份是政治侨民，不同于一般自谋生计的侨民。

中山大学是一九二五年国共合作时期成立的，专门培养中国同志。在此之前，莫斯科有西方大学和东方大学，都是第三国际为培养各国革命者建立的。中国、印度、马来亚、越南、日本、朝鲜等东方国家的革命党都输送干部到东方大学学习，我国的刘少奇、朱德、李富春、聂荣臻、许之桢等同志也在这里学习过。我国大革命时期，第三国际又专门为中国建立了孙中山共产主义大学（直译），国、共两党都派了许多人来留学，蒋经国就是那时去的。后国民党背叛三民主义、屠杀共产党人，第三国际将中山大学改名为共产主义中国劳动者大学（直译），简称共产主义大学，专门接收中国共产党派来学习的人，学生有一千多人。据我所知，只是破例地收过两名朝鲜同志入学。约在一九二九年后，第三国际改组了共产主义中国劳动者大学，另外成立了列宁学校，还是只招收我党派出的学员。一九三〇年以后，我党派到苏联学习的人数渐多，来往不绝于途。我总的印象是，在斯大林当政时期，苏联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是不遗余力的。那时苏联也很困难。

学习生活与反托派斗争

我们在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课程有社会发展史（杨尚昆口译）、政治经济学（沈观澜口译）、列宁主义（杨放之口译，笔译者张闻天、博古、曹靖华、赵××等）。我记得杨尚昆口译得最好，差不多苏联老师讲话的同时，他的中文就译出来了，和电影《白求恩大夫》里面那个翻译一样。有一次我问他：“你怎么译得那么快，那么流利？”他说：“事先备过课，看过讲义，和

教员也熟悉，一般他讲上句，就知道下句要讲什么了。”这些课程都是在国内未接触过的，听来道理很新鲜，所以学得也很有兴致。陈伯达读书很用功，总拿着书在校园里边走边读边想。他的爱人叫朱有仁，那时整天形影不离，后来不知为什么离婚了。

留学生里有学生会，主席是一个上海来的工人同志，组织出墙报、开晚会等活动。但留学生里没有党组织，据说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还“不成熟”，所以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资格不被承认。同时苏联也不准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在苏联建立自己的支部，将各国党的旅莫支部都取消了。各国共产党员到苏联后一律得重新申请加入联共（布），支部大会通过后，即可作为候补党员，候补期不定。转正时需正式党员二人（不必同一支部）介绍，若是知识分子党员转正则需三名正式党员介绍。（我们那一批是集体转为联共（布）候补党员的。）这些做法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古怪，但当时苏联国内、外阶级斗争都异常复杂，采取些非常措施是可以理解的。

我与朱家瑞（我的妻子）一九二九年在共产主义大学毕业。整个学习期间，校内都在联共（布）影响下进行所谓与托派的斗争。对联共（布）来说，托派是确实存在的，他们有秘密组织，另收党费，反对斯大林领导的党中央的路线。对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本不应卷入别国党的斗争。但留学生中有那么一小伙人，特别是王明等人，借机打击异己，把自己打扮成国际的代理人，想取得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其实，王明并未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到苏联学习时连共青团员都不是，只因他拍上了中山大学的校长米夫，才得以加入联共（布）。留学生中有些年青同志被托洛茨基的口才、学识所迷惑，赞同他“建设

社会主义只依靠工人阶级”等观点，本来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通过实践和教育完全可以纠正过来。但王明一伙人认为只有他们才是纯粹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对中国革命只有他们的看法最正确，对其他同志一律采取了“不准革命”的做法，只要在对国内问题的看法上与他们不同或是稍许表示赞同托洛茨基的观点，以至同他们观点一致但看不惯他们做法的人，一直波及到在教学上与之意见不同者，统统被打成托派，轻者遣送回国、开除党籍，重者流放、劳改、关监狱，真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在苏联多年，知道一些被劳改、关监狱同志的情况，景况十分凄惨。其实，许多被打成托派的同志并不知道托洛茨基是怎么回事。我个人对王明那一伙人的看法是：他们并不是什么反托派的英雄，而是唯我独尊的宗派主义小集团。他们中有好有坏，比如张闻天同志，他有些观点非常左，但对同志平等、温和，处理人时比较稳。又如王稼祥同志待人也很谦和，我与他个人感情一直很好。王明、博古等人则是锋芒毕露，野心勃勃。有些人在苏联表现得极革命，回国后却跑到国民党那边去了。广州暴动时任广州公社外交部长的黄平在苏留学时最能唱高调，比谁都革命，回国后却消沉了。盛忠亮、卜士奇、袁家镛、汪盛狄等人回国后由极左转向极右，堕落成可耻叛徒。王明、博古、陈昌浩等人回国后在我党我军内担任了相当高的职务，他们拚命推行极左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

多数同学不满他们的做法，不接近他们。如叶挺同志当时还未入党，我问他对两派斗争有什么看法，他说：“我是来学列宁主义的，哪派也不参加。”后来王明小集团整人整得太凶，他很看不惯又无可奈何，便托言养病到德国去了。

一九二八年，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向忠发、李震瀛都参加了。向因是工人，被选为我党的总书记，他的观点过于激进，使人不能接受。有一天，我到旅馆去看他们。李震瀛还比较稳当，他反对陈独秀的右倾，也不同意王明他们那么左。向忠发则是不加思考地说：“中国革命就是要搞武装暴动，各大城市同时暴动。”他边说边比划：“要在南京、武汉、广州、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同时燃起革命烈火，同时举行大暴动。这样国民党反动派就会一下子垮台。”我听了十分疑惑：革命岂不是太容易成功了？但他已是党的总书记，我只表示了一下疑问便没有再多说什么。现在分析，李立三、王明、向忠发等人的左倾盲动主义不是孤立现象，而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做华侨工作

我与家瑞一九二九年从共产主义大学毕业，但觉得只学了些理论，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毫无所知，因此想在苏工作两年再回国。我们的想法经校党委转请苏共中央，而苏共中央也正想留几十名本届毕业生在苏联做华侨工作，这样，我们就被分配到伯力（哈巴洛夫斯克）工作了。

我们到苏共中央组织部拿到了莫洛托夫（组织部长）亲笔签字的介绍信，上面写明我的职务是苏共中央的宣传员。到伯力后，家瑞被派到伯力华侨子弟学校当校长，我在手工业联合会任指导员，后调往伯力高级法院任审判员。

一九三一年，家瑞被派到莫斯科师范大学进修。后来家瑞告诉我，当时任人民教育委员（教育部长）的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

娅亲自给他们上课，作风十分深入。

在伯力的工作使我感到原来在苏联工作二年学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想法过于天真了，还是应该回到国内去，在斗争中学习，于是便请假看望家瑞，得到一个月的休假。我趁机把全部行李托运到莫斯科。

到莫斯科后，我跑到苏共中央委员会，拿出莫洛托夫的亲笔签字的介绍信，门卫一看便放我进去了。苏共中央组织部的一个干部接待了我。我说我要求回国，他不同意。我苦口婆心地讲了半天，他还是不放行。我急了，说：“我不是来苏联找工作的，有碗饭吃就不回去了。我要回祖国去！”他还是不紧不慢地说：“你回国是革命，在此地也是革命。这里有许多华侨，总需要留一些中国同志在这里工作。你去过远东了，这次派你去南俄工作，那儿很不错的。”我还想讲“价钱”，他说：“你安心在苏联工作吧，我们不会放你回去的。”没办法，我只好同意去顿巴斯地区的斯大林城工作。

斯大林城（Город Сталь）不是斯大林格勒（Сталигород）。斯大林城管辖顿河流域，管辖整个顿巴斯地区，斯大林格勒管辖伏尔加河流域。顿巴斯是苏联著名煤矿产区，有许多华侨在这里做工。我的职务是指导员，专做华侨的思想工作、宣传工作。大概由于是苏共中央直接分配的，又是外国人，顿巴斯市委对我十分照顾，在当时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分给我一套沙俄时期一个工程师的住房，城里人都叫我中国工程师。当时没有公共汽车，小汽车更没见过，市委专门拨给我一辆马车，要去什么地方，我鞭子一挥就赶着马车去了，比之一般群众，已经是得天独厚，非常便利了。

华侨住得很分散，我不但经常去工矿区，也经常去农村，给他们讲讲国内形势，帮助解决一些生活困难。我发现，不论到哪儿，华侨都挺得人心。他们忠诚、勤劳，每到一地都会因受当地姑娘的欢迎而很快落户。中国男人除了忠诚、温和之外，做饭、烧菜、洗衣服，什么家务活都干，不像当地有的男人，一点家务活不干，除了喝酒就是打老婆。顿巴斯地区的华侨大半是沙皇时代从唐山招来的工人，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与当地乌克兰人、俄罗斯人的关系非常和睦。大多数华侨满足于在这里生活，不思回国。有时我同他们闲谈，谈到我很想回国，他们说：“在这里当主人，回去又是煤黑子，那个苦吃怕了。”有个河北遵化县人李凤林担任一个矿区的党委委员，他十几岁去俄国，这时已五十多岁了。他常说希望祖国也建设社会主义，非常思念故土，但我动员他同我一起回国干革命时，他表示不想回国。

我在苏联做了好几年华侨工作，深感华侨对俄国革命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十月革命后，十四国武装干涉苏联，曾一度打到莫斯科城下，全部成员都是华侨的五号队参加了解围作战，给莫斯科解了围，为保卫年青的苏维埃政权立下汗马功劳，受到列宁的高度赞扬。五号队有五千多人，相当一个旅的建制，它的队长是一个中国同志，很受尊敬，当时与苏军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元帅等都是平起平坐的。在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五号队又向阶级敌人、土匪作过英勇斗争，享有很高声誉。直至一九二八年武装斗争基本结束，才解散了这支华侨队伍，他们中大部分人来顿巴斯矿区工作，又成了矿区一支生力军。

在 蒙 古

在乌克兰工作了一年，我找顿巴斯市委要求放我回国，他们不肯。我天天去磨，足足磨了一个星期，他们才松口说，如果我能找到一个通晓中、苏两国语言的同志接替我的工作，就放我回莫斯科。我很快找了一个人接下我的工作，便回到莫斯科。苏共中央组织部还是不同意让我回国。那时已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我反复说：“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了中国，我必须回去。”他们说：“你走了，又要培养一个中国干部做华侨工作，不如你再坚持几年。”怎么办呢？我真是急得睡不着，吃不下。忽然灵机一动，申请再学习，这样说不定可以随着其他留学生一起回国。这样，我进了莫斯科法科大学，后又去东方语学校，但还是不能回国。正感到无计可施，走投无路时，遇到一位安徽来的陈同志，他是留法转留苏的，也是苏方留用人员。他告诉我，蒙古要人，我们到那里去工作，说不定可以设法回国。我们写信给苏共中央，要求去蒙古工作。苏共中央把我和家瑞介绍到苏联内务部又转介绍到蒙古内务部。

我们到蒙古是一九三三年。那时蒙古基本上是苏联控制着。我工作的蒙古内防处（后改为蒙古内务部）就是苏联专家领导，有苏联人、中国人帮助工作，一个蒙古人当处长，但什么事都要苏联专家决定。苏联认为蒙古各方面都不成熟，还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只确定了建设非资本主义的人民共和国的方针，要逐渐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蒙古的对外政策是反帝，对内政策是反封建。当时，我党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但国民党一直未承认，且派

遣许多特务活动。中国的私商、资本家、高利贷者的确希望像以前一样到外蒙去做生意赚钱，所以支持国民党的政策，国民党也利用他们搞情报。我的工作就是了解控制国民党分子及日本特务在蒙古的活动。

送十万银元给中国红军

大约是三七年夏季，传说中国红军长征接近蒙古边境。苏联驻蒙古内务部总顾问秋贝克奉斯大林命令，叫我同蒙古内务部的一位处长携带十万蒙古银元（同中国银元比价为1:1），到中蒙边境与中国红军取得联系，支援红军。我们在阿尔泰山一带的一个边卡等了半个月，每天派边防军四出了解红军动向，但无消息，只好折回乌兰巴托。四六年，我在苏共中央翻译局同陈昌浩同志一起工作，问起此事，他说：原来的确想从甘肃北部进入外蒙，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帮助，但被五马的骑兵逼向新疆去了。

肃反

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进攻中国华北地区，同时准备进攻蒙古。斯大林认为日本最终会进攻苏联，采取了紧急备战措施——成立肃反委员会，清洗后方。这场运动及后来的纠偏都搞得很“左”，错杀了许多人。我国大革命时曾在黄埔军校任顾问的加伦将军（远东红旗军司令官布留霍尔）被当成日本间谍枪毙了，就连主持肃反的四任内务部长均未能幸免。

前面说过，当时的蒙古处于苏联控制之下，这场肃反不可避

免地波及到了蒙古。蒙古也成立了肃反委员会，主要成员是党的总书记、内务部长和苏联总顾问。该委员会可以决定一切，不必经过法律程序就可以逮捕人、审讯以至判刑。被认为不可靠的人，特别是在远东工作过的，又被认为与日本有瓜葛的，无论苏联人，还是朝鲜人、中国人都被抓起来审查过。

有一天，蒙古内务部的苏联总顾问格鲁奇科把我同彭发荣（冯玉祥派来学军事的，不是党员）叫去，说：“现在形势你们都知道，日本人进攻中国了，接着就会进攻苏联。为了备战，必须清洗内部。在蒙古人中要清洗，对中国人（实际上是指汉人）也要审查清洗。”我一听，就有些反感，因为我是做这个工作的，对中国侨民的情况很了解，该处理的早已处理过，没必要再搞清洗。但我还是尽量缓和地向他表示：“清洗是必要的。但我四年来一直在‘清洗’中国侨民。他们中的国民党分子和日寇派遣特务，早已按情节轻重加以惩办了。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加强对不可靠分子的控制就可以了。似乎没必要大动干戈。”格鲁奇科一听就火了，厉声说：“这不是你能决定的事，不要干涉。”

格鲁奇科曾在苏联内务部西伯利亚分处担任过负责工作，为人骄横跋扈，一点儿也听不进不同意见。由于他的“德政”，大批喇嘛被“肃”，大批中国籍商人也被当成反革命、特务给“肃”了。不过他也没什么好下场。一九三八年，斯大林发现肃反过火，下令纠偏，领导干部和肃反积极分子受处分的很多。据云连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都紧张得很，不敢公开露面。苏内务部长叶热夫被撤职（下落不明），代之以贝利亚。贝利亚上台纠偏，也搞得十分过火，参加三七年肃反的骨干分子十之八、九逮捕受审。这自然又波及到蒙古，苏联新任命了一批干部去乌兰巴托，

把总顾问格鲁奇格、苏驻蒙大使、参赞、领事及使馆骨干全部逮捕押回苏联受审。蒙古内务部除部长外所有司、处干部也未能幸免。在内务部工作的三个中国人有两个与其他人一起被押回莫斯科，只剩我一个人。我以为没我什么事，因我事先向总顾问表示过反对意见。孰知就为这个，最后把我也拘留了，还算区别对待，没有押解莫斯科。审问我什么事呢？说：“你既然反对搞肃反。为什么不向中央写信告状？”真使人哭笑不得，当时若写信，恐怕第一个就要“肃”到我头上。审了我几个月，到一九三九年三月，宣布我“无罪”了，可以释放；同时征求我的意见，是否愿意继续在蒙古工作。我当即表示：不仅不愿在蒙古内务部干了，就是莫斯科那个内务部也决计不呆了。

在中共干部休养所

约一九四〇年一月间，我和家瑞回到莫斯科，向内务部请求“转业”，他们还想挽留我。我说：“我是中共派赴苏联学习的，理由由共产国际分配工作。”最后，国际东方部分配我到休养所当翻译，照顾我国红军干部。

这些休养员中有：李进（林彪）、苏井观、王佑（方志纯）、马明方（马夫）、贺诚、李天佑、文云（贺子珍）、张梅（刘觉民）、杨之华、杨志诚、陈昌浩、江泽民、王美兰等人，还有几位同志的姓名记不清了。翻译是我、傅清华和李成。苏共中央安排他们到各医院看病，有的就介绍到皇宫医院（苏中央领导人看病的医院）。休养员来后，每天忙于看病、参观，后有人提出：国内环境那么艰苦，我们不能只看看病就算了，应该抓紧时间学

习。这样苏联派军事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专家每周来上课三次。

苏德战争爆发后，林彪要求回国。苏方说边境封锁了，不能随便出国。但林彪说他来苏联治伤是蒋委员长特批的，他可以公开回国，不必偷越国境。苏联方面终于同意他只身回国，其余的人仍不能走。林彪只好将爱人和不满周岁的女孩留在苏联，只身回国了。

国际儿童院

第三国际下面有一个国际革命救济会，是政治侨民的组织。它成立的原因是这样的，那时各国共产党的力量都不很强，许多



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内中国孩子合影

共产党人及其家属陷于绝境无法维持生活，而且要隐姓埋名，一旦被反动当局发现便有生命危险。第三国际深切体察这些情况，便成立了国际革命救济会，帮助各国革命者，同时救济和收容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妻子儿女。实际上国际革命救济会的成员是全体苏联人民，他们交纳的会费便是国际革命救济会的活动经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确作出过无私的贡献。

国际儿童院是国际革命救济会举办的，专门收容各国革命者，特别是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子女。中国儿童原在莫斯科郊区单独住。一九四〇年九月，第三国际决定把他们全部合并到国际儿童院去。我和家瑞到这里当了教养员。

国际儿童院设在莫斯科东北约三百公里的依万诺瓦城，这里是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爆发点。儿童们来自世界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英、法、美、日、德、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捷克、波兰、希腊、中国、印度、土耳其、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革命领导人的子女都在这里学习。十年制中学毕业后，他们可以优先升入各大专院校学习，学膳费均由国际革命救济会负担。孩子们的生活待遇十分优厚，有时居民、甚至教养员的口粮都供应不足，但孩子的生活有绝对保障。苏共中央很关心国际儿童院，经常派人来看望、解决问题。红十字会、依万诺瓦城的党、团委也经常和儿童们组织联欢会。

我们去时，院长叫斯巴洛夫，四十多岁，工作很尽职，工作人员有四、五十个，各国孩子有二十多个，他们的父母多数回国了，大多数孩子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中国孩子有三十多人，大的十八、九岁。小的八、九岁。毛泽东、朱德、刘少奇、蔡和

森、张太雷、郭亮、赵世炎、苏兆征等著名共产党人的孩子都在这里。孩子们在这里除了学习十年制中学的功课以外，还要参加劳动。特别二次大战期间，拨给儿童院约五百亩地种土豆，稍大的孩子都要下地干活。除种地外，还要打马草、劈锯木柴，劳动量相当大，孩子们都累坏了，但没有人叫苦。各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工作的同志，每周都有人来带孩子们一起劳动。

在国际儿童院里，中国孩子的学习和劳动是最好的。倒不是他们特别聪明，而是因为他们之中大多数都在国内吃过苦，受过磨练，懂得珍惜这个环境。儿童院里的学生组织有儿童苏维埃（即学生会）和团支部，都是选举产生的。儿童苏维埃主席郭志成，团支部书记毛岸英都是中国孩子，这也说明中国孩子的威信在院里最高。

毛 岸 英



毛岸英像

中国孩子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毛永福（即毛岸英）。他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长子，生得中等身材，面目清秀，有些像杨开慧。他从小吃过苦，尽管才十几岁，政治上已经相当成熟，知道为祖国的命运担忧，知道自己的责任，学习和工作都十分出色。他被选为国际儿童院团支部书记，讲起话来声音宏亮，逻辑性强，非常富于鼓动性。

岸英爱想问题，学习面很宽。有一天晚上，他跑到我宿舍，请我讲讲老子的“无为”哲学。我拒绝说：“咱们现在是真枪实弹的斗争年代，老子却主张‘无为’。你才十几岁，学这些干什么！”可岸英说：“我不过想知道老子的治世思想。‘无为而治’当然是不行的，能不能‘少为而治’？怎样才能大治？”我感到我知道的那一星半点儿远远解答不了他的问题，仍旧推说不知道多少。但岸英的特点，也可以说他的才能之一，就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凡他想干的事，总要想办法干成。挡不住他的“攻势”，我只得大致说了一下老子的清静无为学说，以及“绝圣弃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名言。

有一次开会，孩子们议论将来学什么专业，有的说学飞机制造，有的说学化学工业，只有毛岸英不作声。我问他学什么，他说：“想学军事，祖国正在抗战，我要准备回去战斗。”会后，他缠着我想办法送他进军校。过了几天，共产国际派曼努叶尔斯基来院探望。毛岸英找到他，说：“让我进军事学校吧！”曼努叶尔斯基感到惊奇，问道：“你是谁？为什么不等上完中学就要进军校？”岸英说：“我叫毛永福，是毛泽东之子。我的祖国正在日寇的铁蹄下受苦，我不能坐视。请允许我到军校去吧！”曼努叶尔斯基听了很表赞赏，说：“小伙子有主意，有志气！”又说：“你找对了。我是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学到中学九年级，岸英就转到军事学校去了。

在军校，岸英给我写了一封信，请我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按当时联共（布）的规定，凡与要求入党者一起工作过两年以上的共产党员，均有权做书面的入党介绍人。我马上回信，表示我愿意介绍毛岸英入党。这样，我就成了岸英加入苏联共产党的介绍

人之一。

毛岸英在军事学院毕业后，进莫斯科军事研究院学习，最后又进入东方语言学院（苏联培养外交官的专门学院）政治经济系学习。一九四六年，岸英学成回国。走前，他来向我告别，将他的照片送给我留念。身在异国十多年，现在可以报效祖国了，岸英十分兴奋，两眼闪着光。我也很为他高兴，嘱他：“国内条件艰苦，要有思想准备。”他说：“祖国啊！能为祖国效力，什么苦都不在话下。”岸英说到“祖国”的神情，至今历历如生。

一九四九年，岸英突然出现在我莫斯科的家里。他说是陪李克农同志秘密来访的，给李当翻译。谈了别后的情况，他征求我的意见：“回国后我到工厂工作好不好？”我说：“你向中组部说说看。”听说他果然去工厂工作了。两年后，苏联著名战地记者格拉西莫夫告诉我：岸英在朝鲜牺牲了。他当时也在场。

听到岸英牺牲的消息，我很难过，也很惋惜。他虽然小我很多岁，但与我个人感情很好，至今想到他的早逝和音容笑貌，我仍然非常难过。这个孩子有胆有识，革命精神很饱满，又肯想问题，是可造就之材，死得太可惜了。

贺子珍

我到儿童院工作时，贺子珍、张梅同志与我一同去的。她们一人带着一个小孩。贺子珍同志中等身材，容貌端庄文静，给人一种政治上很强的印象，不论讨论什么问题，她的见解总是有独到的地方，而且言词锋利。初时苏方只知她是长征干部，并不了解她是何许人，后来在一本画报上发现了她的照片，才知道她是



一九四七年贺子珍(右)、林月琴(左)、李敏(中)在苏联合影

毛泽东的夫人。我回国后,数次听人问起,是否苏方对贺子珍很不好,以至她后来不得不去工厂做工维持生活。这是没有的事。她心情不好,大家都同情她,特别是岸英,围前围后地称她贺妈

妈,孩子们也都懂事地叫她贺妈妈。当时,连孩子也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苏方却从未要求她和张梅参加过。由于心情不畅,又没有工作,贺子珍得了精神病,苏方送她住院治疗,出院后仍回到儿童院。一九四四年我离开后,她们仍住在那里。听说她又犯了一次病,被送进精神病院。四七年罗荣桓、王稼祥同志赴苏时将贺子珍接出来一同回国了。

在莫斯科外文出版局

我和家瑞在苏联最后一个工作据点是莫斯科外文出版局中文编译部。外文出版局除中文编译部外,还有英、法、德、意、朝鲜、马来亚、西班牙、印度等国文字的编译部。这些编译部是应共产国际的要求成立的,主要任务是将马恩列斯的原著译成各种文字。与这个外文出版局并列的还有一个外文局,将各国著作译成俄语出版。

一九四八年,李富春同志在东北主持编印了《毛泽东选集》

两卷集，这个本子未将《矛盾论》、《实践论》选人。杨志诚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给苏共中央寄了一本，据说，斯大林认为中共出的《毛泽东选集》很重要，要外文局译出来看看。于是，苏共中央决定把《毛泽东选集》全部译成俄文。当时在苏联的中国人一般只能俄译中，而由中文译成俄文则水平不行，只好请所谓“中国通”（即懂汉语的俄国人）来译。这些人没有古汉语底子，很多词句译不出来。我被委派给中国通答疑，解释如“坐山观虎斗”、“挂羊头卖狗肉”等成语，否则就可能出现将“胸有成竹”译成“肚里有棍”这样的笑话。为了翻译准确，特请李明（李立三）、陈昌浩校译，我们费了很大劲译出来后，苏联的语言学家说，这不是地道的俄文，而是照汉语语法译的俄文，简直要不得。怎么办？上面催得紧，只好将这份汉语语法的俄文译稿送上。斯大林看了说，先印三百份给苏共中央和有关领导看，不要正式出版。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毛泽东同志率代表团来莫斯科，我们将翻译毛选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他说：我的文章草成于战争年代，许多地方要推敲、修改，暂不要出版俄译本，得回国中央讨论后再定。后来，参加过译毛选的中国通费得林克来我国任苏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将毛选的俄译本交给我党毛选编委会审订。几年后，终于出版了毛选的俄译本。有了俄译本，再译成西欧其他国家的文字就容易多了。渐渐地，毛选风行于世。

李立三与陈昌浩

我在外文出版局与李明（李立三）、陈昌浩同一个办公室工作。说实话，我很同情他们的处境。他们在国内犯错误同共产国

际的瞎指挥有很大关系，事后共产国际一点儿也不承担责任，反而不承认他们的中共党员党籍，也不许他们加入联共（布）。革命一生，没想到在苏联成了无党派人士。一般工作人员下班后还有一些社会活动，社交活动，他们每天下班只能回家。工作上也总受针砭，他们译出的东西常常被一笔勾销，说“不是俄文”。

陈昌浩同志认为他在国内的工作有对有错，平时一言不发，上班就埋头桌案，紧张地校译文稿，下班后哪儿也不去。李立三同志话稍微多一点，承认他在国内的政策错了，常常叹气。有一天他干着干着，把笔一扔，说：“难道我一辈子就干这个?!”看得出，他十分怀念国内的斗争生活。我在苏联多年，几番欲归不得，很能理解他的心情，便安慰他：“何必这样短见？事情总会变化的。”他叹口气，拿起笔来接着又干下去。没想到过了不多久，七大时他被选为中央委员，欢天喜地地回国去了。我回国后听说，是毛泽东同志动员党代表选他和王明的，感到毛泽东对犯错误的各种原因都研究得非常透彻，很体谅这些同志的苦衷和处境，承认他们对党的忠诚，给他们重新站起来的机会，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终于回到祖国了

一九四七年，罗荣桓、王稼祥携眷来莫就医，住在共产国际的宿舍。他俩为我等向苏共中央请求放行回国，但回答说，工作需要，暂难解脱，过个时期一定准许他们回去。

一九五一年，我国驻苏使馆代办曾涌泉通知我准备回国，旅费由中方负担。四月八日，我由莫斯科起程，十八日到我国满洲里。我终于回到了阔别二十四年的祖国！（雪 情整理）

争取大刀会 打击敌伪军



范征夫同志一九四四年
十月摄于溧高栢淡港

四十年前新华社的一条电讯

范
征
夫

不久前，江苏省高淳县党史征集办公室寄给我一份一九四四年延安出版的一期《解放日报》的影印件，上面刊载了一条新华社的电讯，标题是《苏南溧水民众千余人奋起抗敌》，全文如下：

【新华社华中廿六日电】

我苏南三分区溧（水）高（淳）县安兴区花墙门一带民众千余人奋起抗敌，配合主力地方武装，打败敌伪连续进犯。花墙门为有几百户人家的大村子，距下坝敌伪据

点仅四里，敌伪企图“伪化”该地。但该地士绅民众皆不顾一切威胁利诱，发扬民族气节，并在民主政府帮助下，移住根据地中心区，粉碎敌寇“伪化”企图。最近民主政府又在该处成立游击小组，发给枪支，更加提高群众斗争情绪。六日黄昏，下坝伪军出发扰掠花墙门，我乡中队、游击小组及民众，即奋起将其击退，并俘伪军四名，缴枪两支。深夜下坝敌伪六十余再犯，企图报复，附近民众上至五十岁的老头子，下至十四、五岁的小孩子，均纷纷拿起枪支、大刀、锄头、钉耙等器械，奋起抗击。我安兴区大队亦加入战斗，形成相持局面。至清晨我溧高大队一起赶往增援。同时，东坝、定埠敌伪共百余人，亦分路来援，遂发生激战，我新四军某部又派队前往助战，当将敌伪全部击溃，我军民直追至下坝，焚毁其堡垒两座，并活捉鬼子一名。当我作战获胜后，当地群众欢天喜地，沿途争看俘虏，斗争情绪更加高涨。

初看起来，这条电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我却知道它的不寻常之处。电讯标题中的“民众千余人”不是一般民众，而绝大多数是大刀会的会员，只有少数是我游击小组的成员。一般情况下，当时的帮会组织多是封建迷信团体，且常常为敌伪顽（国民党顽固派）势力操纵利用，和共产党、新四军作对，而花墙门一带大刀会会员千余人却在我民主政府领导下，同敌伪作斗争，这确实是统战工作的一大成绩。正是这一点，促使我写下这篇回忆文章。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延安《解放日报》关于大刀会抗敌的报道

大胆放手，因势利导

一九四三年十月，苏南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向溧（阳）高（淳）郎（溪）广（德）的敌人后方进军，收复和开辟了大片地区，急需大批干部，开展地方工作。我奉命从茅山地区丹阳县南调，到溧水苏南区党委及十六旅旅部驻地报到。区党委副书记兼行署副主任吴仲超同志找我谈话，要我到新开辟的高淳县安兴区去当区长。他对我说：“安兴区是高淳县的一个中心区，收复不久。原来国民党在那里有社会基础，情况相当复杂。你去当区长要十分注意掌握党的政策，迅速发动群众，建立区乡武装，打开局面。”接着，他把我介绍给新任命的高淳县委书记张光和县长

方克强，就这样，我到安兴区开始工作。

县长方克强，是一九四〇年我在太（湖）滬（湖）地区工作时的老相识，所以一见如故，比较谈得来。有一天我问他：“吴仲超同志说这里斗争情况相当复杂，是什么意思？”他说：“所谓斗争情况相当复杂，不仅是指这一带有日、伪、顽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妄图消灭我党我军和抗战力量，而且指这一带大刀会组织很普遍，他们的后台就是国民党专员汪国栋，此人背后操纵利用大刀会，造谣惑众，扰乱人心，抵制我们组织农会、发展民兵。对汪国栋利用大刀会的阴谋，决不能低估。”方克强同志还一再提醒我，上任第一件事要处理好与大刀会的关系，弄得不好，会出大乱子。他的一席话，使我想起来一九四〇年六月在横山（今当涂县属）县发生过的大刀会“暴动事件”，我新三团一个连受到很大损失，地方武装也被搞垮，我党政工作一度难以开展。想到这个“事件”，我感到责任重大，必须十分慎重，做好大刀会的工作。

我和安兴区委同志共同研究后，一致认为，对大刀会只能“智取”，不能“力敌”，更不能采取简单取消或不承认的做法。要从调查研究入手，弄清情况，然后再因势利导，把刀会群众逐步争取到我党我军这一边来。

经过一个时期的调查研究，我们发现安兴区各村均有大刀会组织，他们的头头称坛主、点传师，下设大师兄、二师兄……分头发号施令，掌管刀会群众。而这些坛主、点传师的一部分是原国民党乡、保长或地主、富农。至于基层大刀会会员，则大部分是贫苦农民，少数是流氓、地痞分子。坛主、点传师们利用一般群众经济困难和思想保守的弱点，向他们宣扬封建迷信，欺骗他

们参加刀会。这些头头们口头上说参加刀会可以“不受欺侮”，“保卫家乡，安居乐业”，实质上是蒙蔽这些会员，妄图把他们引入反对共产党、新四军的歧途，并阴谋在时机成熟时，寻找借口搞“暴动”，配合日伪顽，消灭我抗日力量。

为了接近基层会员，我们悄悄地进入大刀会活动场所——香堂，发现一到晚间，各村十六岁至四十五岁青壮年都聚集在那里，面对佛像，画符念咒，烟火缭绕，刀光霍霍，一个个高声大叫“刀枪不入，刀枪不入”，他们一发现陌生人进入香堂，立即十分警惕，把我们驱之门外。如何接近这些受蒙蔽的刀会会员，实在是一个难题。

正在这时，上级派了沈传清同志来安兴区任区大队副（我兼区大队长）。他告诉我未参加革命前，他本人就是一个大刀会的会员，对于大刀会的整套会规、行话、暗语非常熟悉，对会员的心理、习惯也非常了解。我本人过去做过一些帮会工作，对和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交朋友，还有点体会。于是我和沈传清一起，到一些香堂串门。尽管一些头头们阻挠反对，但沈传清和广大会员却称兄道弟，对答如流，一些贫苦的群众开始接近我们了。经过我们个别访问，多次谈心，打消了部分刀会会员对共产党、新四军的怀疑与顾虑，使他们敢于向我们讲真心话。有些会员就把一些有政治背景的坛主、点传师散布的什么“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中央军已到了东坝南边，新四军在安兴区蹲不长”这类谣言全部告诉我们。

大约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工作，我们把安兴区一部分村庄的许多大刀会会员争取过来了，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启发他们“抗日保家”的民族意识和觉悟。我们提出“好男儿不当亡国奴”、“好

汉子不受鬼子欺侮”，很快被一些贫苦的刀会会员接受。于是我们着手组织秘密游击小组，发给他们一些枪支、手榴弹，鼓励他们打击下乡骚扰抢粮的敌伪军，实行“保家自卫”。对于阻挠压制刀会会员、装神弄鬼、敲诈勒索、劣迹昭彰的刀会头子，特别是与敌伪军有勾结的分子，我们在掌握确凿证据后，则给以打击或逮捕。对于一些靠近我方的较为进步的刀会神职人员，则吸收其参加我乡保政权工作。通过这些措施，使刀会内部逐渐发生分化，许多人都拍胸脯说，“我们跟新四军是好朋友，谁反对新四军我们就和他拼。”

花墙门有六百多户人家，是安兴区的一个大村子，距离下坝据点只有四里路，大刀会会员比较多。我和沈传清常到那里活动，和那里香堂里一些头头混得很熟，和一些穷苦刀会关系更加融洽。我们发现花墙门刀会群众痛恨下坝敌伪军为非作歹，威胁他们生命财产安全，民族仇恨、政治觉悟比其他村子刀会群众高，早就帮助他们建立了秘密游击小组。他们要求发给枪支、弹药，我们也予以满足。他们多次提出要反击下乡敌伪军，希望我们支援，我和沈传清也满口应承。但教育他们做好准备，等待时机，千万不要“孤军奋斗”，脱离群众，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怒火终于爆发出来

一九四四年九月六日（农历七月十九日）黄昏，下坝据点一批全副武装的伪军，到花墙门催粮逼款，拉丁抓伕，气焰十分嚣张，群众非常气愤。当伪军到石龙口村居民家中抢劫财物时，被

花墙门大刀会会员包围起来，抓住四人，缴枪二支，其余四散逃回下坝据点。那天我和安兴区大队同志在安兴区北部山头村宿营，接到花墙门秘密游击小组请求支援的报告，随即派人送信给县警卫营（即电讯中的县大队）营长许智与教导员毛英奇，请他们派部队火速前来接应。同时，我和沈传清同志带了区大队六十多名同志跑步向花墙门村前进，赶到目的地时已是深夜，正值下坝伪军六十多人气势汹汹前来报复，花墙门游击小组及大刀会会员奋起反击，刀光闪闪，喊声震天。附近几个村庄的居民，上至五十岁，下至十四、五岁的男子，挥舞大刀、锄头、钉耙，纷纷前来参战。我和沈传清同志率领区大队同志迅速占领有利地形，用排枪向敌人猛烈射击，掩护花墙门游击小组及大刀会会员向敌人冲锋。这时伪军发现处于包围状态，就慌忙夺路退走，撤回下坝。

花墙门游击小组及大刀会会员见到区大队同志连声道谢，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们说：“新四军说话算数，在我们危急关头，赶来增援，真是有难同当呀！”当地群众见伪军被打退，情绪十分高涨，家家烧茶做饭，慰问区大队。接下来，我们与花墙门一带游击小组及刀会负责人，共同研究下一步如何办，大家认为敌伪平时骄横不可一世，这次吃了亏，决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调兵遣将，前来报复，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对付最坏的情况。我们当场决定，组织一批精干的游击小组及青年大刀会会员，埋伏在花墙门村附近，在区大队掩护下，出其不意杀伤敌人。同时，把花墙门一带村庄老弱妇孺，全部动员撤到中心区村庄去，并把粮食衣物尽可能带走，让日伪军再次侵犯时扑空。我们还派出侦察人员到据点附近侦察。我们原准备避开敌人正面火力，从侧翼突击，挫伤敌人锐气，迫使敌人退回据点。但是枪一打响，

情况完全出乎意料，长期压在群众心头的民族仇恨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花墙门千余群众一鼓作气，奋勇追杀，一直追至下坝，当场打死打伤日军十余名，焚毁碉堡两座，缴获一批武器弹药。战斗结束，整队归来，沿途群众争看活捉的日军及缴获的武器。县警卫营许智、毛英奇和我们一起向花墙门游击小组及各村大刀会会员表示热烈祝贺，到处呈现一派欢乐气氛。

统一战线的威力

花墙门战斗的胜利，从表面看来，似乎是群众自发性斗争的胜利，但深入研究一下，就可以发现，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威力发挥了作用。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还说：“把敌人营垒中被裹胁的人们，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军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对这些指示，我们过去体会不深，通过对花墙门大刀会群众争取、教育、改造的工作，特别是这次战斗的胜利，政治影响如此之大，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进一步认识到统一战线确实是我党的一大法宝。

花墙门战斗胜利后，广大刀会会员更加靠拢我党我军，许多人主动要求参加民兵组织。通过一个时期工作，安兴区大刀会基本上被我们争取、改造过来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四四年十月廿一日即距离花墙门战斗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敌伪顽三方互相勾结，在高淳县韩固区、漆桥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刀会“暴动”，残杀了我一大批区、乡干部及农会积极分子，形势一度恶

化，人心颇为不稳，靠近安兴区的一些刀会组织也被卷进去了。唯独安兴区的刀会组织，不仅公开表示不参加这次“暴乱”，而且严正声明，如“暴乱”的刀会波及到安兴区来，他们将迎头痛击，决不客气。这就再次显示了我党对刀会政策的巨大威力。这使国民党专员汪国栋之流非常失望。

花墙门战斗胜利后不久，溧高县委、苏南三地委曾在安兴区西金村召开会议，进行总结，我在会上汇报了争取、教育、改造刀会，发动群众的过程、做法，县委书记杨华、地委副书记李广在会上讲了话，他们代表县、地领导机关表扬和奖励了花墙门游击小组及参战有功的县警卫营和安兴区大队。在此后的一年中，安兴区民兵组织有了新的更大的发展，许多原来刀会会员正式参加主力部队，参加了共产党，担任了乡、连的干部，在抗日反攻及最后胜利阶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九八四年五月）

重庆谈判时担任毛主席 警卫的经过

唐 建 贵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同志就到重庆与蒋介石和平谈判，住在张治中将军的公馆桂园里，即上清寺中四路九十五号。当时我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特务营的一个连长，专做部长张治中将军的警卫工作。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张部长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乘专机飞赴延安迎接毛主席来重庆共商国家大事。到延安后，张部长由延安电示：毛主席到重庆后，由于会见的各方面知名人士较多，决定让出当时自己在重庆的住房桂园给毛主席作临时住处，他自己带同少数随员暂迁至复兴关梅园居住，夫人洪希厚等暂居郊逼山洞洞下；暂调张家惠部附（张部长的晚辈，长期从事事务管理工作）重新布置桂园。除留下少数服务人员外并令唐建贵在桂园担任毛主席的警卫任务。

张夫人洪希厚出身于农村，为人忠厚，爱护体卹部下和佣人，她从来不摆部长夫人的架子，许多事都亲自过问和动手布置。

当时我就向张部附说：“毛先生来重庆，不是事先决定住在‘林园’（即是国民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住的地方），为什么现在

又改变了计划？”张夫人说：“不用多说了，你就准备警卫工作，张部附料理家里一切。宝宝（张老的小儿即张一纯）和素久小女搬到门房里去住，就近上学（求精小学）。其他人有的随部长去‘梅园’住，有的跟我暂去山洞洞下。”

八月二十八日，是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下午我跟随张夫人同车开赴距离重庆四十华里的九龙坡机场，当专机降落在机场上时，张夫人和我们迎上去。机门打开时，首先出现的是毛先生，其次是赫尔利大使，第三是张部长。当时迎接的人很多，包括《新华日报》社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所有工作人员。张夫人迎上去后又退回来，因为她与毛主席尚不认识。从这时起，我即担任毛主席的警卫任务，为防范特务们的破坏，我亲自率领便衣卫士在毛主席周围警戒。

毛主席、张部长和夫人同坐一车，我也随车回桂园。

为了毛先生的安全、生活和办公方便，张部长找我作如下的指示：

1. 派唐建贵精选一个手枪排担任毛先生和周先生的警卫。
2. 凡来找部长的亲友、宾客，一概谢绝；如有人要见毛先生，统由王炳南秘书接待，不得阻拦。
3. 警卫毛先生的人员，要分两个班。
4. 必须保持周围环境安全、安静。围墙竹篱年久枯烂，要特别检查、监督。并再三强调说：“这次是考验部下。毛先生的安全胜过我十倍。”
5. 部附张家惠专管毛主席生活和“桂园”的事务工作。尤其是毛主席三餐饮食，要注意做好。另派洪兴华（女）专为毛主席和随行人员洗衣被和清洁卫生工作。

6. 如遇有什么困难事，随时可与张立钧参谋商办。

我第一次正式面见毛先生，是到他的办公室去，介绍一个专门侍候他和周先生的“勤务兵”何守银。毛先生站起来很亲切地和我握手，周先生已是见面多次了。他即向毛主席介绍我说：“就是他负责警卫，请放心。”毛主席接着说：“我这次是应张先生邀请到重庆，是为人民事业而来的。”接着问我出身，跟随张部长多久？现任什么职务？我一一简要答复：“我是行伍出身，自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即在张部长身边担任警卫工作，现任连长。这次先生来重庆，住在我们的家里，张部长调我为毛先生和周先生的手枪排长。”周先生在旁说：“唐排长和我是熟人。从现在起，你就是毛主席和我的手枪排排长了，这是我口头任命的。”说完大笑起来。从这天起，周先生每天要和我谈一两次话，了解警卫情况。

这时国民党人士和张家亲友都想见见毛先生，我根据规定，一概谢绝，遭到了不少人的非议。

中共和谈代表中的李克农，还有董老必武和王若飞先生，经常与我见面，所谈都是涉及有关毛主席在重庆安全问题。

毛先生在八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在桂园宿夜，以后每晚十二时前往红岩村八号，即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住宿，由周总理陪同乘车，我即乘警卫车护送。第二天上午八时左右前往迎接毛先生回到桂园办公。

那时蒋介石住在我们对面，特务头子戴笠住在附近的曾家岩，街上常有特务、宪兵监视过往行人。

桂园的围墙年久失修，是我们警卫工作的重点。毛先生来了以后，围墙外面又增加了许多化妆成乞丐、小贩、摆摊的特务。

这些特务和我的警卫人员经常争吵、打架。如果任其下去，可能发生更大的事故。我即向上汇报，张部长冷静思索片刻，即令张参谋电话通知宪兵司令张镇，说明情况。张镇在不得已情况下，亲临桂园查看。周先生从全面考虑后，商得张部长同意，决定门卫还是派宪兵警卫。内围由我警卫。可是宪兵休息仍在我们的汽车房内，我对他们是不放心的，又抽一部分精干得力人员，在内围增加岗位。我对毛先生的警卫工作是有信心的，因为警卫人员跟随张部长多年，可以说个个顶用，我也自信久经考验有勇有谋。

毛先生在重庆时，求见的人很多。如《新华日报》社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人员以及学者、知名人士柳亚子、田汉、洪深……等，都是秘书王炳南同意后，方可进去。有一次郭沫若来，被警卫人员阻拦，发生争吵。原因是张部长指示过，凡是国民党人员，一律不准随便进入，郭又偏偏说：“我是以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身份来拜访毛主席的。”警卫人员据理力争说：“我们只执行部长的命令，他人一概不听。”我闻声赶来，向郭婉言解释说：“虽然我们都在张部长领导下工作，还是要按部长的规定办事，国民党人员一律不准入内。”后王炳南秘书出来排解，才算了事。

国民党中央大学在化龙桥，属沙磁区，所有高等院校都集中在此地，也是当时重庆的文化区。有一天周先生对我说：“毛主席要到中央大学去演讲。”我马上踌躇起来，周先生即说：“你拿出在长沙保卫张部长的劲头来保卫毛主席就行了。”当晚我召集全体警卫人员讲明这一情况，调选精干十二名，化妆成大学生，每人发一百粒子弹分装四大匣，由杨排附带队，按照平时所

学的警卫方法和操作规程随机应变去做。会场我事先又未观察，只好看情况办事。为避免暴露，这十二人分批乘公共汽车前往，我乘警卫车跟随毛先生同往。这天上午十时，毛先生走进大礼堂主席台，开始讲话，大意是：一、抗日经过；二、和平方式解决国家大事；三、勉励学生努力学习。虽然学生们静听，但仍有不少特务混入会场。当毛主席讲完走出礼堂门外，学生们高喊“毛主席万岁！”少数特务也喊出不好的口号。我指挥便衣警卫人员迅速靠拢毛先生和周先生身边。当时我穿的是军服，又戴少校衔领章，目标太露，引起学生们齐声喊“打死狗军官！”当我们急匆匆拥毛先生坐上汽车回到桂园时，我已汗流浹背。正休息时，毛先生和周先生对我亲切地安慰说：“这是一场正气压倒邪气的斗争。”我当即建议：“今后如再访客时，事先最好不要通知对方。”他俩都说：“你言之有理，你是我们的好朋友。”

第二次毛主席在电影制片厂抗建堂演讲时就没有上次紧张了，因为已有警卫一排在该厂服务。以后毛先生出访或赴宴时，事前都未通知主人，临时才说，如访问陈立夫、罗隆基、章伯钧等都是如此。

毛先生在桂园会见中外记者，也有特务混入。为了安全，我采取果断措施，所有记者，先行登记，并言明携带物品必须检查，如有武器必须交存，凡是照像机、钢笔……都要查一查。当然记者们对此不满，但为了毛先生的安全，也顾不得许多了。

双十协定签字前，周先生就对张部长说：“最好签字后毛主席即动身返回延安。我们对毛主席回延安，有些不放心。最好是由你陪送主席回去。”张部长慨然答应说：“由我接来，还应该由我陪送回去！”

张治中将军为了庆贺国共和谈成功特在军事委员会大礼堂举行鸡尾酒会欢送毛先生，邀请在重庆的各党政军最高负责人和文化界知名人士作陪，盛况空前。我们警卫人员早已到场布署，蒋介石的侍从人员也不少。

在张部长致词后向毛先生敬酒时，周先生急匆匆到张部长身边耳语，看到部长面色突变，我在旁不知所措，思想上非常紧张。招待会在上午十一时结束。

回到桂园，才听说是何香凝的女婿李少石在化龙桥被国民党新兵枪杀。这可给我敲了警钟，不能认为毛先生在重庆已有四十天，未曾发生什么事情，就思想松懈，这最后几天要特别加强警卫。

毛先生离开重庆前夕，在桂园会客室设宴，由周先生出面代表他慰劳我们全体警卫和工作人员，并表扬我们说：“我们这次来重庆四十多天了，你们对我们的服务和安全，够辛苦了。”说完即向我们敬酒。周先生还将宝宝（张一纯，现任北京市政协委员）抱在怀里，又在他的小日记本上留言：

“光明在望，前程万里。新中国是属于你们青年一代的。

一纯此兄

周恩来

卅四年十月

十一日”。

晚间，王炳南秘书将在延安自制的红毛线赠送每人一斤，另赠送给我一套灰呢制服料和法币万元。

十月十二日上午八时，我们护送毛先生到珊瑚坝机场，张部长偕同侍从参谋张立钧陪同毛先生坐上专机。

在未上机前，毛先生与《新华日报》社、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全体欢送人员合影。

专机起飞了，我们也回到桂园，庆幸任务圆满完成，虽然人人都瘦了些，但精神上宽慰愉快，这四十多天，是终生难忘的。

（杨先礼整理）

李德其人

费侃如



李德像

李德，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称他为“那个外国智囊”。这位共产国际派驻我党的军事顾问因是红军长征队伍里极少的几个外国人之一，又出席过遵义会议而蜚声全球。李德不只是一般的军事顾问或驻华代表，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度直接掌握了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在军事指挥上实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及长征初期遭到的重大损失，负有直接的责任。他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王明左倾教条、宗派主义和军事冒险主义的积极推行者和决策人。

从上海到瑞金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在中国期间化名叫奥伯特·李德和华夫。一九〇一年，他出生在德国慕尼黑附近，青年时代加入德

国共产党，参加过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和德国中部的工人起义。一九二六年因与苏联秘密机关联系被捕，监禁在柏林莫比特监狱，两年后在德共的营救下越狱成功，接着很快被转送到苏联，参加了苏联红军。由于他在德军中当过军士，有一些作战经验，所以很快晋升为骑兵师的参谋长。后来他又被选送到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

一九三二年初，李德以优异的成绩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随即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担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经西伯利亚、满洲里、哈尔滨，于秋天到达上海，住在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几天以后，他与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的代表阿瑟·尤尔特取得联系。在上海时，他曾与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相识，并通过史沫特莱搜集的材料，对中央苏区的一些情况，有了粗略的认识。

一九三三年春，临时党中央大部分负责同志都先后离开上海去中央革命根据地，李德主动提出也要到苏区去，中央上海局立刻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报告。（此时王明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夏天，“中央上海局接到共产国际命令，派遣这位德国人、年轻的军事代表去瑞金，以便在那里就地提出咨询意见。”上海局立即着手安排李德赴苏区的一切准备工作。

一九三三年九月底，李德以旅行者的身份乘一艘英国海轮离开上海，经过一夜航程到了汕头。在这里，李德根据预先约定的暗号，与化名“王牧师”的我保卫机关联络员董健吾见了面。第二天一早，董健吾带着李德乘车到达潮安县城。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李德经董健吾的安排，悄悄地上了一条小木船，董健吾就匆匆离去了。我地下交通员请李德平躺在狭小昏暗的船舱内的一床草席上，盖上舱板，任凭小船颠簸起伏，沿着呼啸的韩江河水

上溯，途中多次遇到国民党岗哨上船盘查，都被我交通员机智应付过去。整整过了两天三夜，船到了埔北（青溪）。李德趁着月色，从舱板下爬出，拍去身上的灰尘，上岸与红军派来的武装交通员接上头。交通员们簇拥着这位身材高大，头上戴着一顶大草帽，脸上用毛巾遮掩着的外国人，白天在树林里睡觉休息，夜晚有时骑马，有时步行，翻山越岭，沿着坎坷不平的山路行进，经过了两天两夜，终于通过了敌占区的永定、陶坑，平安地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李德是唯一通过这条秘密交通线进入瑞金的欧洲人。

由于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又是外国人，党中央和军委对远道而来支持中国革命斗争的李德都很尊重，特别重视，立即给他配备了翻译、警卫员、炊事员和饲养员，在军委驻地沙州坝附近选择了一幢环境幽静，周围都是水稻田的房子，供他办公和居住。为了确保他的安全，房子周围戒备森严，红军内部都把李德住处称为“独立房子”。同时，在当时苏区物质条件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在生活上给他优厚的待遇。李德嗜好抽烟，凡是打仗缴获到和白区弄来的香烟，也都优先供给他享用。李德喜爱骑马，常在晚饭后和翻译伍修权、王智涛及警卫员们一起骑马到附近乡村跑一趟。

“太上皇”

李德到达瑞金时，正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当时红色区域中央局领导人博古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回国不久，是一个只二十六岁的青年学生，既未学过任何军事知识，又毫无领导战争和革命的实践经验，面临着一下子担负领导全国革命和大规模

的反围剿战争，确实有些束手无策。原在上海就已相识的李德突然到来，博古如获至宝，马上请李德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还负责对部队的训练和后勤组织等工作。

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要绝对服从的。特别是博古，对共产国际更是言听计从，不顾中国革命斗争的特点和实际情况，一切唯国际马首是瞻。博古授予李德全权，打算通过李德来加强自己在领导指挥上的威望。这对李德来说，不啻如鱼得水，忘记了自己的职务只是一个顾问，并无下命令的权力；更把离开上海时尤尔特一再嘱咐的“要在党政军领导中有争论的势力之间做些和解工作，……一切决议最后还是应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瑞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的忠告抛到九霄云外。

十月初，在“独立房子”里召开了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毛泽东、项英、刘伯承等。在会前，经博古介绍，李德与毛泽东第一次见了面。这次会议小结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的经验，对已经开始的反五次围剿战争要采取的战略战术，进行了讨论研究。会议进行过程，名曰讨论，实际上是李德开始发号施令，把欧洲打阵地战的经验和苏联红军的军事条令，硬搬到敌强我弱的反围剿战场，贯彻到创建不久的中国工农红军中去。

由于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也从未认真分析过战场的实际情况，一人躲在屋子里凭着简单粗略的地图指挥作战，用比例尺从图上量得的距离来推算路程、决定战斗的兵力和时间，这种主观主义的瞎指挥给红军指战员的行动带来了很大困难，虽经红军战士英勇奋战，还是常常因遭到不应有的失败。

一九三三年九月，敌军攻占了黎川城。对敌人即将到来的更大规模的“围剿”，李德在军事上仍不作准备。十月七日，红军在洵口与敌遭遇，经我红军浴血奋战，歼敌一个师。此战本是初战胜利，而李德却被暂时的胜利所陶醉，强令红军采取“全线出击”，趁此收复黎川城以“御敌于国门之外”，贸然于十月九日至十三日令红三军团进攻敌二十四师守备的巩固阵地硝石。一战不胜，又令红五军团进攻敌十一师守备的坚固据点资溪桥，又不胜利。此后，红军只得辗转在临川、黎川、金溪地域敌人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了被动地位。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国民党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事变，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并表示愿意接受我党提出的“停战议和，共同抗日”等三个条件，实行联合。在这对我十分有利的形势面前，李德却对博古说：蔡廷锴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蒋介石还危险，有更大的欺骗性；蔡是小军阀反对大军阀，因此红军决不能支援蔡廷锴的福建人民政府。正如周恩来一九三六年七月九日同斯诺谈话中指出的：“我们本来是能够成功地和福建合作的。但是由于李德和上海顾问团的建议，我们没有这样做，反而撤退了，在瑞金附近对蒋介石集结的部队发动了进攻。这使蒋介石能够迂回包抄十九路军的侧翼并消灭了他们。”

第十九路军失败后，蒋鼎文在福建就任东路剿共总司令，反转过来说集中全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攻，于是敌对我合围之势遂成。

一九三四年一月，李德列席了在瑞金举行的我党六届五中全会，开始在政治上军事上占据了高位。

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红军就在李德错误军事思想指导下搞

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遭到失败后，又不根据战争发展的实际情况，犯了战略指导上防御时的保守主义错误，要红军分兵把守，堡垒防御，搞“短促突击”。一九三四年三月，敌军占领建宁、泰宁地区后，集中兵力于北线，企图首先占领广昌，打开苏区北面门户，而后再直捣我根据地中心。这时，红一方面军前方司令部撤回瑞金，组建了临时司令部，博古为政治委员，实际上李德成了总司令。他俩亲上前线，指挥保卫广昌的战斗。此时，“从各方面看来，……李德已经在实际上取得了军事上的最高指挥权。这样，李德不仅取代了朱（德），而且排斥了周（恩来）。”四月十八日，敌军开始沿汝水两岸在十华里的正面上采取堡垒战术和交替前进的方式向广昌进犯。红一、三、九军团在李德具体指挥下，以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结合“短促突击”战术，在四十华里的战线上，与敌激战十天，虽然红军作战英勇顽强，给了敌人一定的杀伤，然而因战略指导的根本错误，小胜无补大局，终于在二十八日失去了广昌。

广昌战斗是李德到苏区后第一次亲自指挥的较大的战斗，也是李德不根据中国实际情况瞎指挥作战的一次比较典型的战例。就在战斗停止的当天，李德和博古在前线约见红军战场指挥员彭德怀和杨尚昆。对这次约见，彭德怀曾经作过精彩的叙述：“见面时，李德还是谈他那一套，如何进行‘短促突击’，如何组织火力。我说，怎样去组织火力点？根本没有子弹！在敌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就有十次失败，几乎没有一次得到成功的。我尽情地、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大胆地准备遭受个人的不幸，说，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讲了四次‘围剿’被我军粉碎以后就没有打过一次好仗，主要是方面军指挥上的错

误，就是主力不集中。我举了下面的几次战斗例子：团村的待伏战斗，如果一、三军团不分开作战，集中使用，就能消灭敌军三个师十五个团；我们就能缴获枪弹、俘虏敌兵，补充自己的战斗消耗。现在每战都同敌人拚消耗。敌人有全国政权和帝国主义帮助，我则靠取之于敌，你完全不懂这条道理。洞口遭遇战消灭敌人一个师，想停止半天消灭被围之最后一个营都不准，前方指挥者都没有这样的机动权，硬要叫军队钻到硝石，几乎把三军团让敌人消灭掉。我还说，你们坐在瑞金指挥的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灭，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地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只是问测的，有时方向都不对。我说，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你送掉了。我还说，这次广昌战斗你们看到了吧！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中央苏区从一九二七年开创到现在快八年了，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了，可见创造根据地之不易。‘崽卖爷田心不痛’，被送掉！”彭总对李德的瞎指挥，怒斥得何等痛快淋漓！李德虽然大为恼火，但他知道彭老总不好惹，只好说彭总是封建脑筋。

由于博古迷信洋教条，继续庇护对战争失败负有很大责任的李德，关系着我党我军生死存亡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然把持在李德一人手中。一九三四年五月，李德用华夫笔名在《革命与战争》报上发表《反对曲解我们的战术》一文，竭力为他们错误战略战术方针辩护，继续鼓吹“短促突击”。李德为强制推行其错误的战术方针，在党内、军内实行专制主义，搞宗派，大大发展了惩办主义。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节节失利，部队不断减员，李德面对日益严重的危机一筹莫展，可是他毫无自知之明，自己

不仅不承担责任，反而迁怒于人。闽赣军区司令员肖劲光、总参谋长刘伯承、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三十四师师长周子昆等部队高级指挥员都因对李德的战略战术不满，发生过争论，于是有的被军事法庭判了刑，有的被革职调离，有的被绑进了国家保卫局。李德这种粗暴蛮横、独断独行、极端恶劣的领导方式和作风，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是极其典型而又罕见的，造成党内、军队内部人为的严重危机，这也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给李德作翻译的伍修权曾深有体会地说：“他（李德）名义上是军事顾问，实际上是统帅，是‘太上皇’。”毛泽东后来也说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而具体推行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正是这位凌驾在党中央之上的“太上皇”——李德。

被“轰”下台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在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的瞎指挥下，终不能打破优势敌军的残酷围攻。红一方面军主力连同中央机关被迫突围西进，开始长征。

长征开始后，李德面对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从骄横跋扈又变为惊慌失措，命令红一、三军团各在左右，红五军团殿后，掩护着中央纵队及骡马辎重缓慢地向前移动。这种消极防御作战行军，使队伍常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十二月十一日，红军经过浴血奋战过了湘江防线攻占了湘西南的通道县地域。这时，红军在短短两个月的殊死战斗中，已由三十万人减员到三万人左右，

笔直的行军路线，使蒋介石察觉红军欲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急调四十万兵力，妄图在半路上一举围歼我军。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毛泽东怀着高度的革命责任心，提出应立即放弃原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防御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个意见得到大多数中央负责同志的赞同，然而李德却不顾红军面临与优势敌军决战的危险，坚持“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并认为“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对李德一意孤行，不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来制定新的作战方针的错误作法，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连博古这时也认识到“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可见李德已孤立到什么程度。为了挽救危急中的红军，党中央和军委不顾李德的竭力反对，命令红军转头向贵州前进。李德的指挥棒不灵了，他头顶上的“军事权威”的彩色光圈，在我党高级干部一致觉悟下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但李德这时仍然掌握着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通道转兵后，摆在红军面前的道路仍然是艰难困苦而又遥远的，许多指战员一边行军，一边议论党和红军的前途。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向黔北进军途中，忧虑地对毛泽东说：“这样下去红军就不行了！”后来，他干脆地表示，要把李德“轰”下台。经过毛泽东、王稼祥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大多数高级干部都不同程度认识到，不能再让李德瞎指挥下去了，应尽快把这位红军头上的“太上皇”“轰”下台，才能避免更大的灾难，让毛泽东出来指挥部队，红军才有可能摆脱敌军的围困。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下旬，红军到达乌江地域，李德等又不知

按照新的情况变化提出在川黔边转入反攻歼灭蒋介石的追击部队，而只看见消灭小部黔敌以及消灭所谓土匪的任务；为此，中央政治局在候场举行会议，对红军的战略问题和近期的军事行动进行了讨论，最后一致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使红军摆脱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应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建立川黔边新苏区，否定了李德的错误主张，并强调：“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从而对李德拥有的最高指挥权作了组织上的约束。

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红军一举攻占了黔北重镇——遵义。中共中央在老城红军总部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十人，列席会议的有中央机关和红军总部以及各军团主要负责人，李德也参加了会议。

与会同志以大量事实，着重分析批判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和长征出发后在军事指挥方面所犯的一系列原则错误，特别是红军指挥员们，根据自己在战场的亲身体会，对博古、李德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总司令朱德在会上指出，党中央负责人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后，完全依靠李德来指挥，弄得丢掉根据地，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牺牲了多少战士的生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他表示：“我从井冈山开始就是跟毛泽东革命的，今后我永远跟着毛泽东革命到底。”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指出，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

事，李德都要横加干涉，使指挥员不能根据敌情变化灵活指挥作战，失去了许多有利于我的战机。彭德怀、杨尚昆等同志在会上均指出李德在军事指挥上不灵活，一味强制部队机械地分兵把口，搞“短促突击”，致使红军行动失去机动性，在敌人的密集火力下造成痛心的重大伤亡。军团首长们对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极端恶劣的领导方式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他们指出，很多意见和建议在前线是不敢提的。甚至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变动了军委的部署而打了胜仗，也吓得睡不着觉，怕与军委意见不同就是对战争的动摇，怕机会主义、反革命的帽子扣上来。与会同志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大胆地说出了长期积压在心头的意见，个个扬眉吐气，精神振奋，把李德“轰”下台已是大势所趋。李德自己也有所感觉，“因此，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别人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他完全象是处在被告席的地位上。……他一边听一边不断地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为自己和王明等人的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说自己本来只是作为顾问提提建议，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他把责任推到临时中央及别人身上，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毕竟是理不直，气不壮，没有说出什么道理。……李德本人也意识到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不得不听取大家对他的批判发言。”经过充分讨论，根据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和要求，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分工负责军事，并决定“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过去，党中央的历次重要会议，都是在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的指令下举行的，而遵义会议不仅不再接受共产国际派驻我党

的军事顾问李德的瞎指挥，还对这种严重脱离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领导方式和作风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为挽救濒于绝境的党和红军，断然取消了李德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立场来解决中国革命进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复杂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重要标志，它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李德在遵义会议终于被“轰”下台来了。斯诺曾说：“这次经历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可以从中受益。把全面指挥一支革命军队的战术的大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这样的错误，以后大概是决不会再重犯了。”

北上途中

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开始恢复了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迅速北进。党中央根据李德自己的请求，让他随红一军团行动，这是为了“能够在前线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所大肆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不久，李德又被安排在中央纵队，随部队四渡赤水河，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在此期间，李德曾经出席了党中央在会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八月底，李德到红军大学任教，随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右路军行动。九月，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开始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一天凌晨，李德匆匆到红大总支书记莫文骅住处，急忙告诉说：“快起来，中央决定北上，命令即到。你

把身边的人组织好，要密切注意李特（红大教育长、原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引者注），不要让他把队伍带走。同时，防备他整你。”莫文骅当即把红大教师和学员迅速集合起来，趁天还未亮，整装待发。就在这时，李特骑马赶到，向着红大学员队伍大声传达张国焘的命令，煽动从红四方面军来学习的同志“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学员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李德突然疾步上前，拦住李特，三言两语就把李特从马上拉了下来。两人用俄语吵了起来，“李德不许他胡闹，要拉他去见毛泽东同志。并再三说明北上抗日是正确的方针，不经毛泽东同志的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把部队拉走。”由于李特不肯去见毛泽东，两人情绪越来越激昂，拉扯着纠缠在一起，李德骂李特是“流氓”，而李特骂李德是“赤色帝国主义”。这就是红军北上途中许多老同志记忆犹新的“二李之争”。

李德在遵义会议上虽然对同志们的批评缺乏认识，不承认自己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犯了严重错误，可是在党中央与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时，他是拥护中央北上抗日路线的。当时在场的彭德怀也说：“……李德在中央苏区犯了错误，这次表现很好，站在正确的方面，放回一方面军当干部。”李德能够与张国焘的心腹李特作斗争，说明李德同存心搞分裂的张国焘、李特是有区别的。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党中央为了研究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也着重深入揭发批判张国焘分裂红军，退却逃跑和军阀主义等反党错误，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并相应作出了三项组织决定，李德被任命为编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

维汉为委员。

李德随着右路军经过艰苦行军，走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原，迅速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过六盘山，于十月中旬抵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年夏天，中央决定在保安县城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李德在这所设在石洞中的大学课堂里，向红军高级指挥员讲授兵团战术，并帮助训练红军骑兵。李德除了教学训练之外，仍然喜欢一人孤零零地住在山顶上的一个窑洞里。他“也是个艺术鉴赏家，藏着许多拉瓦尔德布西等的唱片，他又是苏区内非中国文字印刷物的每一行的阅读者。他的最合群的行动，是和他的朋友打网球、玩纸牌戏。”李德在经过两年多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后，深有体会地对斯诺说：“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的。他说：‘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

一九三九年夏天，李德奉共产国际命令，与赴苏联治病的周恩来同乘一架美式道格拉斯飞机经兰州、哈密、乌鲁木齐、阿拉木图、塔什干，飞往莫斯科。李德作为共产国际派驻我党停留时间最长的军事顾问，也是共产国际驻我党有正式名义的最后一名外国人，离开了延安。

离华以后

李德回到莫斯科后，共产国际执委会负责人批评了他在中国所犯的错误，被分配在出版单位做翻译工作。一九四一年到克拉

斯诺戈尔斯克一所学校任教。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他在苏联红军中任职，负责一个部队的政治工作。一九四八年他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柏林马克思列宁研究所主要从事翻译工作，把苏联的政治、文学著作翻译成德文，并任该所列宁著作德文版主编。

一九六四年，李德顺着国际反华逆流，在德国统一社会党机关报《新德意志报》上发表《毛泽东以谁的名义说话？》一文，攻击中国共产党，诽谤毛泽东主席，开始为他在遵义会议受到的批评作翻案的舆论准备。一九六九年，李德再次积极配合国际反华大合唱，连续在《地平线》周刊发表了《从上海到延安》一文，借写回忆录，不同程度地歪曲史实，攻击我党，反对毛泽东等同志。一九七三年，李德查阅有关文献资料后，把原回忆录整理加工成书，以《中国记事》作书名，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迪茨出版社出版。他在书中记述了我党领导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些重要事件，对我党和共产国际、国民党的关系，以及抗战初期的一些情况，作了评述。《中国记事》用了较大篇幅为他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所犯的错误辩护，强词夺理，夸大客观原因；特别是对遵义会议取消他最高军事指挥权耿耿于怀，把在延安向斯诺谈的心里话忘得一干二净。李德在该书中还打着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军事顾问招牌，用直接参与了近七年中国革命战争的经历作炫耀资本，为自己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的巨大灾难开脱罪责，这只能表明他已是心劳日拙了。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五日，李德在柏林去世，终年七十三岁。

海军起义将领毛却非 烈士小传

简阳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组

毛却非烈士原系国民党海军美颂号军舰舰长，一九四九年十月，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毛却非决定率官兵在香港起义，因事机泄露，起义失败，光荣牺牲。

烈士的爱人马健英率子女于一九五〇年自台湾辗转回到大陆后，受到我军有关方面的热情接待和照顾，现在故乡安度晚年。

——编者

学 校 生 活

毛却非原名富儒，一九一一年出生在四川简阳县城外西缘溪河边一个贫农家里。父亲毛华权在石桥镇一家小商店作店员，家中有祖母、继母一妹四弟。父亲工资微薄，照顾家庭甚少，全靠祖母、继母租田数亩，勤耕苦做，维持家人生活。

却非在小学毕业后，无力升入初中，听说上海有半工半读的，便一心去做工读书。他千辛万苦到了上海以后，才发现上海



毛却非烈士像

并非理想中的天堂，半工半读的机会全未碰上，仍由父亲告贷钱财资助，才考入上海浦东中学。读完初中以后，又考上杭州高中。这时，他对近代史非常专注，每读到鸦片战争以来，祖国大好河山屡遭列强侵略，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种种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史料时，都感到万分悲愤。他深恨清朝和民国以来的反动政府腐败无能，祸国殃民。一颗爱国之心促使他认识到，每个中国青年都应当发愤学习，振兴中华，以雪国耻。

毛的好友华薇莉曾见到他写的一首题为《人生》的诗：“前除幼年后除老，还除疾病与烦恼，睡眠又占几小时，读书时间有多少！”

却非在上海读书时，曾与一些进步同学暗地转抄《国际歌》偷偷地学唱，他读高中以后，更加喜爱这首歌曲。那时他对现实是不满的，但又不知道应该怎样去改变这个现实。《国际歌》一曲传来，使他逐渐明白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的真理。

高中毕业那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却非积极地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并组织起一批进步同学到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出兵抗日，结果受到国民党军警的毒打。却非带着伤痛和义愤回到杭州。不久，他变卖了书籍作盘费，去镇江考入电雷学校。后来，电雷学校与海军学校合并，却非被编在航海班学习。卢沟桥事变

后，该校迁到四川万县狮子寨。这时，蒋介石手下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沦陷区不断扩大。却非忧心如焚，他感慨地说：“中国陆军之于日军，如鼠畏猫；中国海军则如僵尸一具。”当时他邀集几个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在学校附近举办“露天民众学校”，借以向广大民众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一九三八年夏天，却非又和一些进步同学秘密组织起一个“中国海军再生运动会”，不久被学校当局发觉，勒令解散。却非对此十分愤慨，曾写诗一首寄给华薇莉，其中有这样几句，“人生百年，黄土一堆。树高千丈，不怕风吹。……畏首畏尾，身其余几，我行我素，无私何惧。”这首诗道出了毛却非不怕风险，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这是他后来毅然起义，壮烈牺牲的英雄行为的思想基础。

一九四〇年，毛却非在海军学校毕业了，但由于蒋介石消极抗日，武汉早已失守，祖国的半壁河山沦陷在日寇手中，长江上游被封锁。蒋介石虽办起了海军学校，但海军力量极其薄弱，因而毛却非在海军学校毕业后就失业了。英雄无用武之地，他只得回到自己的故乡——简阳家里。

一九四〇年下半年，却非和海军学校的同学黄震白，经友人华薇莉介绍在简阳初级中学教书，却非教数学。开学的第一堂课，却非并没有讲数学，却别开生面地从这期招生讲起，他说：

“在招生口试时我问一个考生：‘日本打进中国来了，祖国半壁河山已沦陷在日寇之手，我们应该怎么办？’考生回答说：‘打来了就跑。’又问他：‘跑到什么地方去？’答：‘跑西康西藏去。’”却非讲到此很气愤地讲：“跑、跑、跑，中国都快亡了，如果再这样跑、跑、跑，退、退、退的话，我们大家只有当亡国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个国民都有抗日救亡的责任和义务。要

不当亡国奴，只有团结起来，奋起抗战，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收复祖国的大好河山，……。”据邱瑞良同志回忆，这一堂课，他反复讲了许多抗日救亡的道理，讲得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全班同学无不为之感动。直到下课以后，有的同学还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有的纷纷议论，表示要到前线去打日本鬼子，收复失地。

在海军中的活动

为了抗日救国，毛却非于一九四一年又去万县找到一些同学，进干部训练班工作，次年又到一艘小炮艇上任艇长。这时，却非因父亲病故，奔丧回家，办完丧事后便将未婚妻马健英接到万县结婚。一九四四年冬，却非听说海军当局要送他去美国学习，就将爱人马健英和一岁的女儿送回老家简阳，结果未能赴美，仍继任原来工作。

一九四五年秋，日寇宣告投降。蒋介石为了争夺胜利果实，一面靠着美国海空军运输大批军队去抢占大城市，一面依赖美国提供的军事援助扩充武装力量。这时，毛却非奉调到青岛，在中建号军舰上任枪炮官。四六年春，他请假回家接眷属，路过南京时，国民党海军当局调他到伏波号军舰工作。却非回简阳携带妻子儿女路过万县时，伏波号军舰被商船撞沉遇难，于是抵上海后改任联荣号登陆艇艇长。

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公开撕毁了与共产党达成的《停战协定》，疯狂地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枪炮声震撼了毛却非的心灵，使他坐立不安，经常独自徘徊，默默无声，对家里的人也很少说话。他在想些什么，连他的妻子也无从知道。他每天总是按

部就班地从家里到船上，从船上到家里，直到四八年春天。这时，蒋介石的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毛却非在海军学校的同学杨沧活经常到他家作客，二人相谈甚密，有时相邀出去一二日不归。一次杨开着汽车来邀却非去开会，临走时杨对马健英说：“如果有人来找却非，你就说他春游去了。”却非回家后，妻子问他到哪里去？开什么会？他只说他们经常都要开会，地点不固定，但从未说开会的内容。一天，杨同一个中年人来到毛家，说是杨的亲戚，与却非密谈很久，最后从后门悄悄出去。几天以后，却非很郑重地对马健英说：“我考考你，假如有一天来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叫你带着孩子跟他去，你怕不怕，你舍不舍得你的衣物用具跟着他走呢？”马还未回答，他又说：“告诉你，我已是共产党那边的人了。你听到也不要害怕，应该有思想准备。说不定我哪天会出事。如果真的出了事，组织上会派人来照顾你们的。”又说：“万一出了事，若有人来向你问我的情况，你就说自己是从小农村来的，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从这以后，却非就很少出门了，客人却多了，这些客人到毛家，有时打麻将，有时玩扑克，他们都把毛妻称为“表嫂”。每当他们来了，却非就叫妻子去外面望哨，如遇有生人闯来，就给里面打招呼。时间久了，马健英逐渐认识了来客中的一些人，却非告诉她说，他们成立了一个小组，有杨沧活、王显群、姜伟衡等人。一天晚上，杨开汽车把却非接去，深夜未归，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回家。他说因发现有人“盯梢”，经多方甩掉后，在朋友处躲了几个钟头才回到家里。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傅作义将军起义，北平和平解放了。消息传来，毛却非惊喜交集，十分激动。马健英只见他时而笑容满面，时而细语连声：“……起义……和平……解放……。”

起义前后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晨，百万雄师过大江。二十三日，解放军即解放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就在解放南京的前一天（四月二十二日），毛却非接到国民党海军当局的调令，调广州接任美颂号军舰舰长。他搭飞机到广州后，便写信叫妻子马健英去找王显群商量，设法把孩子带到广州去。马健英找到王显群转告了毛的意见，王认为解放南京后，我军已分路向南挺进，上海即将解放，要马将子女留在上海。马则感到子女太小，留在上海放心不下，决意同去广州。最后王同意了。在送行时，王对马说：“你到广州后告诉却非，三个月后组织上派人来与他联系。”

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马健英抵广州时，便把王显群的话告诉了却非。过了二十天（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了。三个月过去了，组织上还未派人来联系，这使却非焦急不安，坐卧不宁。这时，却非一家住在黄浦港附近的民房里，一天，一个同学曹远逸前来看望却非，曹说：“你离开上海后，有人议论你在一九三七年就加入共产党了。你在这里很危险，不如同我回四川去，重庆有几条船，可以找到工作……。”却非不同意他的意见，二人谈不拢来，曹就告辞了。直到十月初，一个自称宋平的年轻人带来一封由两个妇女署名（杨沧活、姜伟衡的爱人）的信，并对却非说：“你姑妈到香港去了，叫你到香港去会面。”还留下“姑妈”的住址。却非因不识此人，故在谈话中非常谨慎。宋平走后不久，又一个穿海军服、挂少校衔的人来找却非，适逢他外出，这

人留话约定次日在某咖啡馆会晤。第二天，却非同妻子前往约定地点，见来人已改装成商人模样了，仔细一看，却非才认出是他的同学张君然，当即叫妻子注意周围动静，他与张谈了一阵就分别了。回家后，却非告诉妻子说，宋平确是组织上派来联系的人。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国民党海军当局命令毛却非把美颂号军舰开往香港装运卫生器材到台湾去，就在该舰开往香港的当天，广州解放了。却非抵港后，即按宋平指定的地址去找“姑妈”，见面时才知道就是杨沧活，那时杨是以新闻记者的身份住在香港的。二人经过周密商谈，决定趁该舰在香港等待装运卫生器材之机举行起义。此后的两三天，却非分别将舰上的电官、医官、枪炮官等约到杨的住地秘密筹划起义的细节，最后决定起义时间是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上午八时，宣布起义后即将美颂舰驶往上海。

起义前夕，十月十八日下午，却非同妻子从杨沧活处拿回一大一小两面五星红旗和一些宣传品，准备第二天清晨升旗时就升起五星红旗作为起义的标志。傍晚时，却非又一次秘密召集愿随舰起义的轮机长、枪炮官、帆缆班长、电官、医官和警卫连的李副连长等人开会，除传达了组织上对起义的指示外，还对一些主要问题作了详细的检查和部署。散会后，却非在官舱内草拟起义宣言和告全舰官兵书。约在深夜零时，甲板上突然响起了许多人奔跑的脚步声，紧接着“砰”的一声，舰长室的房门被砸开了，一群端着枪的国民党士兵冲进卧室，马健英被惊呆了。为首的一人大声喝问：“舰长在哪里？”见无人回答，知却非未在室内，又立即率领士兵直奔官舱，于是却非就被擒了。当时警卫连的李

副连长见事不妙，立即倒向国民党军一边，亲手将马健英捆了起来。同时被捕的还有却非的十七岁的弟弟毛富正（任舰上的信号兵）和随却非起义的官兵约三十人。事后方知，是该舰的帆缆班长伸公庆和轮机长谢衡在散会后即偷偷上岸向国民党在香港的特务机关告密，致使这次起义功败垂成。

次日清晨，美颂舰在国民党军的押送下即开往澳门“检修”。一周后又开往台湾，在穿过台湾海峡时风浪很大，却非同妻子关在一起，他取下领带悬挂在舱壁上对妻子说，如领带摆动到七十度时，就会翻船。接着他又十分感慨地说：“起义不成，死何足惜。但愿风浪更大一些，与此船同归于尽就好了！”他又教妻子说：“到台湾如果他们审讯你时，你要坚强些，问你什么，你都说不知道，把一切都推在我身上就行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八日，美颂舰抵高雄，却非和起义官兵被投入凤山监狱，马健英和一岁的小女儿丽雄也同时入狱。他的大女静雄（六岁）、子兵雄（五岁）则分别由毛却非的同学陈振夫和陈少平（当时任舰长）的妻子郭玉融（简阳西街人）暂时领去看管。

在凤山监狱关了十八天，马健英被审讯过一次，后来转到左营海军监狱，又审讯了一次，他们要马健英供出在海军里与毛却非有联系的人以及开展活动的情况，马健英遵循丈夫的教导，只说自己是农村妇女，没有文化，什么都不知道。再问她什么，她就又哭又闹，弄得审讯的人毫无办法，只得草草收场。在监狱里，马健英最关心的是自己的丈夫。但两相隔绝，音讯不通，只是在一次收风时，却非路过女监，在窗口问了问子女的情况，对妻子安慰了几句就走了。

被监禁了三个月之后，马健英带着小女儿出狱了，在狱门口与却非见了一面，他也没有说什么，只是叫妻子出去后买点牙刷牙膏给他送去使用，马出狱后被安置在郭玉融家里与大女儿静雄住在一起。郭玉融告诉马健英说，是许多同学联名将她保释出狱的。马健英买了牙刷牙膏等给丈夫送去，但未见到本人。

一天，毛的同学黄吉轩（副舰长）来看马健英，问她是否想回四川老家去？马因丈夫尚在狱中，生死未卜，故未置可否。后来还是郭玉融告诉她，一些同学再次联名请求国民党海军当局同意马健英携带子女回四川原籍。春节刚过，一些同学凑了钱给马健英作路费，由国民党海军派一姓孙的参谋押送马健英及其子女搭上中权号军舰开往舟山岛。在船上，马认识了警卫连排长庞超（四川南充人）、轮机兵容乃生（广东人）和一个姓曾的班长，他们告诉马健英说：毛却非已在春节前夕（一九五〇年二月上旬）被国民党当局枪毙了，马健英听了后心中十分悲痛，幸运的是自己和子女逃离了虎口，很快会回到大陆了。在途中，马健英在自己的铺位上发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不要伤心，一定要把孩子们带回大陆，走毛舰长未走完的道路。”马健英看了后，感到莫大的安慰，虽不知是谁写给她的，但总觉得亲人随时都在自己身边。该舰抵舟山后，马带着儿女经长途岛再到乘泗岛，几经周转，受尽艰辛，最后乘鱼船到苏北吕四区登岸，回到了大陆。

吕四区人民政府热烈接待了侥幸从台湾归来的马健英，并把他们送到南通市。南通公安局沙局长接见之后，当即电话告知上海。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情报处一位李科长专程到南通市把马健英及其子女接到上海，情报处处长陈学奋热情接见了他们。马将自己和子女随同丈夫同时被捕入狱以

及后来怎样回到大陆的经过情况作了汇报，陈学奋听了后说：“美颂号出事的第二天，我们得到了情报后，即派人组织营救，但没有成功。”并说：“毛却非同志被国民党杀害了，你不要太难过。现在你把几个孩子带了回来，就是很大的幸运。今后孩子们长大了，要告诉他们，千万不要忘记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毛却非同志的仇恨……。”不久，马健英要求回四川老家去，陈学奋同志劝阻说：“组织上已经对你们的生活作了安排，在这里有什么困难也好照顾。”后来马健英又要求搬到南京居住，经领导批准，马健英被安置在南京中山路白下区派出所工作，三个子女由国家抚养。由于马健英想念家乡，到一九五八年，她和子女仍迁回四川省简阳县毛却非烈士的故乡务农。现在毛却非烈士的子女都已成人。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努力工作。

（一九八四年）

更正：《革命史资料》第十五辑九十八页照片说明应为“庄国英同志一九四九年任广州市军工厂军管代表”。